

# 北京文博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 正确处理危旧房改造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 关于对元大都遗迹及元代遗存保护的思考
- 北京地区石刻概述
- 金诗中的中都胜迹——纪念金中都建都850周年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

2003·3

# 北京明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定陵博物馆



北京市副市长张茅在市文物局副局长舒小峰的陪同下，视察十三陵神路



(封二)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视察十三陵

明十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 13 位皇帝陵墓的总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部的天寿山麓。陵寝建筑具有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和保存较为完整的特点。陵内计葬有皇帝 13 人、皇后 23 人、皇贵妃 1 人以及数十名殉葬皇妃。除皇帝陵外，陵寝区域内还有明朝皇妃墓 7 座，太监墓 1 座，以及行宫、神宫监、祠祭署等若干附属建筑。

明朝崇尚“事死如事生”的礼制，认为人死后，灵魂犹在，还有饮食起居的需求，因此，这 13 座皇帝的陵寝建筑比拟皇宫，红墙黄瓦，楼、殿参差，显示了真龙天子的尊崇地位和君临天下的浩大气势。

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明十三陵作为中国古代帝陵的杰出代表，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

明十三陵从公元 1409 年开始营建首陵长陵，到清初建造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的思陵，经历了二百余年的历史。此后，又历经清朝和民

国等不同历史时期。其历史遗存，不仅是研究明朝陵寝制度、丧葬典制、祭祀礼仪、职官体制和建筑技术、工艺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绝好实物资料，也记录着清朝和民国年间的沧桑历史。

因此，明十三陵不仅是中国帝陵建筑的典型范例，也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最好见证。它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第 I、II、III、IV、VI 等项标准。所以，从 2001 年 10 月起，北京市开始了明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终于在今天的 7 月 3 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27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表决通过了北京明十三陵和南京的明孝陵，共同作为 2000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

(文：文宝，图：高小华、于长宝)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视察十三陵文物保护工作



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巴德兰视察十三陵定陵地下宫殿



文物古建专家罗哲文、张开济、郑孝燮、杜仙洲等视察十三陵的德陵



世界文化遗产组织的代表李相海博士在市文物局副局长孔繁峙的陪同下考察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彩一)

# 纪念金中都建都 850 周年



9月20日上午，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在中华世纪坛举行。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傅铁山，国务委员陈至立，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



金中都建筑构件——琉璃鸱吻

北京历来是中原王朝在东北方的重镇，辽宋金时期被各政权争夺。辽获幽云十六州后，将幽州(今北京)升为南京，又称燕京。1123年，北宋收复南京，改称燕山府。1125年，金人南伐，获幽燕地区，燕山府改名为南京。

1127年，金灭亡北宋，由于在华北地区的统治不稳定，在最初十多年里，继续以会宁府(今哈尔滨东南)作为首都。1149年，完颜亮即帝位，史称海陵王。此时金的统治区域南及秦岭、淮河，包括从东北到华北、中原的北半个中国。为有效地巩固中原地区的统治，并借迁都而彻底打击守旧贵族，海陵王下令修建南京。宫阙制度完全模仿北宋汴京皇宫的规制构筑，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向东、南、西三面拓展而成。城周计37余里，设城门13座。宫城在城中央南部，周回九里三十步。1153年，宫城竣工，海陵王正式下诏迁都，改南京为中都。北京从此成为一代王朝正式首都，为元、明、清三代正式成为统一的封建王朝首都奠定了基础。

今年恰逢金中都建都850年，北京通过举行一系列大型庆典活动，包括展览、学术研讨会等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



金中都水关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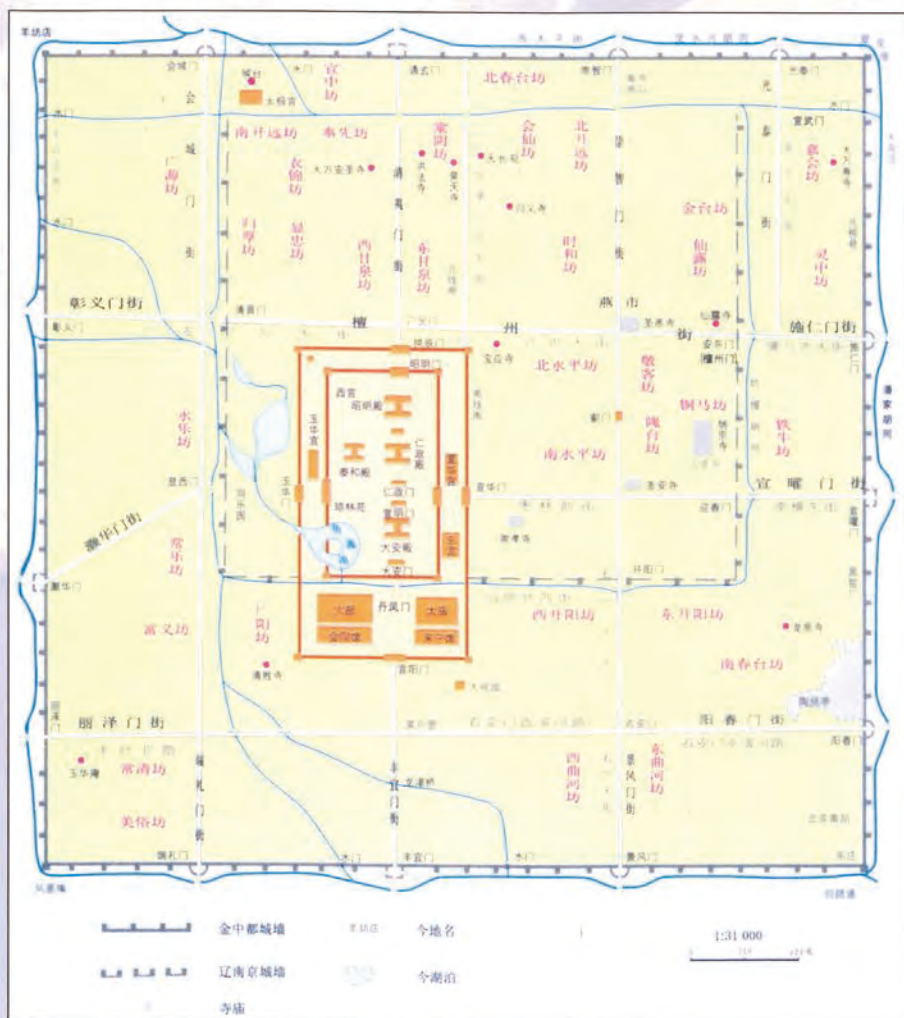
凤凰嘴金中都西南城墙遗迹(东南侧)



高楼村金中都西城墙遗迹(东侧)



万泉寺金中都南城遗迹



# 北京文博

梅宁华  
初题

## 目 录

(2003年第3期)(总第三十三期)

### 文物工作

- 正确处理危旧房改造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 梅宁华(5)
- 关于对元大都遗迹及元代遗存保护的思考  
——参与元土城遗址公园建设工程的几点认识 ..... 孔繁峙(8)
- 明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简述 ..... 王辅宇(20)

### 考古简报

- 清代著名园林畅春园大宫门建筑遗址及西花园一石桥遗址发掘简报  
..... 王清林 王 策 朱志刚 周 宇(23)

### 博物馆学

- 博物馆近20年管理思想浅析 ..... 解小敏(30)
- 浅谈博物馆文化活动策划书的编制 ..... 高小龙(37)
- 前门地区历史文化与保护利用 ..... 袁学军(39)
- 北京石刻文化展巡礼 ..... 明晓艳(45)
- 北京地区的博物馆期刊 ..... 王 珏(51)
- 祝贺北京皇城艺术馆开馆 ..... 吕济民(55)

## 文物研究

- 北京地区石刻概述 ..... 刘卫东(56)  
丰台出土辽韩氏家族墓神道碑 ..... 陈 康(66)

## 北京史地

- 金诗中的中都胜迹  
——纪念金中都建都 850 年 ..... 范 军(70)  
“黄帝南伐赤帝”刍议 ..... 韩嘉谷(76)  
北京东岳庙善会述略 ..... 尚 鸿(83)

## 文物保护

- 北京孔庙石质文物的现状及保护探研 ..... 刘树林(88)

## 资料信息

- 北京市文物局 2003 年二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张 丹(98)

封面:万泉寺金中都南城墙遗迹

封底:金中都城遗迹保护标志

封二、彩插一:北京明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彩插二、三、四:纪念金中都建都 850 年

封三:北京市文物局和市公安局联手破获一起倒卖文物案

---

##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 问:侯仁之 李学勤 吕济民

主 任:宿 白 副 主 任:梅宁华 廖静文 王世仁 曹子西 齐 心 马希桂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 平 马法柱 王丹江 孔繁峙 刘建业 刘超英 张 展 张增光 宋大川  
陈 平 陈 旭 赵其昌 侯 明 晋宏逵 徐 伟 徐 明 高凯军 舒小峰  
韩 永 韩 扬 温桂华 葛英会 傅公铨

主 编:张 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 韩建识 陈 倩 美术编辑:宋世华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北京文博网网址:<http://www.bjmuseumnet.org>

## BEIJING WENBO

###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3,2003

#### Contents

##### **CULTURAL RELICS WORK**

-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Dangerous and Old Buildings'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 *by* Mei Ninghua(5)
- Reflec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Dadu and Other Relics of Yuan Dynasty—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the Relics Garden of Yuan Earth City ..... *by* Kong Fanzhi(8)
- A Brief Description on How the Ming Tombs were Declared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 *by* Wang Fuyu(20)

##### **ARCHEOLOGICAL REPORT**

- Excav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ite of Dagongmen of Famous Changchunyuan and a Stone Bridge  
of West-Garden in the Qing Dynasty  
..... *by* Wang Qinglin, Wang Ce, Zhu Zhigang, Zhou Yu(23)

##### **MUSEOLOGY**

-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Museum - Managing Thoughts in the Last 20 Years  
..... *by* Xie Xiaomin(30)
-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Planning Report of Cultural Activities for Museum  
..... *by* Gao Xiaolong(37)
- The History, Cultur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Qianmen Area  
..... *by* Yuan Xuejun(39)
- A Visit to the Beijing Stone Carvings Culture Exhibition ..... *by* Ming Xiaoyan(45)

The Museum Periodicals in Beijing ..... by Wang Jue(51)  
Congratulations on the Opening up of the Royal Art Gallery of  
Beijing ..... by Lü Jimin(55)

### **CULTURAL RELICS RESEARCH**

A Summary of Stone Carvings in the Beijing Area  
..... by Liu Weidong(56)  
The Shendao Stele of Han Clan in Liao Dynasty Unearthed  
in Fengtai ..... by Chen Kang(66)

###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BEIJING**

Famous Historical Sites of Central Capital in Poems of Jin Dy-  
nasty—in Memory of the 8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  
dation of Central Capital ..... by Fan Jun(70)  
About “Emperor Huang Attacked South Emperor Chi”  
..... by Han Jiagu(76)  
A Survey of the Dongyue Temple Fair in Beijing  
..... by Shang Hong(83)

###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Research on the Situ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Stone Cultural  
Relics in the Confucian Temple of Beijing  
..... by Liu Shulin(88)

### **DATA AND INFORMATION**

A Chronicle of Events Concern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2nd Quarter of 2003) ..... by Zhang Dan(98)

### **EDITORIAL BOARD OF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Lü  
Jimin, Li Xueqin

**Chairman:** Su Bai

**Vice — chairmen:** Mei Ninghua,  
Liao Jingwen, Wang Shiven, Cao  
Zixi, Qixin, Ma Xigui

**Members:** Yu Ping, Ma Fazhu,  
Wang Danjiang, Kong Fanzhi,  
Liu Jianye, Liu Chaoying, Zhang  
Zhan, Zhang Zengguang, Song  
Dachuan, Chen Ping, Chen Xu,  
Zhao Qichang, Hou ming, Jin  
Hongkui, Xu Wei, Xu Ming,  
Gao Kaijun, Shu Xiaofeng, Han  
Yong, Han Yang, Wen Guihua,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  
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Han Jianshi, Chen  
Qian

**Art Editor:** Song Shihua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  
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URL:** [http://www.bjmuse-  
umnet.org](http://www.bjmuseumnet.org)

# 正确处理危旧房改造

## 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梅宁华

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北京的发展进程中,始终面临着建设和保护的矛盾。近年来,随着危旧房改造的大规模开展,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各界对北京旧城进行危旧房改造议论纷纷,意见各异。如何正确处理这一矛盾,已成为北京建设和发展所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 一、北京旧城的历史文化价值

北京旧城 62.5 平方公里,其城市基本格局形成于元代大都城,定型于明清时期,形成了以紫禁城为核心,以贯穿南北的城市中轴线为中心,以棋盘式街巷布局,以皇家园林、王府、衙署、坛庙、作坊、店铺以及大量的四合院构成的城市风貌,成为独具特色、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梁思成先生曾说,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的表现出了伟大中华民族建筑传统手法和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培根评价道:“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它的设计是如此杰出,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

最丰富的思想宝库。”经过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造和建设,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老北京城仍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明清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北京有着丰厚的文物资源。据 1997 年完成的第三次全市文物普查统计,全市文物资源总量为 3550 处,文物建筑约 200 多万平方米。其中世界文化遗产 5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0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34 处,区县级文保单位 517 处,暂保单位 246 处,普查在册文物 2523 处。在旧城范围内,有世界文化遗产 2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34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34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15 处,暂保单位 39 处,普查在册文物 478 处,总计为 800 处。除此以外,北京旧城内还保留有大量的胡同及四合院,这些胡同和四合院构成了北京旧城的风貌,是老北京的重要建筑形式。旧城的风貌和重点文物保护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对重点文物自身的保护,更重要的取决于对胡同和四合院的保护,它们是北京建筑文化的集中体现。

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是构成北京旧城风貌的基本元素。据统计,北京城区有名的

街巷、胡同共有 6100 多条,其中正规的胡同集中在皇城的東西两侧,沿街道由南向北整齐排列,简陋的胡同大多在离皇城较远的南北方向。北京的胡同名称丰富多彩,既反映了历史沿革,又展示了社会风情。北京的四合院是与胡同同时出现的建筑形式,历史悠久,风格独特,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居住形式方面的体现。四合院的营建是严格按照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进行规划、建设,它的装饰和彩绘处处体现着传统民俗民风,反映着对“天人合一”理念的追求。北京的四合院从规模、数量、类型、样式及所包含的文化内涵,都是无可比拟的,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总之,北京旧城中除了皇家宫殿、园林、坛庙,大量留存的主要是胡同和四合院,它们构成了北京城市的特色和格局。北京历史风貌的保护不仅取决于对重点文物建筑的保护,更取决于对胡同、四合院这一基本要素的保护。

## 二、危旧房改造的必然性

北京旧城现存的四合院大多修建于清末和民国时期,一般都有七、八十年以上的历史。由于四合院为土木建筑结构,坚固度较低,修缮周期短,加之体制和资金方面的原因,造成大量四合院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在北京旧城内保有的三百多万平方米四合院中,四、五类危房占了近 50%。由于大量的四合院属于“直管公房”,由房管局管理或各单位拥有,且房租低廉,无钱修缮,使这些房屋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面貌,成了破屋陋室,亟需改造。特别是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原来一家一户居住的四合院逐渐演变为多户居住的大杂院,院内私搭乱建严重,四合院的格局不复存在。

特别需要指出,四合院是适合当时人们居住要求的建筑形式,按照现代居住条件衡量,它的使用功能已无法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四合院中现代市政设施缺乏,取暖、水处理、燃气设施难以引进,居民生活极为不

便,在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的情况下,改造四合院,使之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要求,成为历史的必然。

## 三、危旧房改造对文物保护的影响和引发的矛盾

北京市大规模的危改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由于实行危改与房地产开发结合的原则,导致一些开发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古都风貌,出现了大规模“推光头”式的危改,后果是严重的。几乎旧城内所有危改项目,除已定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留外,大片四合院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 30~40 米的楼群,不仅使保留的文物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环境,也使旧城风貌受到严重破坏,致使构成老北京城市格局的一些传统街区逐渐消失,北京城市历史文化特色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危旧房改造步伐加快,近年来将有 60 多项危旧房改造项目在旧城展开,对文物保护的影响已从过去“点”的冲击扩展为“面”的大规模影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古都风貌保护的种种议论。

强调保护者大声疾呼:危房改造必须停下来,否则北京旧城将失去本来面貌,古都风貌将丧失殆尽。从现在开始,一砖一瓦都不能再动了,要尽可能保留旧城遗韵。

强调改造者态度鲜明:改造危旧房是历史的必然,城市要发展,人民的居住条件要改善。危旧房现状令人堪忧,不改造将失信于民。

危旧房改造和保护古都风貌,已经成为北京发展建设中的突出矛盾,使相关工作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北京大批的危旧房亟需得到改造,以满足群众日益迫切改善居住条件的要求;另一方面,北京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特色必须保留并延续下来,绝不能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确把握两者的关系,确立清晰的工作思路。一是深刻认识保护北京历史文化特色,是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北京的规划和建设一定要充

分考虑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在最大限度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前提下,加快旧城改造步伐,努力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二是深刻认识危旧房改造的必然性,当前要解决的不是改与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的问题,要引导危旧房改造走上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轨道。三是要深刻认识古都风貌保护与危旧房改造不是对立的。已有的成功范例如明城墙遗址公园搬迁了2600户居民,形成了新的景观;南池子地区危改将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风貌,同时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这些经验将对探索保护和改造的有效结合提供有益的借鉴。

#### 四、进一步加强危旧房改造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解决危旧房改造与文物保护的矛盾,不仅是认识问题,更迫切的是现实问题。既然危旧房改造不可能停止,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的措施,有效地引导危旧房改造符合文物保护的要求。

1. 已经采取的有效措施。根据我市从2001年起到2005年基本完成危改的安排,市文物局在对规划确定的164片危改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将旧城危改片内文物保护单位绘制成“十五期间四城区危改区内需保护的文物建筑清单”及图册,提供给市规划部门及各城区,要求对危改涉及的101处文物保护单位和285处普查登记项目予以保护。并由市文物局起草与市规划委、市建委、市国土房管局联合签发《关于在城市危改中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提出了具体要求。

从2002年初开始,市文物局组织力量对城四区危改片内的四合院保存状况进行了调查,确定具有保护价值的四合院539处,并根据危改实际,制定了《关于加强危改中四合院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了危改片内四合院保护的标准。同时,按照市政

府的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危旧房改造的审批程序,严格坚持危改方案中必须做到“区级以上文物一个不能动,普查登记文物一个不能少”。这些措施对危房改造中的文物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2. 正在研究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危旧房改造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必须扭转旧城内危旧房改造以开发商为主的做法,形成危旧房改造以政府为主体的局面。旧城内危旧房改造不能依赖商业性资金平衡,导致大量质量较好、位置较佳的房屋被拆除,而真正大量的危旧房因商业价值低而得不到改造。要通过调整危旧房改造政策,实行政府财政补贴和实行房改等多种方式,筹集危房改造资金,使危房改造实现“原拆原建”,保留历史风貌的目标。这一房屋改造的原则已经提上议程,并以白塔寺周边地区、琉璃厂文化区为试点,进行相关的测算和准备,取得成效后积极推广。

3. 建议采取的措施。旧城的更新和发展是必然趋势,实行保护性发展是长久之道。北京旧城危旧房改造不能再出现大拆大改的方式,要解决好几个重要环节:一是人口疏散。必须通过有效政策,将旧城过于密集的人口疏散到新区,据测算,应有一半以上人口疏散出去才能缓解旧城居住密度,保持旧城原有格局和合理的居住规模。二是尽快确定胡同、四合院市政建设规范,解决胡同狭窄、场地不便等矛盾,并通过危改使胡同、四合院市政设施达到现代标准。三是在风貌控制方面实施更加严格的标准,不仅历史文化街区必须保持原貌,旧城内的危改区都应以原貌为基础进行规划设计。

总之,只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危旧房改造对文物保护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突出的矛盾,就能取得既保护文物和古都风貌,又推进危旧房改造的双赢结果。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

# 关于对元大都遗迹及元代遗存保护的思考

——参与元土城遗址公园建设工程的几点认识

孔繁峙

今年3月初,经北京市政府批准,依照反复研究论证的方案,由海淀区、朝阳区、市水利局、市文物局共同参与全面启动了众心瞩目的元土城遗址公园的建设工程,从公园建设的整体规划方案看,其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巨、范围之广和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根据目前的工程进展情况,完全可以预测,到今年9月初,这座具有悠久历史并与北京历史名城有着密切联系的元土城遗址,将在一个新的环境内向世人展示其经数百年风雨的沧桑面貌。

## 一、元土城公园建设与遗址保护

元土城遗址位于明清北京城北部,是历史上著名的元代大都城北面和西北面城垣,目前地面城垣遗存约9公里,是北京市1957年公布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始终是北京城外的一处半自然开放式的绿化休闲区域。由于遗址处于城乡结合部位,随着建国以来首都城乡的建设发展,在遗址区域内开始出现农舍和民居,土城遗址不断受到居民生活及取土的破坏与蚕食,特别是近年来,首都城市向周边的急剧扩展,大量的现代建筑不断出现在遗址周围。目前,在土城遗址9公里的沿线两侧,已先后建成十余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居住和办公小区,使自明代以来废弃数百年的遗址区域,变成了“乡村中的城市”,周边区域内居住人口的急剧增加,迫切需要改善目前的生活居住环境,为市民开辟一处以土城遗址保护展示、园林绿化为主体的公园景区。

关于公园建设。该公园是北京市跨度最大的一座遗址性园林公园,全长9公里,宽度为100至160米之间,总面积达110余万平方米。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确定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功能定位是以土城遗址及元代文化为底蕴,以特色园林艺术景观为装饰,在都市外围创造出一个人文景观、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绿色开放空间,使这一区域成

为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处环境象征和文化标志。

公园整体建设立足于将古城遗迹、历史河道、园林绿化融为一体,以土城遗迹展示为中心,以园林小品为衬托,从而建成以保护遗址、展示历史、改善环境、丰富景观、方便市民、利于休闲的大规模的街区公园。园林绿化工程,着重在土城遗址的北侧种植万余棵落叶乔木、灌木和几万平方米的草坪及部分时令花卉,充实和完善公园区域的整体绿化。同时,在绿化工程中,还运用独特的种植手法和花卉造型及传统园林艺术,以疏密相间、色彩搭配的美感和自然景致形成与残墙、古树、翠柏相得益彰的独特景观。特别是在原有的“蓟门烟树”的传统景区外又以土城遗址和护城河的不同地段的区域特点构造出了城垣怀古、天台拥翠、银波得月、水关新意、鞍疆盛世、燕云牧歌、蓟城新象等多个园林景区,在为人们提供足够的视觉、漫步空间的同时,还衬托出残墙古树的雄浑和苍劲。

关于遗址的保护。元土城遗址,曾是著名的元大都城的北侧和西北侧城墙,建于元代的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终元一代,始终是元代统治时期大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初期被废弃。《寰宇通志》记载:“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对明初废弃的元大都北侧城墙在明代的存留状况,《顺天府志》曾记载:“元之都城,视金之旧城拓而东北。至明初改筑,乃缩其东西以北之半面而小之。今德胜门外有故土城关,隆然坟起,隐之曲抱,如环不绝,传为北城遗址……。”元大都土城遗迹,自元代建造至今已有700余年历史,是北京地区原样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段元代大都城遗迹,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因其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在历史上发挥的特定作用,几百年来,元土城遗迹已形成了自身的个性及独特之处,突出体现在其具有不朽的都城建筑及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它是北京城市发展变

化的历史见证,更是今天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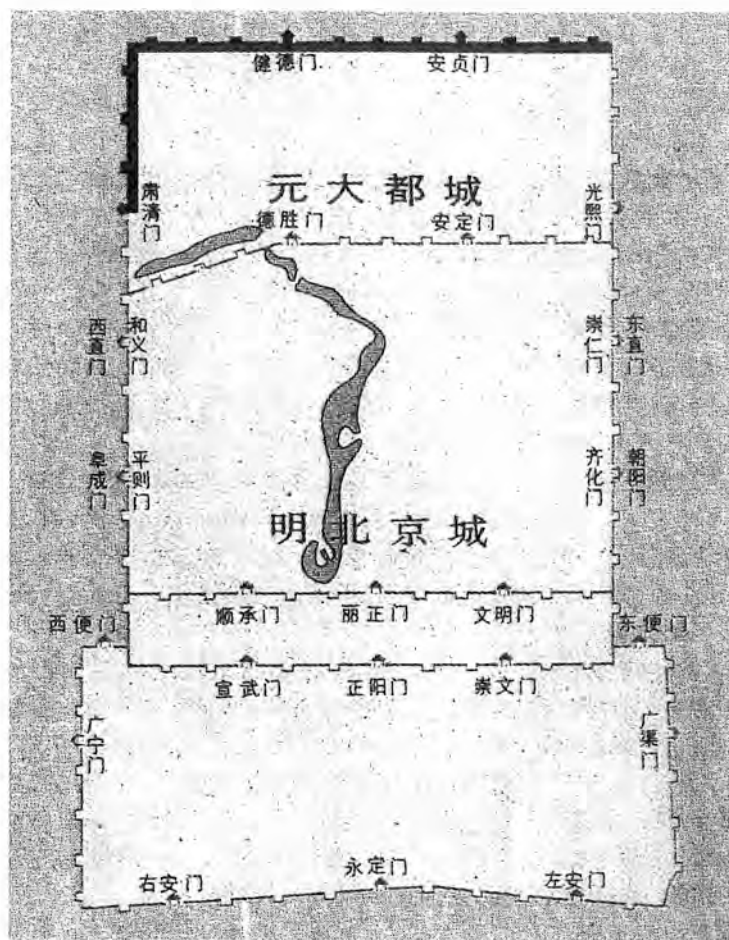
自明初废弃元大都城北面城墙后经过明清五百余年的风雨侵蚀,当初高达16米的夯土城墙现已风化为高低不平、起伏连绵的带状土丘。特别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以后,不断发生的挖取城墙夯土及各类违章建筑,对土城遗迹再次造成严重破坏。这次遗址整治工程,共搬迁遗址区域内的住户500余户、各类占用单位70余个,拆除的各类正式建筑物50000余平方米、各类临时建筑物70000余平方米。

在清除了遗址区域内的各种建筑渣土后,才使我们能对土城遗址的整体保存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在目前9公里长的土城遗址范围内,土城遗迹的完残程度大致可分为三种状况:

一是,部分地段的土城地面遗迹已消失。因多年来数条城市道路的开通,居民、单位建设的生活、生产、经营、办公等各类建筑占压了部分地段的土城遗址,在上述工程建设之初,即已将所占的土城夯土全部挖光,致使1000余延长米的土城遗址彻底消失,从而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二是,大部分土城遗迹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由于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连绵10余公里的城墙夯土,曾一度成为北部城区居民和单位生活、生产的取土之地,使目前很多地段的土城凹凸不平,坑洞密布,加之近些年来,在土城的夯土层上实施的绿化工程,日益增多的游人行走登踏,特别是附近居民在遗址上不断开辟活动健身场地等等,致使大约7000余延长米的土城遗迹残缺破损,使残存夯土高度仅为1至3米之间,部分地段的土城夯土岌岌可危。

三是,基本保持着历史自然状态。因防护措施得当和遗址上早期绿化树木的遮挡,在遗址的东西两端有约600余延长米的土城地段,基本上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其土城夯土的高度在6至3米之间,其外观基本保持了风雨侵蚀的自然状态,如元大都城的西北门——肃清门外,仍保存有较高的瓮城



元土城遗址位置及元明城墙示意图

元土城遗址

夯土遗迹。

土城遗迹的保护与展示,是公园建设工程中的核心内容,因此,市文物局在整体建设的工程中,对土城遗迹的保护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对遗址实施保护的基本思路是:搬迁占用遗址的住户、单位,拆除其全部建筑,清理和整治遗址及其周围环境,采取措施保护土城遗址的自然景观,在遗址公园建设的同时,市文物局对土城遗址开展了以下几项保护工作:

一是,全面保护现存的土城夯土遗迹。重点是突出五项内容:1. 保护好土城整体的历史残迹,防止游人登踏所造成的损害,禁止在夯土基础上栽种树木,以减少植物根系对土城夯土层的破坏;2. 保护好元大都城现存的唯一瓮城遗址——肃清门夯土遗

迹,将结合市政道路和遗址公园的建设,修建防护隔离栏,防止人为的破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考古的方式,有计划地对目前城市道路占压的健德门、安贞门这两座城门基础进行发掘清理,以了解和展示元代大都城的城门遗迹;3. 保护好土城外侧仍隐约可见的城墙“马面”遗迹,保护好现存的夯土轮廓和边沿“界线”,防止外侧绿化工程的植物根系对夯土遗迹的“蚕食”所造成的破坏;4. 保护好大都城向北侧城外排水的工程遗迹——涵洞,这是目前土城遗址中仅存的一处元代大都城向城外排水的古代市政设施。经几百年来风雨岁月的冲刷,涵洞外侧的“砖旋”及与城墙联接的夯土已剥落大半,为防止“砖旋”及土城夯土继续坍塌,在对遗址的维修工程中,已将外侧损坏的

“砖旋”进行部分修复,恢复了上部的夯土,使涵洞得到全面加固。同时,在其周围增设了防护栏,以防止游人再次对这处遗迹造成新的破坏;5. 保护好土城东西两端城墙角楼建筑的夯土遗迹。元代的大都城曾在城廓的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建筑,目前在北侧城墙东、西两端处的角楼夯土台基清晰可见,特别是西北角楼的夯土台基仍高达5米以上,为保护角楼建筑夯土遗迹的历史真实性,在这次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对土城遗迹的维修工程中,没有对现状夯土台基进行修复,而是将其做为一处重要的土城建筑遗迹,加强了防护措施,防止对土城遗址造成新的破坏。

二是,抢险险情,加固残状。对土城整体遗迹的维修,总体原则是采取加固保护的方法,为保留和延续元土城几百年来历史信息 and 原有风貌,在修缮工程中,不复建新的土城墙体,只采用修补和夯土遗迹加固的技术,依传统制作工艺、材料修补严重破坏的地段。在遗址调查中发现,由于历年来形成的违章建筑,特别是单位、居民生产生活取土造成土城遗址的150余处较大面积的残缺,致使多处夯土层断面暴露在外,为防止夯土层的继续塌落,在维修保护工程中,对遗址夯土断面残破严重之处,逐一进行了夯土封护,达到保护土城夯土墙体的目地。此外,维修工程还对土城遗址上的310余个历年植树、取土造成的大小坑洞,按传统工艺逐个填平夯实,同时恢复和保持土城遗迹的历史残状。

三是,不复建地面夯土遗迹已挖光的土城墙体。几十年来,由于首都城市建设的发展,先后有10余条城市道路挖掘和占压了500余延长米的土城遗址,而居民、单位的生产、生活建设又先后挖掘和占压了700余延长米的土城遗址,为保持遗迹的历史真实性,对已挖光地面夯土的土城地段,一律不进行夯土“遗迹”的复建,根据整体遗址展示的需要,对这类地面夯土已不复存在的遗址地段的处理,采取了与园林绿化相结合的手法,通过栽植小型绿化植物,标明和展示土

城遗址的位置及走向。

## 二、关于元大都城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的几个贡献

《元史·地理志》载:“元太祖十年,克燕,仍以燕京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世祖中统二年,修燕京旧城。至元元年都中都。四年,始于中都之北建今城而迁都。九年,改大都”。根据《宫阙制度》等文献记载:“大都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南之右曰顺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东曰安贞,北之西曰健德;正东曰崇仁,东之右曰齐化,东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右曰肃清,西之左曰平则”。

根据《元史》等文献记载,元朝初建时,仍以开平为都城,称为上都。同时,为加强对广大中原地区的控制,在燕京修筑宫室,设置省部等统治机构。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将燕京改名为元中都城。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在兵伐南宋即将统一全国的时候,决定放弃燕京旧城,重新择地,要建设一个与元朝帝国相称并具有统治全国意义的新都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在刘秉忠的主持下,于燕京旧城的东北侧,新都宫城的营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经过9年多的时间,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首先完成了皇城的主体建筑工程。又经过7年多时间的建设,新的都城基本建成,在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皇室、贵族、衙署、商贾相继迁入新建成的大都城。从此,元大都城就成为元代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新建的大都城规划整齐,井然有序,城墙高大宏伟,拱卫全城,宫殿建筑雄伟壮丽,独具风格,街道整齐,形如棋盘,坊巷胡同平行排列,居民住宅规整划一,大都城内水陆通达,商业繁盛。正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描述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华的都市。今天,从北京城市发展史的角度观察,元代大都城的整体规划建设理念,对元以后持续发展的多民族国家——明清都城

的确立,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发展空间。

### 1. 确立了我国自元以来统一国家都城的规划建设的基础

元代的建立,结束了延续数百年来南北割据、社会动荡的局面,再次实现了继秦汉、隋唐以后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客观形势上需要有一个真正意义的象征国家统一的都城,而金的中都城作为南北割据的产物及地理位置的局限,显然不能承担这一新的时代使命,而新都城的规划建设,必须充分体现对全国的统治作用,具有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大都城的规划与营造,是恪守传统的《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北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在金中都城的东北方,建造了一座气势雄伟的新都城——大都城。在都市营造的规划布局上:一是,突出了皇城在全城的地位与作用,做为皇帝治居之所的皇城及御苑,是全城的核心建筑,其地位十分突出;二是,将太庙、社稷坛规划于皇城之外的东西两侧;其北侧的积水潭沿岸形成了全城的商市,构成了“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规制。大都城所占有的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突出的规划布局,显示了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需要,集中体现了封建帝王的皇权至上的统治思想。因此,大都城的整体建筑的规划理念,为以后明清各代所继承沿用和发展。

在明代的最初阶段,由于朱元璋已于1368年在南京确立了明王朝的都城,朱棣在统一北方,攻占大都城后,为保持和体现南京作为明王朝都城的最高规制,首先将元大都城改称为北平府,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为北平布政司,然后,按照封建城市的等级规制,将元大都城北侧城墙向南缩五里,修筑新墙,将元大都东北侧和西北侧的肃清门、光熙门及北面城墙的安贞门、健德门全部废弃。经“靖难之役”、朱棣夺取帝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升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于永乐五年(1407年)正式开始在北平营造新的都城——明北京城。

明北京城的营造和规划布局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建设而成的,也是对元大都城的继承与发展:

一是,明皇城是在元皇城萧墙的基础上修筑的。元代皇城位于大都城的南部中央位置,是以太液池及东西两岸的隆福宫、兴圣宫及宫城为中心,四周修筑“萧墙”。《大都宫殿考》记载:“南丽正门内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建萧墙,周回可二十里,俗称红门阑马墙。墙内二十步有河,上建白石桥三座,名周桥,桥四石白龙擎载。旁尽高柳,郁郁万株,远以城内海子西宫相望。渡桥可二百步为崇天门”。据考证,元皇城东墙位置在今南北河沿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灵镜胡同;北墙在今地安门南侧;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南侧,南墙正中为灵星门,在今故宫午门处,其南门正对南侧大都城的丽正门,中间是千步廊和宽大的通道,皇城周围约二十里。元皇城的选址、布局及规划建设,对明初北京城的确立及规划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初北京皇城的建设看,多沿袭元皇城的规划布局,即由宫城、皇城、外城层层相套的布局方式。明朝在元宫城的基础上,建成了规模更为宏大的明代皇宫。明代皇城仍与太液池和宫城为中心,在元皇城萧墙的基础上修建而成。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永乐四年,营造宫殿,百度维新,乃缮京城。于内为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亦曰紫禁城。南曰午门,亦曰承天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玄武门。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南曰大明门,曰长安左、右门,东西曰东安、西安门,北曰北安门”。

明代初期在皇城建设的整体布局上,又较元代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如将皇城南、北、东三面城墙向外扩展,其南墙达今天安门一线;将东墙扩建于御河东岸;北城墙扩建于今地安门一线。其中,在城市规划中变化最大的是,将元代建于东、西城的太庙、社稷坛这两座重要建筑,规划在皇城之内,建设于皇宫南部中轴线的左右两侧,这种布局上的重要调整,更加重和突出了在都城中

“左祖右社”的规制和地位,使皇城与帝王“祭祀社稷”的国之大礼结合的更为紧密,从皇城规制建设上,进一步体现出封建帝王对国家礼制的高度重视。

二是,明初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营建的,以后历朝都不断对城墙有所增建,在《明成祖实录》和《明英宗实录》中记述:“永乐元年正月,礼部尚书李志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人承大统,其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窃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中都之制,立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府为顺天府。四年闰七月,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计两千七百零五丈”;“正统元年十月,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四年四月,修建京师九门城壕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濠,两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流出大通桥而去。自正统二年正月兴工,至是始毕。更名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余四门仍旧。城南一面二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垛口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顶收五丈”。可见,明初在大都城基础上营造北京城的同时,又将城墙向南扩展至今正阳门一线,这种布局上的变化,不仅使皇城处于全城最安全的中心位置,而且将六部五府等衙署集中于正阳门内千步廊两侧,这更烘托出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封建国家统治的威严。明嘉靖年间,为加强京城防卫的需要,增筑了南城,使北京城最终成为“凸”字形平面布局的城市,从而也使得明北京城最初营建的历史基础——元大都城的轮廓及历史“痕迹”在这不

断的扩建发展中逐渐消失了。

## 2. 确立了元以来北京城市的中轴线建筑格局

元大都城营建中具有创造意义的一项规划,是确立了全城中心建筑的轴线布局方式和大都城地理上的几何中心标志,以此作为统领和突出全城整体建筑的主题与重点,在大都城内,曾在钟楼、鼓楼位置附近,建有标明全市中心部位的中心阁和中心台。据《析津志》记载:“中心台在中心阁十五步,其台方福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建国以后,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围绕着大都城中轴线的位置问题开展过一系列的论证工作。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曾最先提出:元大都城的建设,就是以现在的后门桥来确定自北向南纵贯全市中轴线的位置,然后在海子桥的正北方,建立起作为全城平面布局中心的标志,即元代的“中心之台”,从中心台径直南下,经过海子桥,南达全城设计上的正南门,在这一距离的中间部位上,即太液池的东岸,兴建起“萧墙”。以元宫城、太液池为中心,更建“萧墙”从四面加以围护,因此,在元朝大都城初建的时候,出萧墙北侧的厚载红门,沿中轴线径直北上,经海子桥,可直达“中心台”。从而对元代大都城中轴线的方位进行了科学的推断。

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为解决元代大都城中轴线的准确位置问题,曾联合进行一次北京城内的考古勘探工作,在景山北墙外地面以下探出一段18米宽、南北走向的道路遗迹。同时,在景山公园内寿皇殿前探出大型建筑夯土基址,这些考古发现,无疑可以确定掩埋在地下的这段18米宽的道路遗迹,必是当年南北贯穿大都城的中轴线及其建筑基址,从而证实了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与当年元大都城的中轴线完全重合,只是在建筑起点上存在时代上的差异。

2000年初,北京市文物局在组织开展

对后门桥及两侧泊岸的维修工程,市文物研究所对古桥两侧河道的清理中,于后门桥(即元万宁桥)东西两侧的南北“燕翅”的泊岸石上,各出土了一只大型的石雕“镇水兽”,均与泊岸石为一整块巨石雕琢而成,其工艺精细,形象生动。经鉴定,在所出土的4只“镇水兽”中有3只制作于明代初期,只有东侧北面这只石兽,表面风化斑驳严重,其制作年代显然早于其它3只。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只石兽的吻部下面的石壁上,发现了因风化而模糊不清的“至元四年”四字石刻年款,从而标明了这只石兽准确的制作年代。根据文献记载,这一年正是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兴建大都城的第一年。《析津志》河闸桥梁卷明确记载:“万宁桥,在玄武池东,明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修复。虽更名万宁,人惟以海子桥名之”。元、明两个时代的石刻在后门桥的建筑中同时出现,就完全可以认定,后门桥是明初建造的,同时,造桥工程还就地利用了元代的石兽等构件。因而,这一重要发现,不仅对于确认后门桥(元代万宁桥)的建造时代,而且对于元大都通惠河水系的开凿、变迁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它更证明了后门桥自元代以来作为北京城中轴线必经之地的位置,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由此可见,明代初期在营建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中,即在原有位置上承袭了元大都城建筑轴线的规划方式,并发展成为贯穿明代北京城的城市中心建筑、轴线布局的规划特色。明北京城在中轴线上营造并形成的各类建筑已十分瞩目,自北向南,全城中轴线上分别排列的建筑有:钟楼、鼓楼、后门桥、寿皇殿、万春亭、北上门、神武门、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乾清门、保和殿、中和殿、太和殿、太和门、午门、端门、承天门、大明门、正阳门(城楼、箭楼、瓮城)、永定门(城楼、箭楼)等,这条中轴线形成的建筑纵贯全城,统领全城乃至皇城整体建筑的规划分布和建筑对称有序的格局。使北京城形成以中轴建筑突出、全城建筑布局严谨、完整、优美的都城。

### 3. 奠定了北京坊巷胡同的基本格局

大都城内的坊巷布局方式,是我国千百年来古代城市中里坊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制。我国历史上城市建设中的坊巷起源,可以上溯至周代的闾里制,发展到汉魏时期,城市中开始出现坊的记述,《南齐书·魏虏传》记载:“平城——廓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容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窃”。到隋唐时期,城市建设中的坊巷规划已形成制度。《唐六典·户部尚书》记述:“两京及州县之廓内分为坊,廓外为村”。宋金时期,城市的坊巷建设已十分成熟。大都城的建设吸收了宋金都城建设中的坊巷制度,但同时在规划建设上又有新的发展。元初,大都城内坊巷建设的平面布局,是依传统坊巷规划,按经纬纵横的街巷网络形制建设的。据《析津志》记载:“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二十四火巷,二十九街通”。据有关文献记载,元代,在大都城内的皇城周围共营建了五十个坊,其中著名的有:城东的南薰坊、澄清坊、明时坊、明照坊、皇华坊、思照坊、靖恭坊、昭回坊;城西的阜财坊、金城坊、咸宜坊、安富坊、太平坊、丰储坊、析津坊;南城有万宝坊、五云坊、时雍坊;城北有永福坊、里仁坊、招贤坊、丹桂坊、怀远坊、乾宁坊、清远方等。

大都城内依坊巷有序排列形成的街道,纵横竖直,相互交错,东西相对的城门之间多有贯通的宽广大道相连。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称赞大都城的街道说:“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远望彼门也。”“全城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大都城各坊之内营建规则的四合院式民居,众多的四合院按一定规则排列,就形成了间距在70米左右的胡同序列,每条胡同都与大街相通,全市各坊都规划有规则的方格道路相联。元大都时期的坊巷建设已达到很高水平,已初步显露出以下三大优势

和综合功能：一是生活功能，大都城内以坊为区域单位，根据生活、居住的需要，为不同阶层提供了面积不等的建房宅地，特别是统一规划了最适合北方居住的四合院建筑形制，作为全市基本的民居建筑，这是北方最适合生活、居住的民居建筑的历史选择；二是交通功能，大都城兴建的坊巷建筑，与宋金时期封闭式的坊巷有很大不同，在规划营造之初就去除了传统的坊墙，使历史上封闭的坊巷，成为一种开放式的坊巷道路形态，其交通的基本构成是：各坊巷内部由胡同相通，各坊巷之间由方格道路相连，使得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南北相通，从而构成大都城完整的街巷道路网络；三是管理功能，大都城的街巷规划，总体上是以皇城为中心轴线，在城市的东西两侧对称分布坊巷，全市居民分布于各个坊巷之中，从对民众的控制与管理的角度看，城内居民都被控制在划地而成的坊巷居住区中，这样，坊巷就成为一种特定的统一管理下的居住形制，既体现了统治者对民众的严密控制与防范，又保证了城内的正常生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明代基本上完整地沿袭了大都城的坊巷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最终产生了流传明清数百年之久、最具北方特色的传统建筑形态——胡同、街巷、四合院。明初，由于将大都城北墙南缩5里，从而将城北侧的招贤坊、里仁坊、平在坊等十余坊废弃，处于城内的元代坊巷都得以继续利用。永乐十八年将南城墙扩展至正阳门一线后，新扩之地，均纳入北侧原有各坊的管理范围，仍继续实行元代以来坊巷规划管理方式。据有关文献记载，明初北京内城区域共有28坊。嘉靖年间扩建外城后，对新扩区域增设了8个坊，有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正西坊、正南坊、正东坊、崇北坊、崇南坊等。将外城的广大区域全部实施了坊巷管理制度。

#### 4. 确立了元以来北京城水源与漕运的基本格局

北京历史上就是水资源缺乏地区，自金建都燕京后，曾经开凿燕京至通州间的运

河，用以漕运华北地区的贡赋粮饷，先后开凿了金口河和金闸河等河道，但终因水源不足和技术上的原因，漕运时断时续，国家粮赋主要依靠陆运。元建大都城后，北方的粮赋供给多仰仗江南，而南方各省将大批粮赋运至北方，全靠陆运，耗资巨大，朝廷开始考虑漕运问题。《通惠河志》记载：“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上奏说：‘都邑乃四海会同之地，贡赋之人，非漕不可，若由陆运，民力惫矣。……宜穿凿河漕，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至达，诚国家永久之力’，元世祖忽必烈遂下令修建和整治南北大运河”。到至元二十八年，京杭大运河自杭州向北已达通州，江南各省粮赋的运送，可免除陆运之艰辛，依漕舟直达通州，加上由海运送达的数百万石漕粮，都集中在通州等待往大都城运送。但是通州至大都城的50余里路程，都要依靠陆运站车马运输，道路不平，人力物力耗费极大。郭守敬详细勘察了大都周围水资源状况和地形特点后，提出了将通州运河引至大都城内的宏伟规划。据《元史·河渠志》卷六十四记述：“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监郭守敬奉诏兴举水利，因建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浑水溉田，于旧闸河踪迹导清水，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南汇为积水潭，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处，共长三百一十步。坝闸一十处，共二十座，节水以通漕运，诚为便益。’从之。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赐名曰通惠。凡役军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没官囚隶百一十二，计二百八十五万工，……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钁为之倡。置闸之处，往往于地中得旧时砖木，时人人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两便。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陆挽官粮，岁若千万，民不胜其悴，至是皆罢之”。河道通行后，当江南的粮船成队驶入大都城内的积水潭时，“舳舻蔽水”，盛况空前，通惠河获得极大成功。

元代兴建的通惠河工程,对元大都城的建设与存在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以后北京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北京的水利建设史上,更是具有历史性的贡献:一是为北京城市开辟了新水源,引昌平区白浮村北龙山之白浮泉水至瓮山泊(今昆明湖),全长60里,为北京历史上第一条人工修建的调水工程。引水渠沿线接引了孟村一亩泉、马眼泉、冷水泉等泉水,保证了城市的充足水源;二是修建了北京上游的人工水库。郭守敬巧妙地利用了瓮山泊的自然地势,进行整治,形成蓄水的调节水库,对通惠河及大都城的供水量实施控制,保证了河道通航与城市的防洪及用水;三是在河道上修建了闸坝工程,由于北京地势明显西高东低,地面坡降过陡,水势无法缓流,郭守敬在通惠河自瓮山泊以下,沿长河、高粱河、积水潭、万宁桥、南河沿出城至通州,沿河道共建船闸24座,控制河水流量,取得了“节水行舟”的特殊效果。这具有创造性的水利工程设计,科学地解决了北京历史上存在的城市供水与漕运通航的问题。

明清以来,历朝都十分关注北京城赖以生存的这条通惠河的管理与疏浚,并留有大量关于疏通、治理通惠河的文字记录。《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八记载:“永乐四年八月癸卯,北京刑部言:‘宛平、昌平二县,西湖景东牛栏庄及青龙、华家、瓮山三闸,水冲决堤岸百六十丈’。命发军民修治”。《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七记载:“永乐五年五月丁卯,北京刑部言:‘自西湖景东至通流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闸。请以民丁二十万,官给费用修治’。命以运粮军士浚道……。”在明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嘉靖、隆庆等历朝都投入了大量人力以保证通惠河的通流。《明史》卷八十六记载:“成化中,漕运总兵扬茂言‘舟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费……’。但元时水在宫墙外,舟得入城内海子湾,今水从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复行……’。‘清浚西湖之源,闭分水清龙闸,引诸泉水从高梁河,分其半由金

水河出,余则从都城外壕流转,会于正阳门东。城壕且闭,令勿入三里河并流。大通桥闸河虽旱淤启闭,则舟获近仓,甚便’,帝从其议,方发军夫九万修浚。”在隆庆年“重修闸河记”中记述:“国家漕运京储,由里河自真扬直抵张家湾入京。先是,元人郭守敬建议开通惠河,其水之源委出入,元欧阳玄详记备载政绩碑可考也。然岁久浸废。于是百数十年来,粮远抵湾,由陆运六十里,始达于京师。官军告惫,公家失利,……。嘉靖丁亥,肃皇帝始用御史吴仲议,循守敬遗迹,修复闸河。于是舍路从舟,岁漕四百万石,皆自湾由闸入京。省费不贲,公私大便。”可见,在明朝通惠河仍然承担着对北京地区漕运粮赋的任务。

清代将通惠河(明称大通河)称为里漕河,各朝十分重视对河道的疏浚与管理。在《大清会典》、《漕运全书》、《河渠志》等文献中,记载了自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光绪等各朝对河道水系的疏通与管理,使通惠河继续发挥城市的供水与漕运的巨大作用。

### 三、关于对元大都城遗迹及文物建筑的保护

元代大都城,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度重视历史名城保护的今天,做好元代的旧城遗迹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对北京历史名城的整体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历史原因,保留至今的元代文物建筑和大都遗迹已不多见。在北京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对元代文物的保护工作还同时具有一定的“抢救”意义。结合全市文物保护及名城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发展目标,对元代遗迹的保护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 1. 对元代城墙遗迹的保护

由于首都城市建设向周边的扩展,使明初废弃的大都城北侧城墙遗迹,正在历年的建设中逐年缩小,目前仅幸存下了北侧及西

北侧9公里长的残迹,由于它保存了元大都城的历史“信息”,因此,十分珍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应当采取不同方式做好保护工作:

一是,对北侧9公里长的大都残墙,由于处于城市外围开放性的遗址公园内,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保护措施,要重点解决游人登踏而对墙体残迹造成损坏的问题;要保持土城残迹的历史原貌,严禁在遗址区域内挖坑、取土等“蚕食”土城遗址的行为;要研究采用高新科技手段和方法,解决和防止因风雨侵蚀所造成的夯土风化及土层剥落的问题,使大都城的城墙残迹长期保持其特有的“遗迹风貌”。

二是,在目前社会高度重视北京历史名城保护的形势下,应加大对元大都城历史价值的宣传,扩大元大都城的社会影响,在北京旧城范围内,应明确元代城墙的历史走向、具体位置及与明城墙的相互关系,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在元大都城东、西、南三面城墙的原址上,做出碑记和文字说明,安置于现状道路的一侧,使世人对元大都城的历史布局能获得整体的认识和了解。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做出一处元代城墙的形制与外部轮廓,如明代古观象台遗址,历史上曾是元大都城的东南角,大都城的南墙曾从此向西延伸,明初在城墙南扩时被拆除。完全可以利用观象台特殊的地理位置,向北做出一段明代城墙表示走向;向西做出一段元代南侧城墙的轮廓,以此方法展示历史上元大都城墙的分布、走向及元明城墙的发展变化。

三是,标明元大都各城门的历史位置、名称及历史变迁情况。明初,在对大都城的利用与明北京城的建设发展中,因城墙的北缩南扩,而

先后将大都城南北城墙的七座城门废弃,明北京城东西两侧的城墙及四座城门与元大都的原有城门相重合。

从实地考察看,北侧的肃清门、健德门、安贞门的大部分基址仍保留在路面以下,大都城东墙北侧的光熙门、南墙的顺承门、丽正门、文明门等城门基址已不复存在。特别是80年代修建环城立交桥,使东西两侧残存地下的城门遗址荡然无存。根据今后名城保护工作的需要,可在原有位置上,做出城门的标志、文字说明和城门的复原模型,陈列于原城门的一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掘保留至今的大都城的肃清门、健德门、安贞门等城门遗址,通过残存的历史实物,展示元大都的城门建筑遗迹。

## 2. 对元代建筑及遗存的保护

早在明初营建北京城的工程中,即已拆毁了大批元代建筑,如元宫城、皇城、太庙、社稷坛等。加之时代久远,北京地区保留至今的元代建筑已为数极少,在全市保存的历代文物建筑的分布中,元代的建筑只是“星星点点”。幸存至今的元代建筑有:大圣寿万安寺(妙应寺)、国子监、孔庙、万松老人塔、城隍庙、东岳庙、云台等,所留存的数量不多,但其建筑的作用和影响却十分重要,在北京城市建筑发展史中,代表了元代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很高

元土城遗址



的历史价值,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时代系列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不能否认,多年来政府部门在元代文物的保护上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长期以来在对其展示宣传上,往往是忽视这类建筑的时代背景及在历史名城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是元代的历史建筑多混同于全市明清时期的各类建筑之中,使人们难以从当时的历史时代去认识这一时代的建筑,其时代价值不能被大多数游人所认识;二是没能突出元代建筑与当年大都城的地域联系,还未能达到通过文物建筑认识元代及大都城的历史演变过程,人们在参观中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三是元代建筑的时代特点不突出,绝大多数的建筑在明清时代的修复中,都出现了结构与布局方面的改动,建筑彩绘等外部装饰也多是后期手法。因此,北京地区保留至今的元代建筑多为明清建筑风格,而元代建筑的历史特色已很难见到。为了突出和保持历史建筑的时代特色,今后,应在现有保护工作的基础上,要有计划地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元代历史建筑的维修,应尽量保持和恢复早期的建筑形制,以突出其时代特色,如孔庙的山门、东岳庙东配殿所保留的元代斗拱等建筑构件及工艺做法,都应原样加以保留,以保持建筑的原有价值,此外,对开放的元代建筑及遗迹,应制做安装建筑的时代标志,文字说明中应突出建筑在元大都城的位置及关系;二是对已不存在的元代著名建筑,应在其遗址上设立“遗址标志”,向公众展示一个地区的时代与历史的演变,从而保留和构成一个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如元代皇城的历史位置;元代中轴线的方位及走向;元代建于东、西城区的太庙、社稷坛的旧址等等,都应有计划地在原址设立遗址标牌,以此方法,使已失去的历史建筑仍得以丰富北京历史名城中元代的历史文化内容。

### 3. 对元代坊巷旧址遗迹的保护

北京城的坊巷格局自元代确立后,明清各代基本延续使用这种坊巷、胡同的模式,并构成了北京独有的传统居住形式与街巷

的景观特色。据有关文献记载,元代在大都城内设置了 50 坊。明初,由于将大都城北墙南缩而废弃了北城的十几处坊。明朝前期,北京城内共设有 28 坊,各坊形制较元代没有大的变化,嘉靖期间,修筑了南侧外城,新扩的外城仍实行坊巷制度,增设了外城 8 坊,全城共设 36 坊,清代初期,八旗军分驻内城,废除了传统的坊巷制,但坊巷形成的街道、胡同却被利用和延续至今。从著名教授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元、明、清三个时代城区图的对比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虽历经 500 余年的岁月,到清代末期,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区图上,在南北大街两侧的大片区域内,街巷、胡同分布十分规整。大街两侧的胡同两两相对,排列有序。绝大部分区域,仍保持着元大都时期坊巷、胡同的规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所长,早年主持的北京街巷胡同的考古钻探及研究证明:东西长安街以北保存至今的街巷布局与胡同分布、走向,都是 700 年前营造元大都城时修建的。

近年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危房改造的实施,旧城部分区域内成片的街巷、胡同、四合院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成片的现代化楼房小区,使部分传统区域改变了历史形态。北京市政府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采取了很多措施,先后公布了 30 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停止拆除旧城四合院;调查和公布了一批保护的傳統院落;市财政每年拨专款用于疏解四合院过密的居住人口;保护和修复原有的四合院等等,对北京旧城传统街区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从宏观上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在当前社会积极保护四合院的行动中,应同样重视对传统街巷、胡同的保护,特别是对东西城自元代保留至今的街巷、胡同区域,应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要采取严格可行的措施,参照国子监街的保护方式,设立街巷、胡同保护标志,同时制定街巷、胡同整治维修的管理办法,使全市自元代形成并流传至今的街巷、胡同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得以延续。

#### 4. 对元代通惠河遗迹的保护

元代开凿的通惠河水系,成功地解决了元大都城的供水与漕运问题,是北京历史上城市建设的一项创举,为元以后北京城数百年的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水源保证。因此,元代通惠河水利工程,是北京城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采取保护措施做好如下保护工作:

一是河道遗迹的保护。当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水利工程的起点——昌平龙山白浮泉遗址(当年泉水早已断流),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采取了保护措施。元代开凿的白浮泉至瓮山泊长达60里的人工调水河道多已废弃,仅在个别地点还隐约可见当年河道痕迹;当年瓮山泊至积水潭所流经的长河、高粱河、转河等地段的河道,至今仍在承担着为城市供水的功能,但是,经过近年的大规模整治后,历史的原有河道已加宽,堤岸已衬砌,历史的“旧貌”已换现代的“新颜”;自积水潭过万宁桥、经东不压桥、北、南河沿的御河段,过长安街向东南出东便门,这段河道早已废弃;东便门至通州北运河之间50余里的通惠河故道,目前依然承担着城市的排水与泻洪任务,但原有河道已展宽,堤岸都护有砖石。对于通惠河流经的上述不同地段的河道,特别是地面遗迹已不存在的地段,应有计划地在原河道遗址上,做出“元通惠河故道”的标志和说明,以向世人展示元代通惠河的古道方位;对沿用至今的旧有河道,如长河、高粱河、转河和东便门至通州段的通惠河故道,建议今后有计划地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设立标志和说明,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中的重要历史

遗迹加以保护。

二是河闸遗迹的保护。根据《析津志》河闸桥梁卷记载:“至元二十九年八月丁巳得卜兴工,三十年七月工毕。平章政事段贞专董其事。朝臣奏遂以其兴造始末成就数陈,世祖嘉其有成,赐名通惠。倡瑞建言,图上方略者,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领都水监提调通惠河、导漕运事郭守敬也。凡水之上下二百余里,置闸节水二十四,实有利于国矣”。郭守敬开凿通惠河时,针对北京东低西高(高差20余米)水流过急的地势,在通惠河的不同地段共修筑了24座河闸:有广源闸二、会川闸二、朝宗闸二、澄清闸三、文明闸四、惠合闸二、庆丰闸二、平津闸三、博济闸二、通流闸二、广利闸二等。这些闸坝设施科学地解决了“坡陡流急”、“河水走失”的难题,实现了“节水行舟”的目地,使通惠河在元代的城市供水、漕运和防洪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部分河闸设施在明清时代仍然发挥着原有功能。在90年代中期清理整治通惠河水系的工程中,曾发现并保留了部分地段发现的河闸遗迹,根据保护工作的需要,应加大对通惠河故道及古代水利设施的保护力度,应重点保护好现存的广源闸、庆丰闸、平津闸等河闸遗迹,并将陆续发现的古代河闸遗迹,列为通惠河文物保护的重要内容。同时,应有计划地在当年郭守敬设立的24座河闸旧址,统一设立标牌和文字说明,使人们在游览长河、什刹海(积水潭)、御河、通惠河的过程中,亲身感受北京历史上这一伟大的水利工程。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

# 明十三陵

##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简述

王辅宇

2003年7月3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通过了北京明十三陵、南京明孝陵为已于2000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此前,我国云南“三江并流”项目已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至此,我国世界遗产已经达到29处。这是我们国家的光荣,民族的骄傲。它将作为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与共同的保护,也将促进我国文物保护及管理水平的提高。

### 一、北京的世界遗产简介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它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和“文化景观”四类。

我国政府一贯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



明泰陵

护十分重视,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有关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活动。198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我国从此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之一。1986年,我国首批万里长城、北京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5处申报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迄今为止,北京已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除上述3处外,还有北京的皇家祭坛——天坛,北京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明十三陵。

## 二、明十三陵申报“明清皇家陵寝” 扩展项目的提出

众所周知,每一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与自然遗产,都是世界各国文化和自然宝库中的重中之重,宝中之宝。

明十三陵位于昌平区北部的天寿山麓,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陵墓的总称。它们是长陵、景陵、永陵、德陵、献陵、庆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定陵、昭陵、思陵。陵寝建筑具有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和保存较为完整的特点,是中国古代帝陵的杰出代表,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具有较强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近年来我市对明十三陵的文物建筑实施了较大规模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抢救保护工作。尤其是德陵抢险修缮工程列入了市政府文物建筑抢险修缮项目,市政府拨款1000万元给予资金支持,在保护修缮中,从方案设计、施工工艺、材料选用、規制布局等方面均严格遵循传统方法,本着尊重历史、绝不改变历史原貌的原则组织实施。2003年,市文物局又将康陵、庆陵的抢险修缮工程列入“人文奥运”项目,并在资金上继续予以支持。

世界遗产的申报,属于政府的行为,2001年10月,市文物局报请国家文物局,申请将明十三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2001年11月,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孟学农、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在昌平区区政府召开现场办公会,明确要争取将明十三陵列入2003年世界文化遗产“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中。随后,昌平区人民政府报请北京市人民政府,申报明十三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方案。同年12月6日,北京市市长刘淇、副市长张茅批示同意此项申报工作。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张茅副市长为组长,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昌平区区长佟根柱为副组长的明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昌平区及十三陵特区也相应地成立了领导小组。于是,明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动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 三、制定《北京市明十三陵 保护管理办法》及申报文本

为了加强对明十三陵的保护管理,2002年6月,由市政府法制办牵头,市文物局法规处、文保处、市规划局、国土房管局、环保局及昌平区相关单位抽调专人,集中起草了《北京市明十三陵保护管理办法》。2002年7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办法,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明确了明十三陵景区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提出了规划、文物、环境保护、绿化等方面的保护要求,使明十三陵的保护管理工作有法可依,促进了管理保护水平的提高。

根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关规定,申报文本每年6月前要送达法国巴黎的世界遗产中心。申报文本包括文字说明、图纸、照片等,均为精致彩色印制成册,并附简要幻灯片、录像或光盘以及图书画册等材料。文本内容包括申办项目的名称、地点、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面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由,对遗产的历史沿革、保护现状的描述,对遗产是如何进行保护和管理,总之要把遗产的价值科学地按标准说清楚。2001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明

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列为中国2002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四、准备好世界遗产专家的现场考查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除了文物本身应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外,世界遗产的审查机构对申报项目的保护情况、保护措施计划及环境整治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因此,环境整治工作非常重要。

2002年5月15日,昌平区政府召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拆迁整治工作会,全面部署拆迁整治工作,成立了以区长佟根柱为组长,副区长王振华、杨旭明、陈秋生等为副组长的拆迁整治领导小组,并对拆迁的分工及时间限制做了安排。

2002年5月31日,常务副市长孟学农对申报的前期工作、治理方案进行视察,指出:1. 要求特区与明史界、文物界专家学者加强联系,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明代优秀文化,使之成为昌平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 文物修复、古建筑修缮要修整如故。3. 十三陵每个村都要编制村庄详细规划,杜绝私搭乱建,保护陵区良好风貌。

2002年6月10日,长陵镇召开拆迁动员会,规定拆迁时间为6月15日~7月15日。

2002年7月1日,明十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受昌平区政府委托与长陵镇政府签订“关于委托长陵镇政府完成农户搬迁补偿工作的协议”。

2002年7月7日,昌平区区长佟根柱视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指出:“做好农户拆迁后场地清理整治工作,要与周围环境景观相一致,要求环境整治7月底全部完成。”

2002年7月13日、7月31日,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司长杨志军、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视察了德陵修缮工程及环境整治情况,提出了切实的改进措施。

2002年6月28日、8月12日,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先后两次视察定陵整治、德陵修缮情况,对整治情况表示满意,并指出要通过申报世界遗产,把十三陵保护工作做得更好。

截至7月底,拆除定陵内人工修筑的花池4座,昭陵内5座,长陵内改造花池4处,神路旁改造花池2处;完成了康陵监墙抢修、长陵祔恩门月台改造工程;重点整治了长陵至景陵段,北新村村口至德陵段环境及垃圾清运,沿线道路两侧边沟内的杂草清理;景陵宫前,永陵前农户的搬迁;万娘坟至思陵的公路建设;未开放陵寝内的说明牌示安装,陵区内各村名牌的安装。还有陵区内高压电缆的改造……

2002年8月27日~9月1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派韩国成均馆大学建筑学教授、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李相海对明十三陵进行实地考察。十三陵特区以多媒体演示的方式,详细地介绍了十三陵的概况、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管理的情况。李相海专家参观了河北易县的清西陵、河北遵化县的清东陵,并考查了明十三陵石牌坊、神路、长陵、十三陵水库、献陵、庆陵、景陵、永陵、德陵、昭陵、思陵、王承恩墓、郑贵妃坟、定陵地下宫殿、通风机房、十三陵博物馆展厅、监控室、资料室及泰陵、康陵、茂陵、裕陵、碓石口一带的村落、景陵陵前拆迁的情况。

李相海专家对明十三陵杰出的文物价值及北京市多年来在十三陵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在文物建筑修缮原则的掌握、文物保护与旅游的关系、陵区环境整治、制订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和建立相应的监测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将写出考查报告,经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审议后形成评估报告上报世界遗产中心。可以说,申报工作暂时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作者为市文物局文保处干部)

# 清代著名园林畅春园大宫门建筑遗址 及西花园一石桥遗址发掘简报

王清林 王 策 朱志刚 周 宇

2000年4月25日至6月4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配合西北四环路工程的建设中,对清代著名园林畅春园大宫门建筑遗址和西花园一石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总面积2300余平方米(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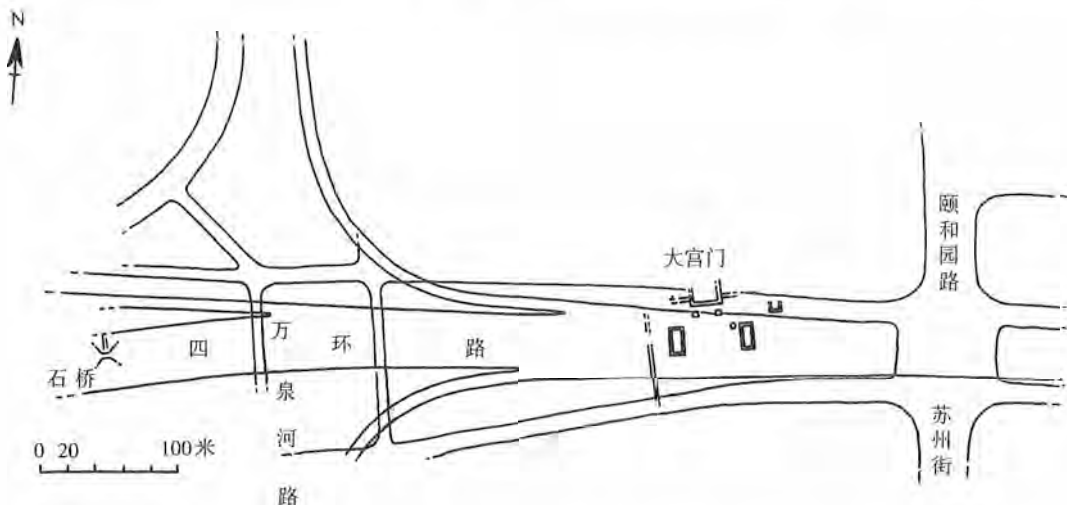
## 一、畅春园大宫门建筑遗址

畅春园大宫门建筑遗址位于海淀镇西上坡以西,现存中部的大宫门基址、两侧的朝房基址和西面的一段院墙基址(照片1)。由于近现代地面设施的破坏,这些建筑遗迹基址仅部分保存下来。受到当时地形的限制,这组建筑群的方位略偏向东南,每一单

体建筑的基础做法也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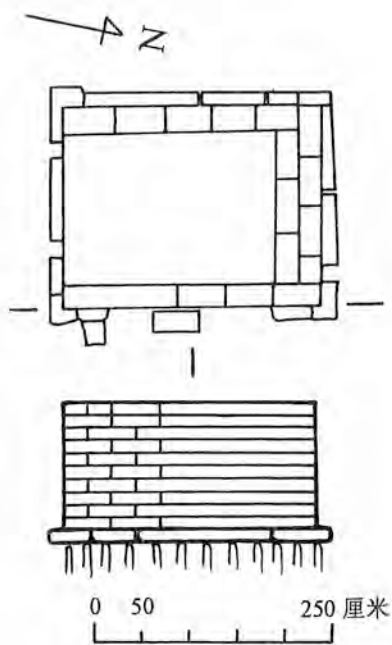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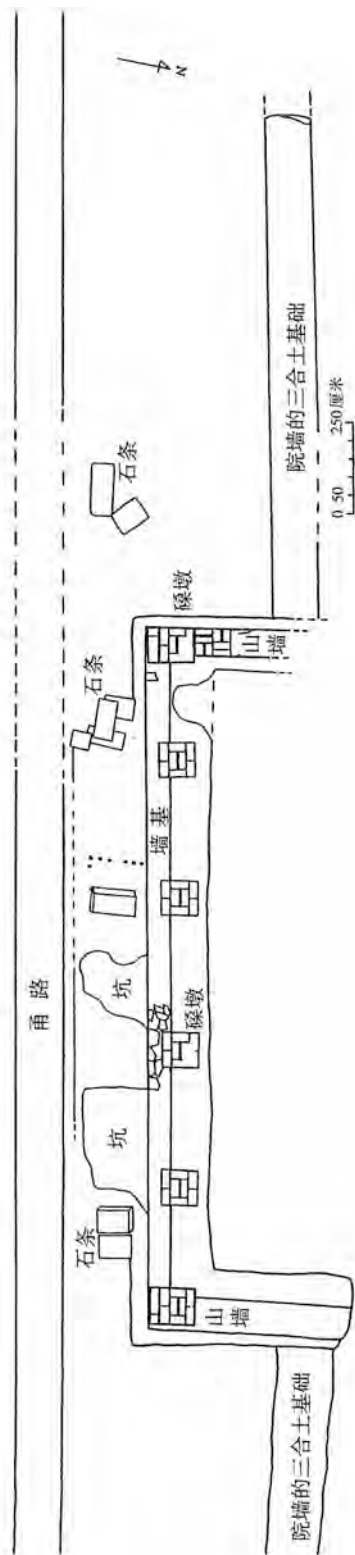
畅春园大宫门建筑遗址,居于正中,面阔五间。东西长约17米,北半部残毁,南部墙基上有6个砖砌磴墩,两侧与院墙相接。磴墩平面方形,边长为1米,现仅剩底部一层的砖痕。东西两山墙宽0.9米,由青灰砖两顺两横错缝所砌而成。墙下有三合土基础,基础宽为1.5~2.0米,厚0.7米,此面距现地表0.6米。三合土基础下设有地丁,地丁直径为0.1~0.11米。院墙宽1.6米,厚0.7米,距现地表0.7米,向东、向西延伸(图二)。

大宫门南侧6.3米处对称分布二个砖墩,东西相距16.2米,规格相同,平面均呈长方形,南北长2.7米,东西宽2.1米。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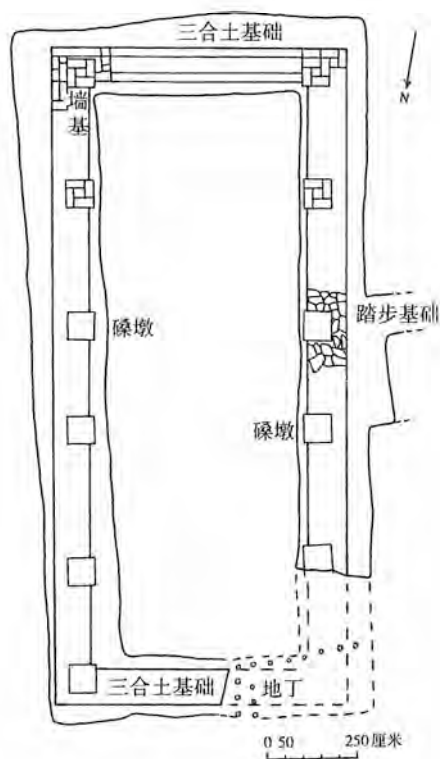


图一 清畅春园大宫门及西花园石桥遗址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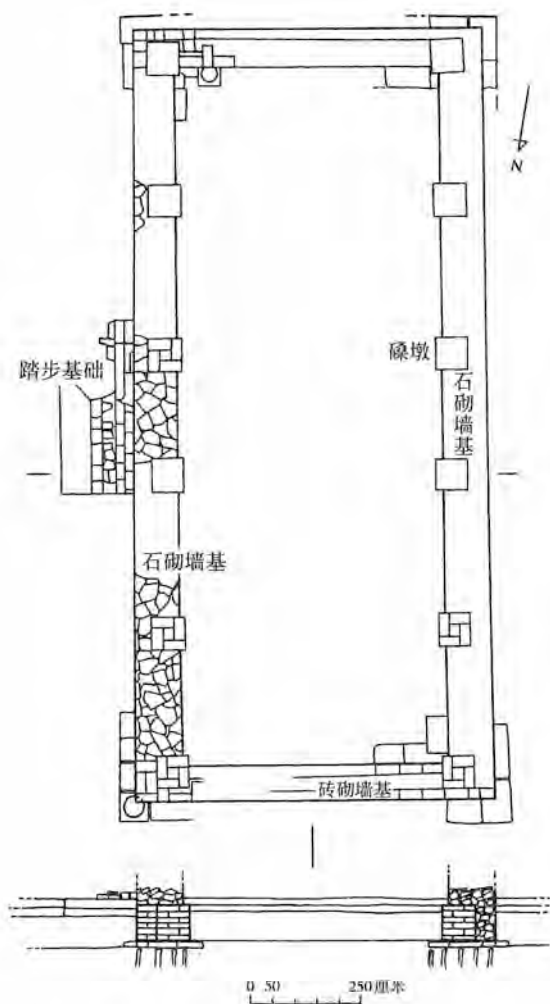
图二 畅春园大宫门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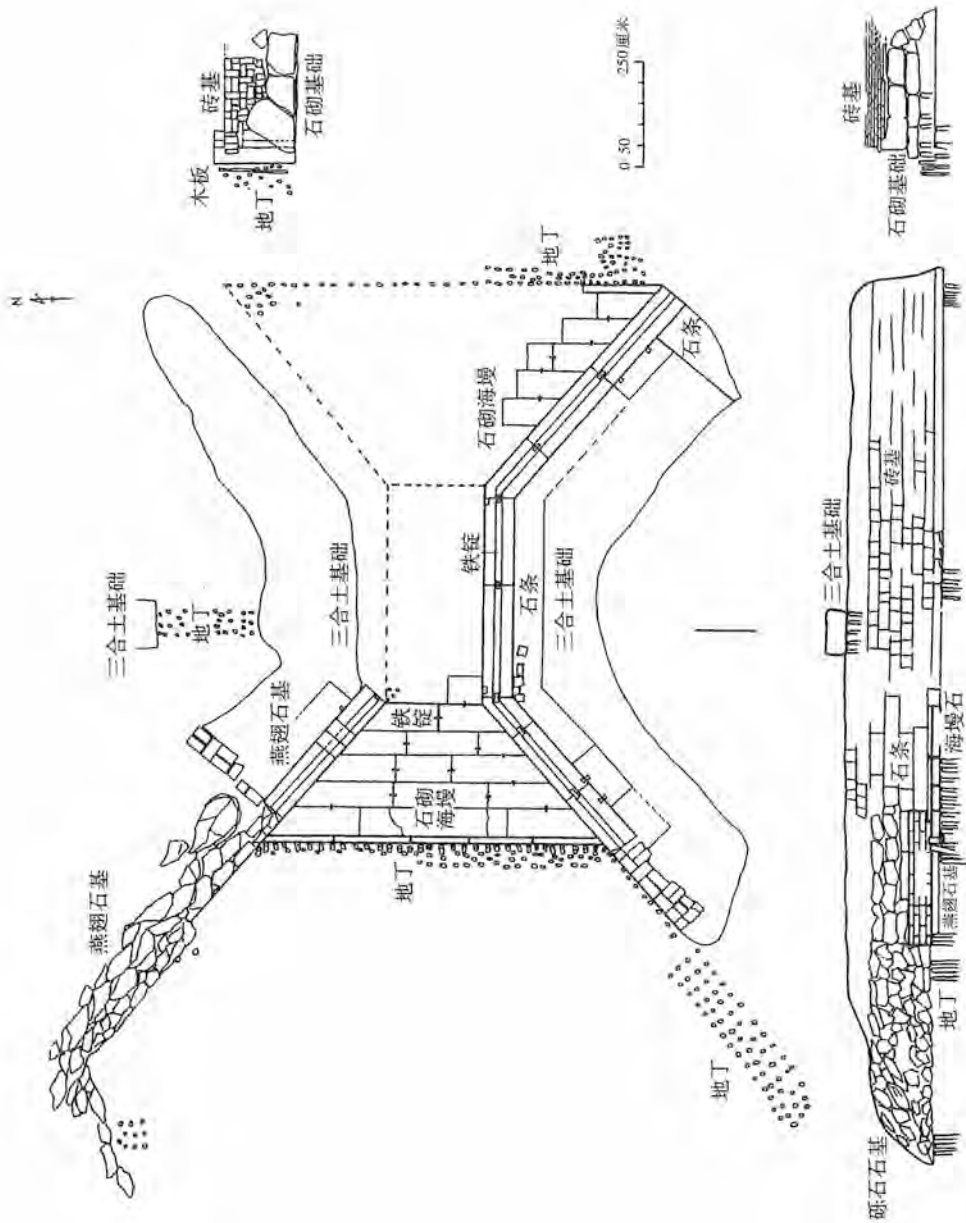
图三 畅春园大宫门西侧砖墩平、侧面图



图四 畅春园东朝房平面图



图五 畅春园西朝房平、剖面图



图六 西花园石桥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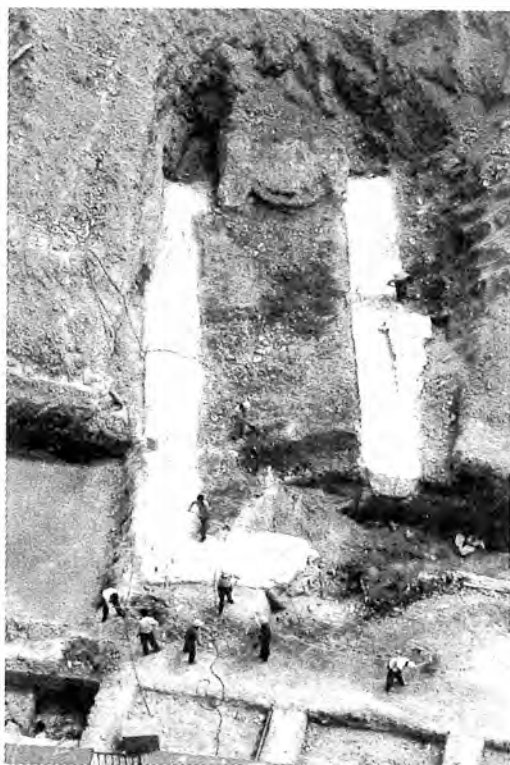


照片 1 畅春园发掘现场全貌

照片 2 畅春园大宫门  
西侧砖墩



照片 5 西北四环路工程  
出土清代西花园  
石桥遗迹



照片 3 畅春园东朝房基址



照片 4 畅春园西朝房基址

侧的一个砖墩现存高度 1.35 米,其下面基础石条及砖下设有地丁(图三;照片 2)。这两个砖墩应是大宫门前兽座(青灰砖规格:0.5×0.24×0.12 米)。

东、西朝房长 17.1 米、宽 8.1 米,面阔五间。东西朝房相距 8.4 米,院面距现地表 1.1~1.2 米。东朝房仅存三合土基础及东西墙基上砖砌礅墩痕迹各 6 个,礅墩长宽均为 0.75 米,三合土基础宽 1.8~2.0 米,厚 0.75 米,此面距现地表 0.75 米,其下设地丁(径为 0.1~0.11 米,相间 0.25~0.35 米),由墙基痕迹可知南北山墙宽 0.95 米,东西墙基宽 1.1 米(图四;照片 3);西朝房保存状况较好,南北山墙基础砖砌,东西墙基由砾石垒就,东墙基残高 0.9 米,东西墙基长宽及砖砌礅墩规格都与东朝房相同。正中踏步基础也基本完整。该建筑下部有地丁和三合土(图五;照片 4)。

东朝房西北角外侧发掘出一明代砖井(砖规格:0.2×0.1×0.5 米),直径 1 米、深 8.6 米,井口距现地表 1.8 米,井底有木井圈,厚 0.25 米,内径 0.76 米,砖井座于木井圈之上,井圈内外侧各出井壁 0.1 米,应是明代清华园内的遗存。

西朝房西侧有一南北向三合土墙基,东距西朝房西墙基约 17 米,南北两端均未到头,宽 1.3 米,厚 0.75 米,上面距现地表 1 米,其下有地丁(图一)。

在大宫门南墙基与门前二砖砌兽座间有一东西向甬路,两端延伸,宽约 1.25 米。

## 二、西花园一石桥遗址

西花园石桥遗址位于万泉河路以西,已毁,桥南北跨度 2.25 米,东西宽 5.2 米,残高 1.7 米,桥底平铺石砌海墁,距现地表高 3 米,两端各有一闸槽,海墁下有地丁(木桩径为 0.1~0.15 米,相间 0.8~0.15 米),保存状况较差。西北堤岸桥体内侧用规整石条垒砌,石条与石条间由铁锭连接而成,石条外侧用不完整大青砖砌筑,燕翅两侧河堤由不规则石块砌筑所成(图六;照片

5)。据所在位置及其西北堤岸的垒砌情况,该桥当为畅春园西侧西花园南端的遗迹。

桥北侧正中有一南北向三合土基础,南端被毁,向北延伸,宽 1.1 米,厚 0.5 米,其下有地丁,上面距现地表 0.5 米,应是墙基。

鉴于有关畅春园和西花园建筑格局的文献记载十分稀少,此前也未进行过正式的考古发掘。特别是畅春园遗址范围内,目前已是高楼林立,其遗址的破坏状况可想而知,因此这一次市文研所借西北四环路工程的机会对该处进行的发掘,为了解这一遗址的建筑形式和规模提供了最后的机会。

## 三、关于畅春园及西花园

据《北京通史》第七卷记载:清定鼎中原后,至康熙年间开始在西郊建筑行宫,在供清帝经常驻蹕和听政的西郊皇家园林中,畅春园应是经营最早的一个。其园位于南海淀大河庄之北,本是前明皇戚武清侯李伟的别墅。康熙因故改建,并赐名畅春园。康熙在御制《畅春园记》中讲道,此园的重建,只是在“圯废之余”的基础上,“少加规度”。“因山成峻,就谷斯卑。咨彼将作,毋曰改为”。所以“撰辰始经,不日落成”。但是究竟何时始建及竣工,都未详言。不过根据《清实录》和《起居注》的记载,康熙首次“移驻畅春园”是在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1687 年 4 月 3 日)。由此推知,畅春园竣工时间也应当在这一年。

畅春园建成后,不但成为每年夏天康熙奉太后避暑的离宫,而且成为紫禁城外的政务活动中心。《日下旧闻考》记载道:西花园在畅春园西,与其相接,“皇上问安之便,率谐是园听政。”当康熙在畅春园时,朝廷大员和皇子往往也随行。为了给这些人提供随侍的居处,在畅春园左近地方,或修复明代遗园,或造新邸。于是清朝园林建设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绘图:韩鸿业

摄影:刘凤亮

(作者为北京市文研所业务人员)

# 博物馆近20年管理思想浅析

● 解小敏

近年来,博物馆生存危机成为博物馆界不得不面临的严峻问题,而“救救博物馆”的呼声也愈益增强。改革刻不容缓,而改革的焦点便集中于管理——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激励和领导等环节来协调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

对于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博物馆而言,科学、有效的管理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现有博物馆素质和水平的提高,见效最快、投资最少、潜力最大的措施,莫过于加强管理”<sup>①</sup>。博物馆管理的内容包括博物馆的管理思想、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等。管理思想是管理的哲学观念及管理的目的和出发点,它是博物馆管理的核心与灵魂。

本文分析了文革以后二十多年来中国博物馆管理思想的发展,总结其中规律,探讨博物馆管理改革的出路。

## 一、有中国特色的 博物馆管理思想的形成与完善

“十年文革”浩劫使中国的博物馆事业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管理思想被歪曲,工作无法正常开展。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广大的博物馆工作者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博物馆事业的恢复和整顿中。1977年8月全国文博图工作学大庆座谈会及同年10月博物馆文物保管工作座谈会推动了博物馆的整顿及重建,各博物馆组织机构基本恢复到三部制的旧体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博物馆加快了拨乱反正步伐,从此走上了适合中国国情、讲求实效、稳定发展、改革探索的新道路,中

国博物馆事业自此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1979年5月《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修改了“三性二务论”,明确了博物馆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并将三部制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提出博物馆今后研究重点是博物馆学的研究和对有关专业学科的研究。此次会议为今后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博物馆学理论研究也相继开展起来,国家将博物馆建设放到重要地位,正式列入第五个五年计划,根据“讲究实效,不务虚名,按需施教,学以致用,教育与文博工作相结合”的教育规划原则,培养了新时期的大量博物馆专业人才。“不继续提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的提出,则使得长期以来博物馆的政治价值取向得到遏制。

80年代以来,博物馆的科学管理提上日程,论述博物馆管理的文章和著作开始出现<sup>②</sup>,明确了博物馆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文化事业单位,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管理,提出博物馆的组织管理原则,一方面必须贯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原则,另一方面还要保证博物馆的各项工工作,实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的政治路线。管理工作力争科学化、现代化。各博物馆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试行和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批判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以调动各级、各部门、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以上理论研究成果是中国博物馆从国情出发,吸收欧美、日本等国有益的管理理论和工作方法,理论联系实践而进行的深入探索。长期以来以苏联为师的经验管理和行政指令型管理得以改观。理性的、科学的研

究及应用于实践所产生的效果,为 80 年代中期博物馆管理的探索和改革奠定了基础。1982 年春,中国博物馆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博物馆学研究新时期的真正开端。

随着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博物馆很快也卷入了改革的潮流中,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去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开始了博物馆界长达十余年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争。1982 年“以文养文”的发展思想第一次在文物界公开提出,一直到 1984 年夏,注重经济效益、大抓经济收入在博物馆形成了高潮。许多博物馆抓住有利时机,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也有的博物馆出现了盲目的、不正当的抓钱风,或仍固守传统的经营方式。要求摆正两者间的关系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处于困惑中的博物馆需要深化对自身性质的再认识。

进入 80 年代,受经济过热影响,全国平均每 10 天新建一个博物馆,而到 1984 年每 2.4 天竟然就有一座博物馆出现<sup>③</sup>。博物馆过度发展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大量挂牌馆出现,冗员大增,部门矛盾扩大,传统三部制的弊端也愈益暴露。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中向企业放权让利,以权利换效率的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及社会各行业科学管理观念的深化,博物馆也不可避免地受经济大环境影响,管理思想如何适应“十二大”提出的“现阶段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形势,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问题。传统的管理模式已极大束缚了博物馆的健康发展及其创造性,平均主义利益分配也影响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国家财政负担过重,这种统得过多、过死的行政干预机制必须有所改变。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博物馆界接触到西方的管理思想、组织体制和工作方法,国际上反对文化一体化的斗争中出现了弘扬民族文化的呼声,新博物馆学运动也蓬勃兴起<sup>④</sup>,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大环境而独立发展。变化着的管理环境呼吁管理思想的改革以适应它的发展。

## 二、管理思想的发展与改革

### 1. 新时期管理思想的确立

1984 年党和国家指出了重点建设博物馆事业的方针,同年 4 月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做出“对现有博物馆认真地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指出“扩大范围,增加博物馆种类,是当前加强和发展博物馆事业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要求“基本上市市有博物馆”。

1984 年我国现有博物馆的整顿、改革工作开始起步,之后提出了今后若干年内发展博物馆的方针,文化部文物局拟定 2000 年博物馆事业的远景设想则指明了方向。此时期明确指出博物馆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标志着我国博物馆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重点建设”成为宏观管理的主导思想,走一条兼顾两方的数量、质量型发展道路。根据这一思想,针对 80 年代初期博物馆发展存在的问题,在重建、新建博物馆的同时,对于老馆的整顿和改革则重点放在提高和搞活上,宏观上抓两头,即“重点馆”和“挂牌馆”,抓博物馆现代化及经济收入<sup>⑤</sup>。

以上新时期管理思想的确立为 1985 年开始的博物馆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这次改革将 80 年代初形成的管理内容科学化、具体化,是一次思想上的飞跃。

2. 1985 年我国博物馆界开始了探索博物馆管理规律的历程,并展开了对于科学管理的广泛讨论,主要集中于博物馆科学管理的具体含义和内容、指导思想、管理体制、经营管理及立“法”等问题,这是对于 1984 年中国博物馆学的有关科学管理学术讨论会的深化认识。

#### (1) 博物馆科学管理理论初步形成

随着现代科学由“小科学”转变为“大科学”,许多基础科学互相渗透交叉结合为一个整体,传统博物馆学正经受着这种潮流的挑战,许多临近学科的知识科学技术都已

渗入了博物馆的工作。一些学者将这些理论引入到博物馆管理的科学中来,并认为这是改变博物馆落后状态的有效途径,是时代的要求,应运用最新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改善博物馆管理现状,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管理科学化,从而达到管理现代化。在管理方法上注意到单纯依靠行政方法及“人治”的缺陷,而提出实行法治及经济手段,几种方法有效结合,达到科学管理的内在要求,是更为合理的方式。

在此理论基础上,博物馆界对科学管理的具体含义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以“三论”为指导而形成了博物馆宏观管理的具体内容,并明确了博物馆管理任务,且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三论”也为博物馆宏观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存在的无组织性、松散性、低效性、随意性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一些学者因而提出实行企业化组织管理系统,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单线结合,中央抓线,地方管片,条块结合,结构紧密的博物馆组织网络,实行统筹全局,综合具体的科学管理<sup>⑥</sup>,这样能够保证目标清楚、分工明确、合作协调、信息畅通、运营有序。

#### (2) 微观博物馆管理体制的发展

**领导体制:**在我国,博物馆领导体制一直是馆长负责制和党委制并行,这种体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办事效率低和拖拉作风,管理者无权管理,不利于馆长及业务人员的工作,因而提倡建立馆长负责制,党委则不干预具体业务和行政工作,仅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并起监督、保证方向的作用。这样既可实现精兵简政,又可实现博物馆的整体工作效益,这也是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事业体制模式。馆长负责制下的“三层次或两层次”四部结构的综合管理系统<sup>⑦</sup>得到提倡,上至馆长、下至普通工作人员的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得到逐步的重视和推广,馆长素质问题也得到了广泛重视。

**业务体制:**从80年代开始,人们在对西方博物馆组织体制了解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三部制”所造成的问题,“三

部制”所带来的诸多弊端遭受到严重的批评,按系统论、控制论的观点建立三位一体的业务体制得到认识<sup>⑧</sup>,“一条龙制”在得到提倡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试行后又出现了回归旧有体制的趋势,当然也有学者仍认同“三部制”,认为这是同我国具体情况相适应的,其问题可通过完善管理、加强交流等措施来解决<sup>⑨</sup>。到90年代初期,在总结了一些博物馆“三部制”进行改革的经验后,人们对其认识渐趋冷静,甚至有学者根据博物馆工作性质、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的相对稳定性,而做出了“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基本格局将不会有剧烈变动”<sup>⑩</sup>的客观推断。

#### (3) 博物馆经营管理思想渐趋形成

博物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争论贯穿于整个80年代,这已成为博物馆发展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尽可能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成为时代的呼声。1985年文化部文物局下达的关于“博物馆自身要加强经营管理,广开财路,为观众服务,为社会服务,并同时获得经济效益”的指示,正是适应博物馆发展潮流的产物,“以文补文”的经营活动逐渐展开。随着“社会效益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唯一准则”的提出,博物馆经营管理思想也走上了正确的轨道。1987年2月《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暂行办法》及“重视经济效益是科学管理的客观需要”,都是对经济效益进一步深化认识。讲求经济效益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仍有学者对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存在分歧,也有人认为讲经济效益损害了博物馆的性质<sup>⑪</sup>,这仍有待于思想上的进一步统一和认识深化。

(4) 藏品管理主要是标准化、现代化及科学化的探讨,尤其是计算机的应用对于管理的影响,这涉及到经济发展水平、客观物质基础及工作人员素质等问题,受主观影响不大,故不作本文重点,从略。

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博物馆管理的探讨与改革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在这场变革中,有些博物馆抓住机遇,改善了管理,进行了有益探索,适应了博物馆及社会发展需

要,其中以上海博物馆较为成功,“上博模式”<sup>⑫</sup>也得到了博物馆界的重视。这一阶段科学管理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这种改革尚未形成大气候,虽在部分馆内实行了馆长负责制、目标管理、聘任制和责任制、优化组合等管理形式,但由于涉及到体制改革,缺乏强有力的宏观指导,也无得力的政策保证,故而未能在全系统展开,许多还仅限于理论探讨。博物馆从经验管理上升到科学管理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没有思想的极大解放、改革观念的深入及适宜的管理体制,管理思想最大程度地适应博物馆发展需要是不可能产生的。

### 三、博物馆管理思想改革的深化

80年代以来,尽管博物馆科学管理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社会其他行业相比,博物馆的发展却是缓慢的,经费短缺、机构不健全、法律不完善,总体管理水平不高、陈列形式陈旧、专业和管理人才缺乏,以至多数博物馆还不能发挥其主要功能,老馆自身机制变异受传统观念束缚,缺乏与社会的横向联系,自我封闭意识仍然存在,而新馆又沿袭老路子。于是博物馆面临生存危机,财政困难,人员流失,业务不求进取,严重滞后于经济及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加强博物馆与社会的横向联合;博物馆企业化和私人博物馆的激增”成为90年代世界博物馆发展的总趋势<sup>⑬</sup>。新的环境变化同样推动着中国博物馆管理思想改革的深化。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而提出的“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讲话及“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推进文化事业体制的改革;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90年代特别是“八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着力点放在“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改进管理,增强活力,提高博物馆整体水平和效益上”,要力争使博物馆的质量上一个台阶;学者也提出了博物馆行政管理及博物馆内部管理

体制改革方向<sup>⑭</sup>,这成为90年代管理改革的指导思想。此期改革深化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博物馆宏观管理思想、系统理论应用及博物馆内部的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和经营管理观念深化等方面:

#### (1) 系统理论应用趋于成熟

80年代中期系统学说主要局限于博物馆管理内部,并未真正发挥系统的优势,拓展与社会其它子系统的联系,而90年代以来此理论应用则逐渐走向成熟,既表现在博物馆体制管理中,也表现在博物馆与它学科结合而形成新的学科上。“博物馆学与其它现代科学交叉、渗透的横向一体化及博物馆学与实践相近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近的纵向一体化”形成了博物馆管理科学同系统工程学、运筹学、统计学、控制学、教育学、心理学及新兴科学建立密切联系。博物馆学与文化经济学横向联系而形成了博物馆经济学——探讨博物馆的经济规律,文化经济学中的图书馆、科学技术、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的管理与改革可为博物馆管理提供重要参考。文化产业的兴起是博物馆“多业助文”的必然结果,企业管理模式的提出,办馆体制的改革都是博物馆与其它子系统结合的具体形式。

在博物馆管理学科内部,则将系统的目的性、整体性、层次性与目标管理有机结合,体现最优化原则。正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才有了各种人才的最佳组合、藏品的科学管理、博物馆最佳的整体形象与整体效益,也有了整个博物馆事业的协调发展。

#### (2) 宏观领导体制的重大转变

我国博物馆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缺乏主动性、能动性的传统事业型管理体制,80年代旅游开发和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导致博物馆发展过快,90年代出现了从功能的扩大化回归到规范化的趋势<sup>⑮</sup>,此时更强调了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宏观控制,“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打破大锅饭束缚,简政放权,把博物馆推向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通过经济、法律、行政、舆论、教育等手段对博物馆进行指导、规划、协调、服务和

监督。

80年代中期对于我国博物馆管理中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进行批判,到90年代则主要集中于受企业联合、公司化、集团化影响而产生的将博物馆管理由纵向型转变为横向型、成立现代化博物馆网络的热门讨论,同时受国外博物馆系统管理的影响,中国学者提出了改分散式布局为集中式布局<sup>⑥</sup>的发展趋势。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文物局职责、地位的进一步明确和突出,这些都是宏观管理改革的结晶。

#### (3) 微观博物馆组织体制改革的深化

领导体制改革上进一步深化了馆长负责制,博物馆内逐步推行了行政领导聘任制和目标责任承包制为中心的管理体制。馆长权限提高的同时也对现代化的馆长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水平的领导者使得博物馆协调、有序、高效运转,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以民主集中制和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为保障,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的贯彻使得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责、权、利相结合的竞争机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博物馆中得以实现。由此使得博物馆更富于活力,管理也更科学化。

业务体制上对于“三部制”的讨论趋于平静,在没有更为完善的体制代替它之前,通过岗位责任制及系统的有效的目标管理仍是可行的,故而90年代在业务体制上并未有大的变动。

#### (4) 经营管理思想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博物馆以新的机遇和挑战,有偿服务、讲求经营、从服务走向经营的思想在博物馆界达成共识。“以文补文”、“以文养文”已扩展到“多业助文”,经营者从更广阔的角度创造经济效益,多元服务体系被视为更加有效的途径。博物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营销意识、广告意识、成本预测及决策分析也得以推广。博物馆积极创收,多业助文,开展市场经营以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形成自身运营的良性循环,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

务,这对博物馆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博物馆经营管理中必须首先考虑社会效益。这是衡量其工作优劣的首要标准,也是其存在的前提。

博物馆管理各方面的改革方案仍在进一步深化,处于转型期的博物馆走向是人们迫切关心的话题,更为合理、有效的管理模式尚待开创。

## 四、结 语

近2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对外开放而使得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向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简单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发展到自我实现的需要。正是处于这种环境之中,因而中国博物馆管理思想的发展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 (1) 博物馆管理的社会化

80年代初期,博物馆科学管理只是单纯的博物馆的活动,缺乏与社会的、大众的联系。而到80年代中期,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理论逐渐引入此领域,但实践上并未真正贯彻。90年代系统理论根植于中国而“开花结果”,博物馆与其它基础科学互相渗透,博物馆学的各种分支学科形成,博物馆管理学成为社会化的产物,真正与社会发生广泛联系。管理思想的确立,管理内容、管理体制、管理手段的变化无不与社会有关,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管理的优势已为博物馆所借鉴。

#### (2) 管理走向法制化、规范化

博物馆宏观、微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发展,正是体现了从政治价值论、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逐渐发展到90年代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舆论、教育等手段,注重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约束。博物馆各阶段管理思想的制定,现阶段博物馆数量的适度发展,聘任制、目标责任承包制的实行、藏品管理的标准化,正是法制化、规范化的必然结果。法制的规范性、稳定性、客观性、强制性

避免了过多的人为干扰,能促使博物馆尽可能的科学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也为博物馆从“人治”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提供了外部条件。博物馆管理的法律法规正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 (3)经营观念逐渐深入

80年代中期,“以文补文”将经济效益的观念深化,但由于受博物馆无偿服务的限制,有些人仍认为讲求经济效益有损于博物馆形象,此时经营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是原始的,博物馆并未真正面临生存危机,因而计划经济孕育了大批不思进取、单纯依靠上级拨款的博物馆。而到90年代以后市场竞争已使得博物馆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若不转变思想、从服务走向经营,任何仅依靠财政拨款的博物馆已不可能生存并发展。企业管理模式的引进成为必然趋势,讲求经营观念也保证了博物馆不与社会脱节,正体现了博物馆的社会化。

以上仅总结了近20年博物馆管理思想发展的几个较为显著的趋势,博物馆管理改革的深入是历史的必然。“居安思危”,数十年积累的问题不得不令人深思。而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也为博物馆管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博物馆管理理论亟待完善,管理体制亟待创新;纵观20多年来管理的发展历程,最大的问题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甚至于“亡羊补牢”,忙于“补漏”,而缺乏预见性,也缺乏根本性措施,更缺乏创新性。目标责任承包制存在的短期行为不顾长远利益,不利于博物馆健康发展的弊端,尽管已为博物馆界所认识,但并未有根本性的解决方案;长期以来博物馆“高墙深院”的痼疾并未消失;国家对博物馆宏观管理体制依然存在纵向信息传递时效差的缺憾;“三部制”也非最佳的业务体制,但仍未有更适宜的体制来代替它。博物馆管理体制的创新,管理理论的完善必须以工作人员或管理者素质的极大提高、思想的极大解放为前提,这也对博物馆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 (2)领导者素质:现代管理在人、财、物

的既定资源条件下,管理者则是最富于活力的因素,甚至是发挥创造性的作用。领导者素质包括能力素质、知识素质和政治素质,博物馆界还广泛存在以政治素质为先决条件,却往往忽略知识素质,这阻碍了博物馆的进一步发展。一个现代化的领导者不仅要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知识、管理方法和手段,有敏锐的头脑,较强的战略观、整体观、超前观、创新观和时效观。否则只能滞后于博物馆的发展。

(3)追求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尽管讲求经济效益是博物馆生存的必然要求,但随之带来的研究、陈列、保管工作的削弱,学术氛围的破坏以及研究者无法正常或全心全意的工作,为博物馆的长远发展带来危害。尤其是将一些本应无偿服务的变成有偿服务,降低了博物馆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些博物馆将重心放在旅游参观上,对于藏品造成严重威胁<sup>⑦</sup>。而且,浓厚的商业气氛也损害了博物馆“文明殿堂”的形象,影响了观众参观的氛围。再者,从长远而言,博物馆始终是为人民和社会发展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社会效益是唯一的追求目标,经济效益必须服从、服务于社会效益,而解决博物馆的生存危机更需要社会的支持。博物馆如何拓展与社区的联系,争取社会更为切实、广泛、全面的支持,是一个引起关注的话题。

(4)新观念的渗入:90年代世界“新博物馆学”将迪斯尼乐园的公众娱乐和表演模式应用到博物馆中,博物馆的娱乐化趋势和职能的多元化进一步增强<sup>⑧</sup>,博物馆作为“文化中心”的含义被愈来愈多的提出,博物馆内涵的重新诠释<sup>⑨</sup>日趋重要,功能的回归抑或是扩大化<sup>⑩</sup>是管理思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随着“网络”观念的深入人心,一方面使得博物馆能与观众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联系,有利于博物馆职能的发挥,但同时也带来了观众有可能减少及信息资源管理等诸多问题,这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践检验。

其它诸如社会办馆,私人博物馆渐渐兴

起,教育观念的更新,新型企业及文化产业制度等都对博物馆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博物馆管理思想只有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才能促进中国博物馆事业更快、更好的发展。

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了未来几十年内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抓好博物馆的科学管理是改革的中心环节,而科学的、有效的管理思想的产生是决定性因素。

①单霁翔:《博物馆管理》,《北京文博》1996年第2期。

②于坚:《博物馆管理规律初探》,《中国博物馆》1989年第4期。

③苏东海:《当代时间博物馆大发展的剖析》,《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2期。

④《生态博物馆的思想来源》,《中国环境报》1998年2月8日。

⑤胡骏:《中国博物馆事业宏观管理中的一个问题》,《中国博物馆》1985年第2期。

⑥⑦⑧马惠飞:《浅谈系统原理与博物馆组织机构》,《中国博物馆》1985年第2期。

⑨子系:《博物馆科学管理学术研讨会综述》,《博物馆通讯》1985年第2期。

⑩宋向光:《论博物馆“三部制”的完善与发展》。

⑪梁太鹤:《正确认识博物馆的社会效益问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林子平:《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几个基本认识问题》,《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

⑫吕建昌:《上海博物馆管理改革现状考察》,《中国博物馆》1989年第1期;马承源:《上海博物馆工作汇报提纲》,《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3期。

⑬杨秋莎:《博物馆观念改变的一点探讨》,《中国博物馆》1992年第3期。

⑭梁吉生:《深化改革,提高博物馆整体水平》,《中国博物馆》1992年第3期。

⑮苏东海:《从膨胀走向收缩——迎接新世纪的出路》,《中国博物馆》1993年第2期。

⑯王成:《改革城市博物馆布局加强群集效应》,《中国博物馆》1994年第1期。

⑰党士学:《论旅游业对博物馆的冲击》,《中国博物馆》1992年第4期。

⑱朱莉姬·D·哈里森著,王志卫编译:《九十年代的博物馆概念》,《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3期。

⑲潘林荣:《走向21世纪的博物馆——难点和转折点》,《中国博物馆》1997年第3期。

⑳吕济民:《跨世纪的博物馆的走向》,《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4日。

(作者为团城演武厅管理处主任)

(上接第38页)

策划书中,曾存在着为争取上级领导重视和同意而夸大活动效果的情况。也存在着夸大经费预算,借活动之机为本馆“小金库”筹钱的现象。这些都背离了活动策划书的基本原则,极易造成活动开展中疲于应付、质量下降,失去上级领导和相关单位的信任,最终影响活动的正常开展。其次,在编写中要为开展过程中的变化留一定空间。活动策划书类似于工作计划,虽然要求科学严谨,但是也要考虑到一些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以及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要在编制时为可能产生的变化留有一定的空间,有时甚至要另有一套备用方案。最后在编写活动策划书时,也应力求文字简洁生动、表现方式变化多样。为更好地表达编写者意图、避

免晦涩、枯燥,在表现方式上可以插入表格、图形(包括现场图、示意图等)、示例、影像资料(包括照片、录像),以及电脑特技。特别要说明的是,近年来电脑技术越来越被广泛使用,而且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一项大型群众集会活动,通过电脑制作,就可在策划书中事先展现现场效果。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一些如WORD、POWERPOINT、3D动画等国际通用的电子文本更易被国外人士理解、接受。

总之,博物馆文化活动策划书,虽然不是新生事物,但是由于没有一定的编写规范,还有待经验丰富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共同研究、探讨,为博物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做出新的尝试。

(作者为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

# 浅谈博物馆文化活动策划书的编制

● 高小龙

近年来,随着人们文化活动的不断丰富和人们精神需要的不断增加,许多博物馆除了继续办好各种展览外,也开始举办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以此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作用。如对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特定的文化宣传活动、针对青少年的主题教育活动、博物馆科普活动、推动博物馆发展的创新活动、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等。而根据我国的博物馆现状和生存环境的特点,每一项活动在开展前都应编制一份“博物馆文化活动策划书”(后文简称“活动策划书”)。它也有其他一些叫法,如:活动计划书、活动报告、活动文案、活动方案等。它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向阅读者说明此项活动,得到合理的建议、支持和配合,指导和规范活动的开展。编制活动策划书是博物馆工作的一项重要业务。同时,它也是一项值得博物馆工作者共同深入研究探讨的工作。

## 一、编写活动策划书的意义

编制活动策划书是一项文化活动能否开展和能否成功的前提,是活动筹备工作中最关键的一环。它的主要意义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活动策划书的编制过程,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是一项活动的设想从初步构思到成型的过程;是一项活动构想不断完善和丰富的过程。活动策划书的编制是博物馆业务人员聪明才智展现的过程,也是博物馆各部门间相互配合进行集体创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思想的火花不断迸发,活动内容会不断得到充实、调整,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和可行性;另一方面,博物

馆内外的专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提出意见,使活动策划书更为科学合理。例如:保卫人员可以对活动的安全保障提出建议,财务人员可以对经费的安排使用提出建议。由此可以说,活动策划书的编制过程,在博物馆筹备一项文化活动时是不可或缺的。

2. 活动策划书是传达思想内容和争取资金的手段。无论是国有博物馆,还是私立博物馆,在开展文化活动前都需要争取上级领导、有关方面的同意和支持;需要争取财务部门的拨款或企业的赞助。而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活动策划书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传达活动构想和说服各个方面的重要工具。上级领导,以及财务、公安、广告公司等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活动策划书,全面了解活动内容,对自己所关心的部分进一步分析、研究,最终做出决定。一份好的活动策划书就如同一项活动的广告,可以说服和打动相关人员。1999年至2002年,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北京市文博交流馆承办的“首届北京地区博物馆参观纪念品设计大奖赛”活动,在构思此项活动时,局领导就提出要拓宽思路、广泛争取社会资金。在争取社会资金的过程中,此项活动的策划书就在企业和主办方之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为企业了解此项活动提供了参考,为企业赞助此项活动提供了依据。当时,主办方向在京的多家国内外企业发送了活动策划书,此后包括IBM驻京机构、清华工美集团等多家企业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主办方选择合作伙伴提供了空间。同时,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旅游局、北京晚报等单位通过活动策划书也全面了解和认同了此项活动,在活动向社会公布之前,就决定参与支持此项

活动并成为主办方之一。因此,一份优秀的活动策划书,是说服相关领导和单位参与、支持的重要手段。

3. 活动策划书是指导工作的工具。博物馆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在时间上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涉及的单位也从一两个到十几个不等。活动策划书在开展活动中,常常成为保证活动能按部就班地开展,协调各方面关系的重要工具。活动策划书中已确定了活动的时间、地点,各个参与单位、活动参与者也是分工明细、任务明确。尤其是在组织大型活动时,组织者不可能与每一个参加活动的人员见面、做解释说明工作,活动策划书就成为向参与者传递组织者的意图、安排具体事项的唯一媒介。

当然,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外,活动策划书还有一些其他作用。例如,它还可以在活动结束后作为上级单位检验活动开展情况的依据,各博物馆交流工作经验的文字材料。

## 二、活动策划书的主要内容

博物馆已编制的活动策划书,虽然内容各异,但是主要内容应包含以下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确定活动主题的依据。例如1995年北京市某博物馆举办“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活动时,在策划书中首先就说明依据: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在全市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的决定。这一部分之所以放在最前面,是为了让阅读者明白,此项活动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

第二部分是本馆的优势。这一部分是要明确说明,作为活动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的博物馆,有优势和能力完成此项活动。这种优势可能体现在文物藏品、业务人员、组织经验等多方面。

第三部分是组织机构。这部分是要告诉人们在活动开展中,由谁来实施,具体分工。一般临时活动都设有组委会、秘书处、活动办公室等临时机构。

第四部分是活动的对象、规模和时间。这部分一般比较简明、清晰、明确。活动对

象要有明确的人数和所指,不能像有的活动策划书那样,笼统地说活动参与者为老年人、青年人等,活动时间为大概几个月。而要明确说明参与人员的单位、人数,时间要确定到具体某一天。

第五部分是活动目的。这部分要有说服力。例如某博物馆举办的一次由某中学1000名同学参加的野外环保活动,确定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亲自参与过程中,了解大自然、了解环保的重要性,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环保的能力。”这一活动目的与学校提倡的学生素质教育正好吻合,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并深受学生的喜爱。

第六部分是活动的内容。在这部分中要将整个活动的内容分割为几个具体内容分别列出。例如,一项大型活动可能包括开幕式、座谈会、外出参观考察、评比、总结会、颁奖仪式等具体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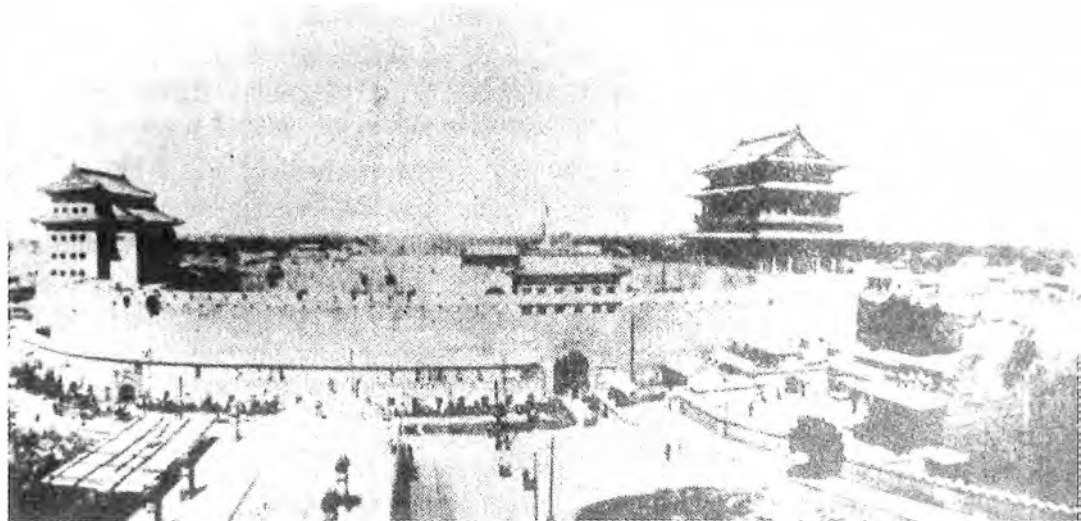
第七部分是活动的过程。这一部分是策划书的重点,也是文字量最多的部分。在这部分中,要按时间顺序将每个具体活动的时间、地点、基本要求、准备工作(如发通知、订场地、解决交通等)、活动步骤等一一说明。

活动策划书不是八股文,它的内容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增减。例如,一些户外大型文化活动一般情况下要加入安全保卫的内容,市属博物馆使用国家拨款开展的文化活动要增加经费方面的内容(包括经费来源、预算、主要用途等)。由上级单位支持开展的活动,要增加活动效果的检查方法,例如:通过新闻媒体对活动的反映等来检查活动效果。无论增加还是减除某些内容,都取决于实际需要。

## 三、编写活动策划书应注意的事项

编写活动策划书既是一项创造性劳动,也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为达到最佳效果,在编写中应坚持一些原则,注意一些问题。首先,在编写中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在以往的部分博物馆的活动

(下转第36页)



## 前门地区历史文化与保护利用

袁学军

前门既是一个地名又代表一个地区,是北京城的象征。该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目前在前门及周边地区保留了大量反映北京古都风貌的文物建筑和历史遗迹,保护利用好前门地区历史文化,对全面推进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北京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 一、前门地区历史文化 源远流长,内容丰富

前门地区是明、清北京城最繁华的商贸区,是北京古都风貌保护的重点地区。目前该地区有历史遗迹 12 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正阳门。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11 处:阳平会馆戏楼、福建汀州会馆北馆、正乙祠戏楼、谦祥益绸布店、瑞蚨祥绸布店、祥义绸布店的门面建筑、盐业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劝业场旧址、老北京火车站旧址、天主教圣会法文学校旧址。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街区 2 处:大栅栏街、鲜鱼口地区。不仅如此,前门地区还保存有大量无形的文物资产——老字号。这些历史遗迹,无论是历史名城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反映老北京传统特征的商业街、老字号、四合院、戏楼,都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要求保护的部分。它们与周边的历史遗迹,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北京古城风貌。

“前门”一词源于正阳门的俗称。正阳门是明、清时期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因其位于皇宫的正前方,而得俗名“前门”。

正阳门是目前北京城内唯一一座城楼、箭楼都保存完好的城门,原名“丽正门”。始建于永乐十七年(1419 年),当时将元大都的南城垣南移,修建城墙、城洞。正统二年(1437 年)开始修建城楼、箭楼、瓮城、石桥及牌楼。正统四年(1439 年)完工,同时改“丽正门”为“正阳门”。

正阳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皇宫的正前方、中轴线上,因而与内城其它八门規制不同,更加雄伟高大。内城九门中只有

正阳门箭楼设券门,但在明、清时期此门平日不开,只供皇帝出入。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城墙相连,形成瓮城。瓮城呈圆弧形,宽108米,深85米。东北、西北二内角为直角,东南、西南二外角为抹角。东西两侧建有闸楼,下设闸门以通行。闸楼面阔三间,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歇山小式屋顶,外侧辟箭窗两排共21孔。内城九门只有正阳门瓮城辟二门,其余均开一门。瓮城内除门洞前左右各有一个石狮外,还有庙宇两座,东侧为观音庙,西侧为关帝庙。两庙坐北朝南,建于明代。规模虽不大,只有一层殿,但香火很旺。两庙于1967年拆除。

古代建城,必以水环绕,明、清时北京内城九门外均有一座跨越护城河的石桥,但只有正阳门外并列三座桥,称“正阳桥”。1992年3月修前门地下通道时,发现位于正阳桥东侧燕尾石堤上的镇水石兽。石兽位于石基上,头探向河中,身披鳞甲,四肢粗壮,造型生动,雕工精细,当时经有关部门研究决定石兽原地保护,并调整了通道方案。

明清时期正阳桥外是油漆彩画、木结构的五牌楼。《宸垣识略》记载:正阳桥在正阳门外,跨护城河为石梁三,“其南绰楔五楹,甚壮丽。金书正阳桥清汉字。”

正阳门城楼、箭楼、瓮城、正阳桥,这一组城市防御工事建筑群,布局合理,造型庄严,气势凝重,显示了中华民族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

正阳门建成后,几次被损毁,历年多有修缮。1902年袁世凯、陈碧奉命修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毁的门楼。当时因工部档案烧毁,只好参照崇文、宣武两门的规制,将高度、宽度酌量加大修复。《辛丑条约》签订后,北京城内开始修建铁路,1906年前门东、西火车站相继建成启用,前门成为全国交通枢纽,加之前门一带又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因此这一地区的交通问题日益严重。1914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了《修改前三门城垣》方案。1915年6月16日朱启钤冒雨主持了开工典礼。改建工程

由德国建筑设计师罗恩凯格尔主持设计,因而使中国古老的城门融入了西洋建筑风格。这次拆除了瓮城及东西闸楼,使原来封闭的瓮城成为开阔地。在城楼东西城墙上各开1座宽9米、高8米的门洞。同时,还对箭楼进行了改建,在箭窗下增建悬空眺台,在一、二层箭窗上方,加饰了水泥制成的西洋式的白色弧形华盖,在东西两侧的墙体上加装水泥装饰,在门洞上增添“正阳门”横匾,加宽箭楼下东西两侧的城墙,增建了东、西“之”字形的登城马道。箭楼后边也拓宽了,形成了用汉白玉栏杆围起的宽阔的平台,并将箭楼门窗油饰一新,安装了玻璃。今天看到的正阳门箭楼就是这次修缮的。

正阳门悠悠五百多年,历经沧桑,有过欢笑,有过悲哀,是北京历史的见证。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困难,民不聊生,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岁山(今景山)。北京城内老百姓在前门大街迎接农民大军进城。

1856年英、法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侵略军打到北京,正阳门城门关闭,店铺关门,英、法联军在前门一带烧杀掠夺,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8月14日慈禧太后带领光绪皇帝等人,仓皇逃往西安。随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作为封建城市防御工事的正阳门没能抵挡住帝国主义的大炮,门楼被轰倒。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到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当时前门一带的店铺被抢劫一空。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随后,慈禧、光绪回京。当时为营造回銮喜庆气氛,在城楼、箭楼上以五彩绸绦搭制牌楼以迎圣驾。

随着社会的发展,正阳门逐渐失去其军事作用。1928年正阳门箭楼曾作为“国货陈列所”。一些爱国实业家为振兴民族经济,组织全国各地的名、特产品来此参加展览和销售。当时商品琳琅满目,极为丰富,

有玉器、珠翠、象牙雕刻品、料器制品、地毯、刺绣、景泰蓝、绢花、景德镇的瓷器等手工艺品；还有江浙的丝绸、北方农村的土布、绦带等；食品有陕西西凤酒、山西汾酒、贵州茅台酒以及南北酱菜。国货的展出，轰动了北平。1937年北平沦陷，国货陈列所停办。

日伪统治时期，正阳门箭楼曾作为文化娱乐场所，放映露天电影，表演曲艺、杂耍。1945年日本投降后电影停演。日本占领北京时，为掠夺钱财，强迫亿兆公司的经理出钱“买前门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前门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登上箭楼，检阅解放军入城部队。至此，前门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如果说正阳门这座城市标志性建筑，记载了旧京城的荣辱。那么前门地区的历史街区，则记载了旧北京城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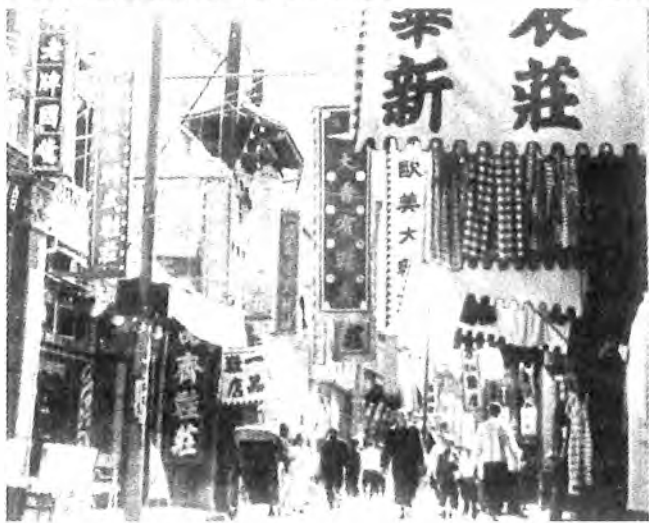
明清时期，前门外店铺客栈鳞次栉比，老商号云集，一派繁荣景象。如今大部分店铺商号已不复存在，但街区和部分老商号保留下来。

当年瓮城的東西月墙外，店铺林立，行人众多，东月墙外卖帽子的多，称为帽巷，西月墙外卖荷包的多，称为荷包巷。

前门外大街明初只有一条大街，广和茶楼和六必居酱园都在街面上。《日下旧闻考》记载：明后期，一些小贩在“大街石道旁，搭盖棚房为肆”。清乾隆以后，逐渐改建成砖瓦的正式房。由此，前门外一条宽敞的大街变成三条街。当年前门外大街上店铺买卖兴隆，有名的商号众多，是旧京城著名的商业街。至今保留着全聚德烤鸭店、正阳楼饭庄、都一处烧麦馆、六必居酱园、一条龙羊肉馆、谦祥益绸布店等老字号。特别是全聚德烤鸭店驰名中外，吸引大批中外游客。

作为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鲜鱼口街，是由元代的小鱼市发展而来。清代是仅次于大栅栏的商业街。当年口内有著名的马聚源帽店、田老泉毡帽店、天成斋鞋店、闷炉烤鸭老铺便宜坊、正明斋饽饽铺、长春堂药店、大众戏院、会仙居及天兴居炒肝店。至今仍保留有便宜坊烤鸭店、天兴居炒肝店。鲜鱼口东的草厂三条至九条保留着北京传统的胡同和四合院，这里的胡同为北京旧城少见的南北走向，而且胡同分布较密，间隔仅30米。四合院的朝向也不是常见的南北向，而是东西向，带有东南旧城地区独特的传统风貌。

前门外廊房胡同历史悠久。明朝初年商业萧条，城内到处是空地，于是朝廷先后在皇城四门及九城门外建房，“召民居住，



旧时前门大栅栏街景

招商居货,谓之廊房”(《宛署杂记》),如今大部分廊房已改造,街名也改,但前门外廊房没变。廊房胡同从南往北有四条,即头条、二条、三条、四条。最初这里的店铺经营品种繁杂,清代后期逐渐发展成独具特色的商业街。头条成为“灯街”,聚集了二十多家灯笼铺。著名的有文盛斋、华美斋、秀珍斋。现存的劝业场旧址,是近代北京第一幢大型综合性商业建筑。二条有“玉器古玩街”之称。三条是狭窄的胡同,经营一些小买卖。四条就是著名的大栅栏街。

大栅栏是因乾隆年间在胡同东口修建高大的木栅栏而得名。清代是驰名全国的商业街,当年在长仅 270 米,宽 5 米的街道上有店铺 80 余家,而且家家是名铺。同仁堂乐家药店、瑞蚨祥孟记绸布店、祥义绸布店、长盛魁干果店、东北魁帽店、一品斋鞋店、张一元茶庄、厚德福饭庄、天蕙斋鼻烟铺,以及广德、三庆、庆乐、大观楼等戏园都坐落于此。如今改造后重新开张的张一元茶庄、同仁堂药店、瑞蚨祥绸布店、内联陞鞋店享誉中外,大批中外游客慕名前来购物。

除此之外,打磨厂街明代以经营磨刀石著称,而且该街的纸扇、年画也很有名。西河沿街在明代书铺很多,后移至琉璃厂。清代后期这一带旅馆较多,民国时期西河沿东口创建了一些金融机构,现存盐业银行、交通银行旧址。

历史上前门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皇宫的正前方,加之商业繁荣,因而会馆众多。清代北京外城建有会馆 400 余所,仅前门地区就有 100 多所(《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集》)。这些会馆大部分是为应试举人、迁除官员提供暂居地,少部分是具有行会性质的工商会馆。明清时期,这些会馆门庭若市,逢节日或重大集会都有戏班唱戏。科举制度取消后,会馆逐渐衰落。现存平阳会馆戏楼(小江胡同)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正乙祠戏楼(西河沿)是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戏楼之一。福建汀州会馆北馆(长巷下三条)主院正房结构新

颖,是北京地区少有的具有南方特点的古建。这些会馆遗迹为研究明清科举制度、工商史、土木建筑提供了宝贵资料。

清初朝廷不准在城内建戏园,因而前门一带出现许多戏园。除明朝肉市街的广和茶楼外,清中后期在此建的戏园有:位于大栅栏的广德、三庆、庆乐、庆和戏园,位于门框胡同的同乐轩戏园,位于粮食店的中和戏园。如今这些戏园大部分都不复存在,但它们是京剧形成、发展的主要舞台,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京剧演员。杨月楼、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著名京剧演员都曾在此演出。

综上所述,前门地区历史文化遗存内容丰富,不仅体现了明、清北京城池建筑风格,而且记录了旧京城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综合反映了北京的历史内涵,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展古都风貌、促经济发展

历史文化遗存作为一种文物资源,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因而具备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同时也具有商业价值,商业价值是人文价值的具体体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是发挥文物资源历史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前提。只有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才能使它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更好地为现代人服务。同样,只有科学、有效地利用好历史文化遗存,充分发挥其商业价值,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历史价值,并使之得到更好的保护。

保护文物不仅是保护文物本身,还要保护与其相关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有些历史遗存虽然保护下来,但因其周围环境遭到破坏,因而使其不能完整地反映历史风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中,文物遗存才能完整地反映历史风貌,烘托特定的历史气氛。因此保护文物建筑,一方面应该认真分析文物资源现状、

价值特点,充分认识文物资源所拥有的优势,深刻研究文物资源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及与旅游、文化产业结合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使文物建筑既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又能为现代化大都市增添活力。另一方面,文物虽然一旦毁坏,就不可再生,但科学合理、有重点、有选择地再现某些文物建筑,使其与其它文物建筑一道,展示历史风貌,传承历史信息,这也是对文物建筑的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和必要的手段。

前门地区历史文化遗存内容丰富,交通便利,而且周边古迹众多。北接皇城历史保护区有最具古都特色、保存最为完整的宫殿建筑群——天安门、太庙、社稷坛、紫禁城;东有历史保护街区东交民巷、明城墙遗迹和东南城角楼,西邻历史文化街区琉璃厂,南有帝都城市规划不可缺少的重要建筑天坛、先农坛。这些文物建筑从不同方面、以不同的建筑功能,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北京古城风貌。同时,前门地区众多的老字号作为一种无形的文物资源,具有一定的旅游、商业价值。这一切为前门地区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如何保护、利用前门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使其充分发挥文物价值和商业价值,我有如下几点看法:

### 1. 复建正阳门瓮城

正阳门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保存现状,决定了恢复瓮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恢复瓮城可以较完整地再现古都风貌,促进对正阳门城楼、箭楼的保护。

首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明确指出,城市中轴线和明清“凸”字形城廓的保护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明清旧城是我国古代都城建筑艺术集大成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凸”字形城廓已不复存在,现已无法整体保护城廓。所谓“保护城廓”也只能保护再现标志“凸”字形城廓基本构架的一些标志性历史

建筑。但是至今保存的德胜门箭楼、东南城角楼、正阳门箭楼、城楼,分布在现代建筑之中,是不相连的独立建筑,缺乏完整性。因此从保护北京旧城的整体和恢复城楼、箭楼的历史出发,复建瓮城十分必要。只有城门、城楼、瓮城这样一组壮观的复合体,才能更加完整地再现古城风貌。

其次,正阳门位于中轴线上。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现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皇室建筑,以及北端标志性建筑钟楼、鼓楼完整保存,南端标志性建筑永定门已开始复建,而且南中轴路也开始大规模改造,因此,正阳门瓮城的修建,可以使传统中轴线更加完整。

第三,正阳门是唯一一座城楼、箭楼保存完好的城门,而且处在一个较为完整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背景中。因而,最具备复建瓮城的条件。它北邻皇城历史保护区,南与外城南城墙一线的标志性建筑永定门(北京市政府已立法复原重建)遥遥相对,东与明城墙遗迹、东南城角楼相邻;西与西便门城墙遗迹交相辉映。因此复建后的正阳门瓮城与东南城角楼、崇文门城墙残迹、西便门城墙残迹,大致展现出古城南城墙的轮廓风貌。这对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复建正阳门瓮城,可以充分利用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发挥人文、商业价值。正阳门箭楼1990年初对外开放,楼内举办各类展览。后因改善前门地区交通,修建地下人行通道,观众人数急剧下降,近几年基本处于关闭状态。复建瓮城可以将箭楼、城楼连接为一体。这样既方便管理,也大面积地增加了展览空间,展陈内容的增加、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会给正阳门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对充分发挥正阳门的人文价值及文物保护都有积极影响。

第五,复建正阳门瓮城,可以使其周边环境得到根本治理,改变目前脏、乱的局

面,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总之,复建正阳门瓮城既可以使它更好地展现古都风貌,也为这座老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增添活力。

## 2. 以老字号为依托,搞好特色经营,重现前门地区繁荣

老字号是一种无形的文物资源,是北京古城商业经济繁荣发达的标志。一些声誉卓著、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如:全聚德烤鸭店、同仁堂药店、张一元茶庄、瑞蚨祥绸布店等,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部分。目前,前门地区虽受前些年经营混乱、环境脏乱的影响,信誉度不高。但是该地区也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老字号众多,而且有些驰名中外。如全聚德烤鸭店、月盛斋酱牛肉、同仁堂药店等。若能利用这一优势,对现有老字号加强管理,同时再大力扶持一些老字号,使之成为集老北京吃、穿、用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老字号商业区,必将吸引大批北京人和中外游客前来购物,从而改善本地区的经营状况,让人在领略古都风情中,看到北京今日的繁荣。

## 3. 充分发掘旅游资源,复建大栅栏清代商业一条街

谈到北京历史风貌,我感到大多是通过一些城市建筑来表现,这当然很重要。但是传统商业也是一种长期存在,符合当地人们生活习惯,具有明显特色的历史风貌,是某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体现,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北京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修建、修复了大批古建和遗址,如新建皇城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修缮先农坛等等。但至今没有一条反映明清北京商业活动的街区。复建老商业街,不仅能再现当时人们的经济文化生活,也能表现当时的建筑风格和风土民情,让世人从另一角度感受古都风貌,同时为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生机。复建商业街在外地已有不少成功典

例。如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等,都是游客必游之地。

大栅栏作为历史保护街区,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周边旅游资源丰富,客流量大,知名度高。而且街内保存有一些清代店铺的街面建筑和著名的老字号,如瑞蚨祥绸布店、祥义绸布店的门面建筑及同仁堂药店、张一元茶庄等。若将其改建成具有清代建筑、经营风格的商业街,必将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此观光购物。这不仅带来本地区的旅游、商业繁荣,更为北京古城风貌增添光彩。

## 4. 保护历史街区的整体风貌,改造基础设施,完善居住功能

前门地区保留有大面积的历史街区,其中鲜鱼口已被划为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街区。保护历史街区,并不是保护它的全部,而是保护它的外表,改造内部基础设施,完善使用功能。对于这些历史街区,我认为应依照原有街巷格局,根据房屋完损程度和院落规划,分批进行改造,降低人口密度。同时,结合地形将有些四合院改建成高档宾馆,搞特色旅游。

## 5. 开放戏园、戏楼,再现文化繁荣

“前门楼儿”是老北京的象征。前门地区的戏园具有浓郁的京味儿特色。现存会馆戏楼建筑风格独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前门地区的特色旅游资源,开放戏楼,恢复部分戏园,对丰富人民生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前门地区历史文化内涵丰厚,历史遗存范围广泛,风格各异,京味浓厚。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方针,以整体保护,综合开发为原则,保护利用好前门地区的文物资源,对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和加快现代化大都市步伐,都有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正阳门管理处业务部主任)

# 北京石刻文化展巡礼

明晓艳

北京地区作为唐代以前的中国北方重镇和辽金以来的国家都城,其石刻文化遗存分布面积广泛,数量众多,其作品既具强烈的时代特征,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700年间,作为“京师”即皇朝都城的石刻文化遗存,一直被世人所关注,其内涵博大、形制壮伟、制作精美,居于全国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北京石刻艺术馆新推出的“北京石刻文化展”共分为三部分:北京石刻文化、北京石刻精品、北京石刻的调查、保护与利用。

## 一、北京石刻文化

北京石刻文化展,按石刻学的分类法,将展品分为石雕与石刻两大部分,即“北京地区的石雕艺术”和“不朽的史书,文献的宝藏——文字载体石刻”。石雕部分包括:中国传统石雕艺术品、陵墓石雕、建筑石雕、宗教石雕和园林、庭院装饰石雕五个部分。石刻包括:摩崖、碑碣、墓志、刻经、联匾和书法刻石六个部分。共展出石刻文物38件、拓片55张、图片133张。

### 1. 北京地区的古代石雕艺术

北京地区的古代石雕艺术品,既融入了我国古代的传统艺术风格,又融入了北方地区民族文化的特点。数千年来,各族人民在开发、建设北京的历史中,创造了大量优秀的石雕艺术品,明清帝王的宫殿、坛庙、陵墓、园囿等处,集中了大批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石雕艺术杰作。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国古

代石雕艺术通常采用的雕刻手法,即线刻、浮雕、圆雕、透雕法。展览还通过唐代《王道墓志》、《郭君墓志》、《阳氏墓志》拓片、明代太监王振画像碑拓本、《九莲菩萨画像碑》拓本、东汉秦君神道柱浮雕、辽《谷积山院读藏经记碑》碑首浮雕、金代帝陵石栏板浮雕图片、元代石羊、石虎等实物为代表的一批石雕艺术品,引导观众认识这些雕刻技法在现实生活中、在艺术品表现力中的作用。如,墓志上的装饰花纹一般为线刻,代表纹饰有卷草纹、云纹、宝相花和十二生肖等。

陵墓石刻在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包括地面的“神道石雕”——石碑坊、石柱和石像生,即象征着帝王生前威仪的仪仗卫队,也包括墓室内建筑装饰石雕。在陵墓前设置石雕,最早起源于西汉,到唐代乾陵起,以迄北宋,石刻的内容、配置方式逐步形成定制,并为明、清两代所承袭。中国古代多层次的信仰结构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产生了特有的丧葬观念、持久的厚葬传统和繁缛的丧葬礼仪,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石雕文化的重要特点。展览以历代帝王陵墓石雕图片为背景,突出介绍北京明代十三陵神道石雕群、清代东陵(顺治帝孝陵)神道石雕群和明清陵墓地宫中石雕艺术品。从这些代表作中,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石雕艺术发展的鲜明特色。

石雕艺术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宗教石雕,包括造像(摩崖造像、单体造像)、经幢、浮雕等。宗教石刻主要保存于寺庙和石窟寺之内,由于寺庙毁损严重,石窟寺是开凿于山崖之上的宗教雕塑遗存的主要代表。《北京石刻文化展》着重展示北京地区的佛

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石雕艺术品,并以佛教石雕为重点,展出金代房山白水寺石佛(主佛高 560cm)、唐代宋小儿造金刚经碑首、金代昌平黑山寨经幢、元代石景山区三盆山十字寺景教石雕、明代凤凰岭石窟造像、明代白云观老君坐像以及房山石经早期刻经地点之一的隋代万佛堂孔水洞摩崖造像等图片。其中房山“万菩萨法会图”长达 23.8 米,高 2.4 米,由 31 块长方形汉白玉浮雕组成,造型生动,雕工细腻,是唐代浮雕艺术的佼佼者。

佛教造像在我国最早见于东汉,佛教于西汉末至东晋初年由印度传入中国,早期中国的佛教造像受希腊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世俗化的造型艺术。造像之风,自北朝至唐代中叶为最盛,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造像是北朝作品。在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原地区造像的传统风格中融入了浓厚的地区色彩。如北齐天统五年(公元 569 年)潘景晖造像,北齐天保十年(公元 559



潘景晖造像

年)文海珍妻周双仁等造像,碑额皆为六条交龙,躯体丰厚,肩宽胸挺,表现出鲜卑人的审美特征。

展出的石雕艺术品还有建筑石雕、园林庭院装饰石雕,这些作品更具浓郁的北京地方生活气息,有皇家园林建筑雕花栏板、水曲流殇,也有百姓人家造型各异的石狮、门墩等。

## 2. 北京地区的文字石刻

有人说,“文字石刻是仅次于图书的最大的文献资料”。从目前已知的资料看,我国古代在石头上镌刻文字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盛于后汉。到清代,其种类已繁衍为一个庞大的文字石刻家族。依据文字载体的性质和功用分类,文字石刻大致可分为:摩崖、碑碣、墓志、刻经、经幢、造像、联匾以及石刻法帖等。

### (1) 摩崖与石刻

近代考古学家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描述:“摩崖者,刻与崖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即在山崖石壁上镌刻文字,称为摩崖。而“石刻”则泛指不具有特定规范形制的文字刻石,如碑、墓志、石经、经幢等。

展品中,东魏武定三年(公元 545 年)刻石拓片反映的是北京地区摩崖石刻中较早者之一。摩崖位于北京门头沟区色树坟乡河北村西北部,刻文记载了东魏武定三年十月十五日,北朝东魏北部边境城防设施筑城用工的情况,对研究北京地区北朝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元代“番字牌”摩崖石刻群图片,不仅记述了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字,还表明北方少数民族在北京进行的宗教活动。“番字牌”位于密云县城北 65 公里的番字牌乡,刻文是用梵文、蒙文和藏文镌刻的,其内容为佛教的“六字箴言”。

展览以大量实物、拓片、图片展示了北京地区部分重要摩崖石刻。北京的摩崖石刻,内容多为山区的开发、军事、水利和建设的纪事等,当然,也有不少文人志士抒发豪情之作,如清代范承勋的“尘外赏”摩崖题刻、民国时期溥儒(心畲)所书西峰寺摩崖石

刻和民国将领冯玉祥所书《礼运篇》摩崖石刻等。

### (2) 碑碣

北京地区历史上的碑刻难以数计,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的作用,遗留到今天的,以墓碑、寺庙碑为最多。展览按碑刻内容分为墓碑、帝陵碑、功德碑、学校教育碑、纪功碑、燕京八景、建筑水利、宗教、会馆、长城碑等。这里展出唐《无垢净光宝塔颂》碑拓本图片、明《慕田峪鼎建碑》拓本图片、清《重修全浙会馆记》拓本图片、清《京师潘禹会馆碑记》拓本图片、民国《整容行(理发业)公益会碑》拓本图片和清《创立三晋会馆序》碑等。

### (3) 墓志

墓志,是冢墓中的文字石刻,有固定的形制和惯用的文体或格式。因墓志记载死者姓名、出生年月日及生平事迹,系之以铭,故又称之为墓志铭。其主要作用是起到标志墓主人身份及家世的作用。

墓志大约产生于秦代至东汉末期,这一时期还没有固定的墓志形式。魏晋南北朝初年,墓志开始正式形成,称为“碑”或“柩铭”,墓志一词尚未使用。直到南北朝时期,墓志的名称才正式出现,形制和文体相对固定,并成为当时墓葬中普遍采用的丧礼用品<sup>①</sup>。展览选取了部分历代有代表性的墓志,有的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展出唐《王时邕墓志》、辽《韩佚墓志》、明《郑国宾(万历帝郑贵妃家族)墓志》、明《内官监太监张端墓志》、明《御用监太监钱义墓志》拓本、明《郑承恩万历帝郑贵妃之伯父》墓志拓本、明《武定侯郭守乾墓志》和清《纳兰明珠墓志》拓本等。

北京地区从清代以来,尤其是建国后在考古工作中发现的上自西晋,下迄民国的墓志数以千计,为后人研究北京城市的变迁和社会史提供了正史、补史的珍贵佐证。

### (4) 刻经

刻经,是指把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经典全部或部分刻成巨大的碑群或石质“经版”的文化工程。

我国刊刻儒家石经之举始于东汉,其最

初的用意,是为朝廷的教学、考试制度提供一套标准的经书版本。隋唐以来,又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佛教刻经,如北京著名的《房山石经》,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和工程之艰辛,都远远超过了儒家石经。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的《石刻十三经》,则是我国封建王朝时代的最后一部官刻的儒家石经。道教刻经出现于唐中叶,以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龙兴观道德经》为最早,虽其数量远不如佛经多,但书丹人多为著名书法家。

北京石刻文化展,展出儒家早期经典石经——东汉《熹平石经》残石拓本图片、唐《开成石经》碑石陈列现状图片和清代乾隆年间《石刻十三经》图片;佛教经典:隋《房山石经》图片、房山区上房山《兜率寺刻经》全景图片、明《四十二章经》拓本图片、明代董其昌书《金刚经》刻石拓本及道教刻经元代赵孟頫书《道德经》拓本图片等。

文字石刻陈列还包括匾额和书法碑帖,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法帖是北宋时期的《淳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帖》、《阁帖》,宋人也称《官法帖》),北京有清代乾隆时期的宫廷摹刻本。展品有宋刻《淳化阁帖》清乾隆摹本拓片、清乾隆刻《三希堂法帖》拓本图片、晋王珣《伯远帖》拓本图片、清康熙《懋勤殿法帖》拓片图片、清成亲王刻《诒晋斋法帖》实物等。

## 二、北京石刻精品

北京石刻精品展,共展出精美石刻文物41件、珍贵拓片34幅。展示了北京地区从汉唐雄风,辽金元三代民族融合、文化交流,到明清帝都风范,以及民国时期文人巨子在北京政治与文化舞台上活动的重要实物遗存。展品内容涉及政治、历史、医学、建筑、教育、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

精品展中有被誉为“北京第一古石刻”之称的东汉永元十七年(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陵墓石构件——神道柱及墓阙构件,这是现存东汉时期有纪年,而且保存最完整的石刻遗存,也是迄今北京陵墓石刻中

年代最早的。它对于研究汉代葬式遗风、民俗、艺术留下了宝贵实物资料。

展览中,一组汉白玉浮雕栏板引人注目,镌刻行龙牡丹花卉图案。行龙栏板长136cm,宽50cm。栏板为菱形,外侧边框宽10cm,上、左、右三面雕刻缠枝宝相花纹,底边镌刻有回纹图案,衬地上的三组双龙纹,带有浓厚的唐代遗风;中部镌刻行龙与牡丹花浮雕图案,底衬为浅刻宝相花纹。龙形刻画动感强烈,前面的龙回首观望,后面至龙紧紧跟随。龙身腾屈,四爪伸张有力。出土于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

清代大词人纳兰性德的夫人卢氏墓志,不仅志文优雅流畅,且造型独特,墓志为卧式碑,在雕有莲花瓣的须弥座上托起一块四周雕有八条龙纹的长方形墓志。

墓志通高112cm,志:75×95cm,下承高35cm的须弥座。其用料、雕饰之讲究,在墓志中极为罕见。造型属碑、志合一。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葬。墓志出土于北京海淀区上庄乡皂甲屯清代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家族茔地。展出的除纳兰卢氏墓志外,还有纳兰性德和揆叙的墓志(露天展区)。

精品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

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至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间所刻针灸图经残石,共五方。编号为:1~5号。1965~1971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组织发掘,在崇文门东400米处的明代城墙内皮墙基下发现4号残石,其余四方均发现于朝阳门南500米处明代城墙内皮墙基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系由皇家医官院主持,医官尚药奉御王惟一负责编纂的,这是自汉唐以后到宋天圣时期,古代医学家在针灸腧穴方面反复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整理的。当时不仅范铸

铜人模型,在其身上刻经穴名称和位置,而且还详述主治和疗法。北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的发现,为中医史和针灸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石刻文献。

北京石刻精品展中,通州区次渠塔(俗称麦庄塔)出土的明正统年间线刻佛造像与菩萨像刻石五方及线刻朱砂拓片;金代“斋”匾额刻石、“谯楼”匾额拓片和明清时期来华、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郎世宁墓碑拓片等都是第一次对外展出。同时展出的还有东汉石人、唐史

思明墓翼兽、唐代小犀牛等精美石雕艺术品。

### 三、北京石刻的调查、保护与利用

石刻文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它具有不可再生性和补史、正史的作用,它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展览通过115张图片、12张拓片和14件实物,向观众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和文物法规,提升观众文物保护意识。

#### 1. 文物调查

从20世纪60年代迄今,北京市文物部门曾在1957、1962、1983、1995年四次组织过全市范围的文物普查工作,石刻文物保存



东汉石人

现状是普查工作中的重要内容。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后,积极开展了对北京地区石刻文物的全面调查。先后对市属18个区县的石刻进行普查、登录、拍照、捶拓,至今已完成了东城、昌平、顺义、房山等16个区县的调查,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中拓片近3000张,调查登记表2000余张,石刻档案照片近4000余套,绘出石刻文物分布图12张。

展览以图片图表的形式向观众展示了北京地区石刻文物调查成果。首先是《北京石刻文物分布图》,包括石刻与石雕位置图、石刻的数量与分级;然后是《房山区石刻文物分布》和《东城区石刻文物分布图》。通过调查初步摸清了北京地区石刻文物的存量、保护现状及文物的种类和价值,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对于文物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一手资料。

## 2. 五十年来北京地区发现的重要石刻文物

近50年来,北京地区有大量重要石刻被发现,其中有:东汉《秦君阙构件及神道石柱》、西晋《王竣妻华芳墓》、唐《史思明墓翼兽》、宋《天圣针灸腧穴碑》、辽《天宁寺塔顶刻石》、金《睿宗碑》、元代石翁仲、明武定侯家族墓志、清显亲王《石享堂》及民国《四行储蓄会》匾等。展览将部分石刻分类展出,碑刻展品有: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贤劫千佛之碑》拓片、辽《秦王发愿纪事碑》实物、金《杨瀛神道碑》图片、元《高公神道碑》图片和元《福寿兴元观白话碑》拓片等。阙表展品:东汉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柱表测绘图1幅、东汉石阙残构件实物3件及拓片。墓志展品:北齐《傅隆显墓志》拓片、唐《王时邕墓志》拓片、辽《王守谦墓志》拓片、金《鲁国大长公主墓志》实物2件、元《海云和尚墓志》照片1张及拓片1幅、明《李伟墓志》照片1张及拓片1幅、清纳兰家族墓志一组(《纳兰性德墓志》拓片及实物2件、《纳兰卢氏墓志》实物1件、《明珠墓志》照片及拓片、《揆叙墓志》照片及拓片、《揆方墓志》照片及拓片、《揆方夫人墓志》照片及拓片)。

这些重要石刻的发现,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 ①城市建设基建工程中出土或发现的石刻;
- ②考古中的出土石刻;
- ③古建修缮时发现的石刻;
- ④文物捐赠、移交及主动征集的石刻。

## 3. 石刻的保护与利用

调查显示,石刻文物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来自于自然和人为两方面。

文物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了积极主动的科学保护措施,避免或减少了自然力对文物的侵害。展览介绍了北京房山云居寺将辽金石经回藏地下,采取恒温、恒湿、充氮,避免自然风化的石刻保护方法;同时展示了一批在石刻上涂有机硅涂料的化学保护的成功范例,如:卢沟桥(局部)、真觉寺金刚宝座式塔(局部)、北京太庙石栏板(部分)等。展览介绍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自建馆以来,征集了千余件石刻文物,拓片几百种。对于那些有条件原地保护石刻文物的单位,给以业务指导,促进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文物保护中,最大的问题是人为破坏。展览着重展示了建国以来偷盗石刻文物的重案、要案,特别是1998年北京海淀区车耳营乡《北魏太和造像》失而复得一案,通过案例向人们宣传文物保护法。

石刻文物的保护,丰富了历史资料档案,为后人研究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 四、《北京石刻文物展》的特点

### 1. 选题适应社会需求

北京建城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在这块土地上建都立业,创造了不朽的人类文明和石刻文化,然而,在北京众多展览中尚未有一部展览系统地从石刻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展示北京地区石刻文化,特别

是近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地区出土了大量的石刻文物,不仅造型精美,且内容涉及广泛,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直被世人所关注,越来越多的公众提出需要了解石刻知识。《北京石刻文化展》为我们研究北京史,为满足公众的需求,提供了学习、研究的场所。

## 2. 服务大众,注重普及

石刻群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家族,不仅形制多样、历史久远,且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加之石刻文物的背景浓郁而深厚,史书记载的资料又卷帙浩瀚,特别是阅读古文字石刻时,对于古文字、碑别字,还要有一定的古汉语的基础,否则难以诠释。

然而《北京石刻文化展》把内容设计的基点定位在大众普通观众,突出北京地方文化特色。打破以往展览常用的按年代顺序设计的手法,以人为主体,研究石刻文化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生、发展的过程。使人感到该展览贴近生活,直观、易懂。

## 3. 突出知识性、科学性、通俗性

《北京石刻文化展》的第一部分《北京石刻文化》,为石刻知识科普展览,系统地向观众介绍石刻学的定义、分类法,用实物和理论的对比学习的方法帮助观众了解石刻知识,了解石刻文化。展览的第三部分《北京石刻的调查、保护与利用》,向观众介绍了文物调查的方法和石刻现状,宣传文物保护法,号召人们为保护人类文明的载体——石刻文物而继续努力。

## 4. 为公众提供石刻精品欣赏

当今,人们把博物馆不仅看作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亦视为文化休闲

娱乐的场所,希望在博物馆得到更多的、美的艺术享受。展览的第二部分《北京石刻精品》正是满足了这一群体的需要。

## 五、对《北京石刻文化展》的思考

### 1. 展览要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信息

21世纪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信息化社会。在信息社会中,人们不满足于展览表层的收获,渴望获取更多的信息。因为展览受到时间、空间和地域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在有限的空间里,用音像、书籍、文字资料、石刻文化背景演示等方式为观众提供大量的石刻文化信息,起到为观众答疑解惑,甚至“解渴”的作用,会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 2. 展览水平有待提高

《北京石刻文化展》,弥补了北京地区展览缺项的不足,展示了北京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共存发展,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文化发展体系。但是,就其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而言,能否代表北京地区石刻文化的最高水平,还有待于专家的论证、观众的评价,有待于改进和提高。

当您看完《北京石刻文化展》,漫步在露天石雕展区或碑林中时,你会发现,体积高大、雕刻精美的石刻艺术品比比皆是,如:明石翁仲、清石享堂、清广宁门外石道碑、清普胜寺卧碑等。这些不仅是对室内《北京石刻文化展》的补充,也是对中华民族文明的赞誉,身置其中,使人得到美的享受。

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社教部主任)

# 北京地区的博物馆期刊

王 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批各种类型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萌生在祖国肥沃的土地上。截止到2002年11月底,北京地区正式注册登记的博物馆共有118家,这不仅是旧中国无法相比的,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城市中,也是为数不多的。在这100多家博物馆中,既有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在世界上知名度极高的国家级大型博物馆,也有初建的、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小型博物馆,更有时代的新产物——私立博物馆(目前已有8家)。这一切都说明,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已经进入空前发展阶段。

同世界上许多大型博物馆一样,为向广大观众宣传、介绍自己的展览,普及文博知识和科学知识,提高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北京市许多家博物馆都有自己定期出版的刊物。据统计,目前北京地区各博物馆定期出版的各类期刊有近20种(这里所指的,是具有固定刊名、刊期、年卷或年月顺序编号、经国家新闻出版部门的批准、印刷装订成册的连续出版物),出版的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本文仅就定期出版的各种刊物,做一些粗浅的介绍。

故宫博物院是我国各类博物馆中最具知名度的一个,它以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丰富珍贵的馆藏而享誉海内外。早在1925年它就出版过《故宫丛刊》,1929年又先后出版了《故宫周刊》和《故宫》月刊,1936年改为《故宫旬刊》。这说明,故宫博物院历来重视馆刊的出版工作。1958年《故宫博物院院刊》问世,它的办刊方针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文字和图片加深读者对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古代建筑及明清历史的认识。

这本刊物的主要栏目有故宫珍藏、书画欣赏、古建知识、人物志以及博物馆经验介绍等。《故宫博物院院刊》是一本极具学术价值的刊物,在我国史学界、文物界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1980年,故宫博物院又推出了另一本大型普及型期刊——《紫禁城》。《紫禁城》不仅内容充实、印制精美,有很高的文化品位,而且文章通俗、雅俗共赏,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都属于国家级大型文博类博物馆,每年都有上百万观众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出版的期刊是《中国历史文物》,是一本学术性资料刊物,主要刊载有关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古代中外关系以及考古、文物、博物馆研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中国革命博物馆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月刊,也是属于学术资料性、研究性的刊物,对我党的思想建设和党史研究进行理论探讨,同时提供大量相关的珍贵史料,目前属于内部发行。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是一本旨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刊物,主要内容有综论专论、专题论文、史料译文等。

各种专业性博物馆主办的期刊,在宣传、弘扬本专业学科知识,开展和引导本行业学术研究,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如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的《鲁迅研究月刊》、中国钱币博物馆主办的《中国钱币》、中国体育博物馆主办的《体育文史》等,都是本专业极具权威性的专业刊物。特别是《中国钱币》,是我国钱币学、钱币史研究领域唯一公开发行的期刊。

首都博物馆出版的《首都博物馆丛刊》和北京自然博物馆出版的《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报告》，都是专门为博物馆的科研人员开辟的学术园地，它们以发表专业人员的学术报告和专著为主要内容，对于同行之间信息交流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性质上属于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在首都北京有将近 30 家。其中，中国科学技术馆是最受广大青少年喜欢的参观、学习场所。中国科技馆出版的刊物名字就叫《科技馆》，是一本双月刊，其内容是介绍在我国日益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科技馆，对我国各地科技馆的建设具有指导性作用。目前《科技馆》杂志正等待国家新闻出版部门的正式批准，还属于内部发行，但内容和包装上都独具特色，相信它一旦正式出版发行，必将很快占领市场，成为热门期刊。

科学普及刊物是广大青少年喜爱的课外读物，是他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的“第二课堂”。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和北京自然博物馆都是北京市很有声望的科普场馆，是北京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三家博物馆都有自己主办的科普性刊物，分别为《地球》、《天文爱好者》和《大自然》。其中《天文爱好者》的资格最老，创刊于 1958 年，已有 44 年的历史，它以介绍天文学基础知识和人类认识宇宙取得的新进展、培养青少年天文爱好者的观测能力为主要目的，还为天文爱好者提供观测资料、介绍活动经验。《地球》杂志重点报导有关地球科学的新理论、新发现和新知识，它的主要栏目有：地球科学纵横谈、地球的奥秘、地学与人类、宝藏地学考察等。《大自然》以普及生物学知识、宣传自然环境保护为宗旨，刊登大量野生动物、珍稀植物的彩色图片，做到图文并茂，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以上这三种科普刊物，发行量在北京地区各博物馆所主办的期刊中，属于比较大的，每期发行都在 1 万本以上。

此外，虽然不是由博物馆主办出版，但与博物馆建设有着密切联系、甚至是对博物馆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的期刊，在北京还有

几家，它们是：由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由中国博物馆学会主办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和内部刊物《中国博物馆通讯》；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内部刊物《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通讯》。这四家刊物都是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良师益友，也是博物馆从业人员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

北京市是全国博物馆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但从整体来看，博物馆的出版物远远满足不了观众、读者的需求，满足不了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估计全市博物馆业出版的期刊全年的总印刷量，不超过 50 万册，这对一个有千万人口的超大型都市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许多规模很大、知名度很高的博物馆至今没有自己的出版物，而一些行业性、科普性期刊中，真正涉及博物馆建设的栏目也不算多。例如《地球》杂志在它的十几个栏目中，仅有一个“博物苑”；《大自然》杂志也仅有“博物馆珍藏”、“博物馆巡礼”等栏目。对博物馆自身的介绍、评论和理论探讨性文章很少，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而大多数中小型博物馆，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无力创办自己的刊物，许多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因此失去了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三条建议：

一、建立北京市博物馆出版工作者协会或联谊会，将期刊的编辑人员组织起来，大家研究探讨怎样办好博物馆刊物和关于博物馆建设的重点栏目，让刊物真正能为博物馆的建设出力。

二、由市文物局出面，会同北京市博物馆协会，建立北京市博物馆业出版基金和联合广告协会，在资金上支持博物馆的期刊出版和开展广告创收业务。

三、由北京市博物馆协会牵头，将有出版期刊的意愿，但又苦于人力、物力不足的中小型博物馆组织起来，成立联合编辑部，也可以以“轮流坐庄”的形式，共同主办一份名为《北京博物馆》的期刊。群策群力，搞好我市博物馆的期刊出版工作。

附表 1：北京地区博物馆期刊一览表

附表 2:北京地区与博物馆建设有关的期刊

表 1 北京地区博物馆期刊一览表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博物馆	刊期	发行方式	邮局代号	编辑部地址	编辑部电话
1	故宫博物院院刊	故宫博物院	双月	邮局发行	2-411	景山前街 4 号 (100009)	65132255 -584
2	紫禁城	故宫博物院	季月	邮局发行	82-249	景山前街 4 号 (100009)	65132255 -299
3	中国历史文物	中国历史博物馆	双月	邮局发行	2-229	中国历史博物馆 (100006)	65128321 -585
4	党史研究资料	中国革命博物馆	月刊	内部发行		中国革命博物馆 (100006)	65245214
5	抗日战争史研究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季刊	邮局发行	82-473	丰台宛平城内街 101号(100072)	83892355 -268
6	首都博物馆丛刊	首都博物馆	年刊	自办发行		东城区国子监街 17号(100007)	64013846
7	鲁迅研究月刊	北京鲁迅博物馆	月刊	自办发行		阜内宫门口三条 19号(100034)	66165647
8	体育文化导刊	中国体育博物馆	月刊	邮局发行	82-465	天坛东里中区甲 14号(100061)	67016656
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现代文学馆	季刊	新华书店发行		西三环北路 8 号 (100081)	68419246
10	中国国际友谊	国际友谊博物馆		自办发行		东城区戏楼胡同 3号(100007)	64047100
11	古今农业	中国农业博物馆	季刊	自办发行		东三环北路 16 号 (100026)	65018877 -2300
12	农业考古	中国农业博物馆	半年	自办发行		(江西省社科院)	
13	科技馆	中国科学技术馆	季月	内部发行		北三环中路 1 号 (100029)	62371177 转
14	中国钱币	中国钱币博物馆	季月	邮局发行	82-31	西交民巷 22 号 (100031)	66053042
15	地 球	中国地质博物馆	双月	邮局发行	2-253	西城区羊肉胡同 15号(100034)	66139964
16	天文爱好者	北京天文馆	双月	邮局发行	2-352	西直门外大街 138号(100044)	68361688
17	大自然	北京自然博物馆	双月	邮局发行	2-481	天桥南大街 126 号(100050)	67020595
18	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报告	北京自然博物馆	年刊	自办发行		天桥南大街 126 号(100050)	670244311 -3092
19	博物馆之声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已停刊)			

(注:部分期刊系与相关学会、协会合办,恕不一一列出)

表 2 北京地区与博物馆建设有关的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者	刊期	发行方式	编辑部地址	编辑部电话
1	北京文博	北京市文物局	季刊	自办发行	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100007)	64071605
2	中国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学会	季刊	自办发行	五西大街 29 号(100010)	64005531
3	中国博物馆协会通讯	中国博物馆学会	月刊	内部发行	五西大街 29 号(100010)	64005531
4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通讯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	季刊	内部发行	天桥南大街 126 号(100050)	67053997

(作者为《大自然》杂志主编)

## 《北京文博》征稿启事

本刊为北京市文物局主办的文博专业学术性刊物。刊稿范围包括北京地区(兼及北京周边地区)的文物、博物馆、考古、史地民俗、民族宗教、文物收藏与鉴赏等领域的新发现、新观点、新材料。本刊主要栏目:文物工作、博物馆学、北京史地、文物研究、考古与文物、文物保护、文物鉴赏、古代建筑、史籍辨误、区县快讯、资料信息等。为繁荣文博事业,欢迎社会各界赐稿。

来稿字数以 8000 字以内为宜。来稿请交软盘,并附上打印好的文章一份;附照片、附图要清晰。文章的注释,要求一律放在文后。注释需详细标明:作者、著作(文章)名、卷次、页码、版别等内容。来稿请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请勿一稿多投。如果投给我刊的文章半年内未予采纳,作者可自行改投他刊,并通知我刊编辑部。凡投我刊的稿件。编辑有权在不影响文章观点和立意的前提下,对文章进行加工润色。限于本刊人力,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被视为自动接受本刊上述约定,以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刊编辑部。

《北京文博》编辑部敬启  
2003 年 9 月 5 日

# 祝贺北京皇城艺术馆开馆

吕济民

北京皇城艺术馆今天举行隆重开馆仪式,我以一个老文博工作者的身份并代表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成员和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皇城艺术馆的建立,为北京也为全国增添了一座富有个性和特色的新类型博物馆。利用皇城城垣及遗迹、遗物和资料建立博物馆,以展现皇城文化艺术和社会历史风情,这是北京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它将在古城垣保护、古建筑利用和博物馆建设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作用。

北京经历了辽、金,也就是北宋、南宋时期,直到元、明、清三代八百多年的变迁,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期和晚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现在仍然保存有完整的、雄伟的古建筑群和城垣、宫殿等遗迹、遗物,这在中国,也许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蕴藏着丰富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北京人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皇城是皇宫紫禁城的外城,正门为天安门,左祖右社,南起大清门,北至地安门,东达东安门,西至西安门,城垣重叠相套,形成环绕封建王朝最高政治中心的严密体系,是一个特殊的地域,主要是保卫和服务于至高无上的皇宫。皇城之内有一系列的机构、设施、建筑和场所,有隶属于内务府的监、局、作、库等服务机构,还有禁卫、祭祀、宗教、娱乐等行业体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情,它既包涵有宫廷文化,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的文化,也包涵有民间文化,劳动人民的通俗群众文化,而且有这两者相

融会的雅俗共赏的文化。这种独特的皇城文化的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尽管随着朝代更迭而有所损坏和流失,在抢救、修复、保护和利用的今天,仍不失其夺目的辉煌。

皇城艺术馆位于皇城之内,与故宫博物院咫尺之遥,在收藏、研究、展览、宣传等方面都能与故宫相得益彰,能很好地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持。今天开放的《皇城风情展》就是两家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持的成果。在展览面积 2500 余平方米的陈列中,有一个气势宏伟的乾隆中后期北京皇城建筑沙盘、一组反映康乾盛世的铜雕及三百年前明代皇城的“城砖”,简明地呈现出皇城的来龙去脉,八旗护卫的盔甲、精美的官服补子,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文武官阶制度;御用蜡烛、灯笼、帘子等日常用品,无不体现着皇家气派;四大徽班进京时期的“宫廷戏单”,展示了当时宫中戏曲文化生活;《光绪大婚档》记录了光绪皇帝大婚的盛况,“玉牒”和“圣训”记载了历代皇帝的成长;还有“贡品”等展现了官员、商贾和外国使臣进献的各种珍宝。这些文物和资料的展示,就是皇城历史、皇城文化和皇城风情。

今天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皇城艺术馆,对文物和资料的收藏、研究、保护和利用都极为有利,对宣传和弘扬这一富有特色的皇城文化,都会发挥重大的社会教育作用。我们相信,皇城艺术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

# 北京地区石刻概述

刘卫东

北京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中心，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很多石刻的制作十分讲究，纹饰雕刻也极精美，皆有法度、等级。帝王之碑很多，不仅是他们的墓碑、功德碑，还有他们的敕赐碑、诰封碑、圣旨碑、敕建碑等。这些碑刻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一般都体量很大，选材上要求较高。雕龙刻凤、仙鹤、麒麟、狮子、天马、莲花、牡丹、海水江崖等，都有一定的法式。这些都是古代石雕、石刻艺术绽放的花朵，它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股潮流，同时也是帝王之所好。北京作为都城，碑刻种类繁多，内容包罗万象，其丰富多彩的样式也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有简单一、二字的题记，还有整部的《十三经》刻石，以及世界上数量最丰的“房山石经”。有蝇头小楷，也有擘窠大字。有反映个人生平事迹的墓碑、墓志，还有内容涉及人、事众多的记事碑、坛庙碑、会馆碑等，有记录科考办学的儒学碑，也有进士题名碑，有佛、道、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石刻。有反映民族、经济、文化、科技、农业等方面的内容，也有治蝗、记录灾异、修桥补路诸多内容的石刻。体裁上有诗词、歌赋、书画等。北京的石刻上起秦汉，下迄民国，历经两千多年。虽然唐、辽、金、元有不少石刻，但以明清两代为最，占全部总量的绝大多数。迄今为止，现存已知的石刻大部分都已纳入国家文化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保护之中。如房山云居寺石经、碑碣，几近15000件。首都博物馆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大约各两三千件。十八个区县、两个特区文物部门征集管理的也应有数千件。其他博物馆、研究院所、大学等，园林局属各

文保单位如颐和园、北海公园、圆明园等亦应3000余件，再加上其他各文保单位，如故宫、历史博物馆、中南海、玉泉山等遗址遗存，原地保护、散落田野的各类石刻的总数应在20000件以上，5000种左右。

北京有一些石刻在全国范围内也堪称孤品，其量大质精为他处所无，如房山石经、明清进士题名碑、《孔庙告成太学碑》、清《十三经》刻石、《官员人等下马》碑、《燕京八景》碑、《三希堂法帖》刻石、密云《十面碑》、少数民族文字碑等。法源寺今存唐张不矜撰文、苏灵芝书丹的《悯忠寺无垢净光宝塔颂》、今存文丞相祠中的《唐云麾将军李秀残碑》堪称书法中的绝品。海淀区慈寿寺塔后明线刻《九莲菩萨像碑》、八大处六处清刻《大悲菩萨自传真像》碑，又可称绘画中的精品。雍和宫乾隆《喇嘛说》碑实际上是一篇论述清朝采取宗教政策的文章。清乾隆时期邵瑛《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法帖石刻，是一份书法教学的范本，它比后来习见的黄自元帖要早100多年。

北京地区的石刻还体现了它的包容性。其中，尽管有许多石刻并非北京固有之物，但它确实在北京保存已久。所有的这些石刻都是非常珍贵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

## 一、北京地区秦汉及以前的石刻

在距今约一万至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发现过石斧、石铲、石凿、石纺轮等文化遗物，其出土地点遍布北京的郊区、浅山区、河流台地和平原地，说明那时北

京的先民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原始猎人,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他们使用原始の木、石工具,砍伐树木,芟除草莱,播种谷物,进行原始的农业活动。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讲:“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以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说明,原始先民所借以谋求生存的石质工具,是早期的石刻形式,甚至是最简单的艺术品。当然,从石刻学的角度讲,广义上说所有的经过人工雕凿的石质产品都属于石刻。而狭义上是指那些摩崖、碑碣、墓志、塔幢铭及法帖一类的文字石刻。所以,严格地说,北京地区此期的文字石刻至今还没有发现,历史上也无明确记载。但北京的周边如河北省平山县三汲镇曾出土典型的中山国守丘刻石,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石刻之一。

秦及以前的北京地区,特别是在商周时期的古燕国,也曾出土了带字的卜甲、卜骨,精美的青铜礼器,陶制器皿、瓦当、货币、兵器、工具等,其工具中有斧、镑、凿、削、锥、针等。青铜礼器的制作工艺已非常讲究,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但可能由于石材暂时没有开发,得不到当时人们的普遍注意,因此石上刻字未能流行开来,目前亦尚未发现。

两汉时期,营建活动大为发展,石材真正被应用到建筑领域中。于是石刻开始广泛流行。

北京地区的文化艺术也有所发展,其工艺水平体现在今天的出土文物中。如丰台区大葆台汉墓出土的透雕玉璧、螭虎佩、凤形玉麟、玉舞人等,雕工之精巧,出类拔萃,虽非石刻,但雕刻手法相近,无非是小巧与粗大的区别。而真正意义上的石刻,建国后也陆续有所发现。如在石景山区老山脚下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秦君神道双柱》及其上所刻《乌还哺母》文、题记等石刻 17 件。永定河故道被水冲刷出来的东汉石人、丰台区三台子汉墓出土的带有四神及禹遇伏羲

浮雕纹饰的画像石墓门等,虽然为数不多,但也是北京早期石刻遗存的佐证。另传汉《韩延寿碑》,史载也在今石景山一带。

## 二、北京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

此期的石刻在北京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其原因多种。其一,佛教传入中国,帝王统治者的提倡,老百姓的信奉,因此佛教题材的石刻不少,造像之风极盛。其二,南北朝前后经历了宋齐梁陈,诸侯割据的五胡十六国。易君变国、战乱频仍,刻碑书志,在所难免。其三,随着帝王禁碑,民间厚葬,产生了新的石刻形式——墓志,以寄托对死人的哀思。1965年在石景山区八宝山西侧的半公里处出土了西晋永嘉元年(307)的《幽州刺使王浚妻华芳墓志》。志文中有“假葬于燕国薊城西廿里”之文。我们据此可以推断薊城城址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薊城的大部分与今北京外城的西北部相重合。志石呈长方形,书法秀美遒劲,为研究墓志由长方形向方形过渡的形制及书法字体演变过程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另外,在石景山老山脚下的另一座西晋墓发现了东西排列的三方墓志。志文记叙了均不足周岁的姑叔侄三人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四月二十五日迁葬至此的史实。怀柔县韦里发现的北齐武平二年(571)《傅隆显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两块刻字的墓砖。此墓亦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有纪年的北齐墓葬。历史记载,早在三国魏时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在薊城地区屯田种稻,在当时的梁山(今石景山)的漯河(今永定河)上修建了一个拦河大坝,称戾陵堰。在大坝的东端开凿引水渠,叫作车箱渠,使薊城的水量充足,洪水暴涨时又可疏泄,灌溉面积达两千顷之多。当时曾立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和《戾陵遏表》,以及后来北魏裴延侗作幽州刺使时再修戾陵遏所立《追荐魏征北将军刘靖碑》等,今天这几件石刻文物均已不见于世。1997年石景山八角村西北发掘魏晋墓一座。有石刻若干:1. 墓门二扇,门上浮雕武士执戟

及三角纹图案。2. 墓室前室内建石帐(椁),全部由后壁、左右壁、地板、顶板五石组成。前檐正面刻绘五个兽头,屋脊四角雕出兽头。壁面虽无片文只字刻写,却有生活画面绘出。3. 石兽一件。迄今在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一处摩崖,也是此时期的遗存,即《东魏武定刻石》,该石刻呈不规则形,位于门头沟区色树坟永定河转弯处的一块台地的自然巨石上,东魏武定三年(545)刻。文中记当年成边筑城用夫之事。南北朝佛教盛行,其风波及燕蓟。今存的实物不多,仅传世的北魏太和十三年(489)石佛造像一躯。此像背光之后附有纪年及《闫惠端等造像记》题刻。石刻原在海淀区聂各庄乡车耳营,1998年被盗,毁为五段,今已修复,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保存展出。另有今燕山石化区及门头沟区新发现石造像两尊,学界争论不一,此不赘论。传世品在北京者亦有数例,均附有题记:神龟二年(519)《杨对口等造像记》,天平三年(536)东魏《赵俊兴等造像记》,北齐天宝十年(559)《张聪造像》,北齐武平元年(570)《贾致和等十六人造像》及无年款但具此期风格的造像若干。

### 三、北京地区隋唐时期石刻

房山地区从隋代的静琬大师开始,在云居寺刻经,代代相承,镌刻不止。当初静琬大师担心有“法难”的危险,故日夜刻经不止,藏之深山。始刻于隋代,盛刻于唐、辽、金三代,终刻于明代末年,历时千余年。所刻佛经1022部,3500卷,刻石15000余块,分别镕藏于石经山九洞和南塔前的地穴中。(本卷已有专论,此不赘述)就当时的镌刻水平与数量之丰,价值之高,在全国亦为仅见。即使是到了今天,房山石经的数量也占北京地区全部现存石刻总件数的一半以上。除云居寺刻经之外,房山县磁家务至今仍存有大量的隋唐遗迹,明代无梁殿下的孔水洞中存有隋代的石刻造像及刻经,无梁殿内东西北三壁上连续24m的唐朝大历五年(770)《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浮雕,汉白玉石

质,上千佛像分层次布满石壁,菩萨、诸佛、伎乐天万头攒动,出没在山川云气间,甚为壮观。仙佛人物姿态各异,颇具动感,并不像其他石佛造像,千佛一面,往往凭手印才能区别。上房山云水洞存唐辽金及明代旧迹较多。二站村的贾岛墓、祠及据传贾曾出家的云盖寺,虽然今存已无早期的石刻,但它的历史在地方志中记载悠久。经过岁月的沧桑,石刻丢失被毁弃是可想而知的。今仅存明碑一段、清碑两通、匾一。另外,房山的大峪沟、云居寺石经山、上方山云水洞亦均存唐代的石佛造像。在整个房山区境内至今尚存有八座玲珑小巧、造型别致浮雕造像或铭文的唐代方塔。可见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带动了整个房山地区石刻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北京地区石刻的发展。而民俗石刻或其他类石刻,却极少见。只有少量的墓志出土。隋代墓志,在北京范围内,迄今只发现了数种。相比之下,唐志虽然较多,但也少初唐之作,多为开元、天宝、永泰、大历之时。此期的墓志,已基本定型,平面呈正方形,志石不大,边长约50cm。志盖多为盂顶式,盖顶镌四字篆书题名。四刹线刻花草纹图案,或十二生肖纹饰。志文多行楷,行字不尽相等,随意性强。外罩四框,内界竖格。文字不多,但较规整清晰,一目了然。用字在今天看来已多生僻。志文中还保存有大量的地理沿革与历史事件的史料。联系文中所记当时的地名与今天名称,即可看出其历史地名称谓沿革与变迁之一斑。志文所连带而及的历史事件,有许多又可补正史之缺。

今存的碑碣类石刻虽然不多,但很有特点。一个是它的宗教色彩,一个是它的艺术风格。佛教的造像碑,如《比丘尼毛藏妹严行造像》、《宋小儿金刚经碑》、《袁敬一经之碑》,无论从碑首的造型上,还是从佛造像的雕刻上,以及碑文书法上都体现了这一点。法源寺今存唐书法家苏灵芝所书《悯忠寺无垢净光宝塔颂》及文天祥祠所存李邕书《云麾将军李秀残碑》,就是两部非常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前者通篇章法布局颇具法度,

字法娴熟,张弛有度,笔意流畅,一气呵成,毫无做作之感。楷行草交替运用,即便是同一个字重复出现时,字法结构上也有所区别。后者则是一篇气韵生动的草书佳作。虽然今已被断作柱础,但其雄浑之势、自然天成之美犹拭目可见。还有一些金石书中曾著录过的碑刻,惜今已见不到其踪影了。如房山磁家务孔水洞唐开元年所立《大房山投龙壁记》,拓片仅存。清乾隆间赵怀玉的《游西山记》:“石景山(即今首钢中石景山)西岩有残石经数版,嵌崖间。其可辨识者,‘《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819)四月八日建’数十字,余多漫漶。”刘相公即刘总,刘总之父刘济,曾撰《涿鹿山石经堂记》,在房山石经山上立。刘济之父刘怱,据《金史》记载,当时的南苑有唐旧碑,即刘怱墓碑,后诏赐钱改葬。其实唐朝北京地区“燕石”(即今汉白玉、青白石一类)不论是在雕凿艺术上,还是在建筑上均已经广泛地使用了。据史料记载,唐天宝末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为了取悦于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陕西西安(时称长安)华清池建成之际,特遣使从今北京(时称范阳)往送白玉石雕琢的鱼、龙、鳧、雁及莲花、小桥。明皇见到置于池中的工艺品,其“鱼、龙、鳧、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结果差点儿惊了圣驾。可见其雕镂之巧及动感之强了。这些“美石材”为镌刻创造了客观条件。建国初,北京地区在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内曾出土过5件精美的汉白玉石生肖俑,计有鸡、蛇、龙、猴、羊,它们个个线条生动,姿态自然,栩栩如生。在丰台区出土的唐史思明墓翼兽,汉白玉质地,浑圆雕成,双目圆睁,蹲踞之势,既尊严又自然,结人一种大唐气势。作为顺义县城标志的石幢,今已残毁不完。县志记载系唐时故物,浮雕海马瑞兽,海水江崖,纯禀自然。虽时代尚有可疑,文物实为精品。

#### 四、北京地区辽金元时期的石刻

契丹入主南京(今北京),当时只是作为

五都之一的陪都,典章制度,民族特性等在石刻上所反映的还不很鲜明,甚至至今在北京地区还没有发现一件契丹文石刻,仍然以汉文化的内容为主。如发掘发现的《秦王发愿纪事碑》、《王守谦墓志》、《韩佚、韩佚夫人墓志》等。仍存原地的有海淀区大觉寺《旃台山清水院藏经之记》、房山谷积山院《辽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记碑》、庄公院《辽刘师尼塔铭》、门头沟戒台寺《辽故坛主守司空大师法均遗行之碑》等。今存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也是在辽代旧塔的基础上修建起来的。90年代文物部门对塔进行全面修缮时,于塔顶部发现了一方有辽代纪年的修缮石刻。即《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斗方大小,字体规整,通篇短小精悍。青石质地,纹理细腻。另外,石景山八大处二处辽招仙塔,毁于19世纪末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清理塔基时,人们发现了舍利石函及塔刹上的汉白玉承露盘。盘底上首横书有头体藏文二行。其下汉字竖书三行:“大辽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日工毕记”共30字,证明招仙塔为辽咸雍七年(1071)郑氏所造。据考,郑氏为皇亲孟父房之后耶律仁先之妻。据钱大昕《潜研堂集》记,乾隆庚寅(35年,1770)三月,琉璃厂窑户掘土得古墓,有墓志一,“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志铭”。文中记“公讳内贞,字吉美”,今石已不存。金女真族定鼎于北京,南与临安(今杭州)对峙。国祚不长,但却留下了不少传说与史迹,如金章宗的燕京八景、西山八院,大兴隆寺内飞虹桥、飞渡桥题刻,卢沟桥、西华潭、昌平银山塔林等。海陵王完颜亮弑金熙宗而即帝位以后,为了有效地巩固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并打击宫中的旧派贵族对他弑位夺权的不满,他下决心将都城由偏僻的会宁(上京,今哈尔滨东南)迁至富庶的南京(今北京),并派张浩、刘筈等负责南京的修建工程。宫阙制度,模仿汴京新城。整个工程分为城池的扩建与宫殿的兴修两大部分。天德五年(1153),宫城竣工。海陵王正式下诏迁都,

改燕京为中都,析津府为大兴府。于是尽毁上京宫殿、宅第,并夷为耕地,所有的宗室也都被迁来中都。主要的宫殿建筑,是从城南门丰宜门北通宣阳门、拱辰门的直线为中轴展开的。沿着柳荫匝地的大道进入丰宜门,前面是龙津桥,此桥就相当于后来元代的周桥和明清的金水桥。桥下河水东流,水清而深。桥以燕石构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桥分三道,中为御路。由此可见当时石刻雕凿技术的发达与辉煌。

在中都城之西也有一座桥,大抵作为谒陵之桥及为出城而南的交通所设。那就是举世闻名至今仍存的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的卢沟桥。此桥已经多次修葺而非全部原貌,尤其是柱头上的那些狮子,原本一柱一狮,汉白玉雕成。石栏望柱,拱券汲水兽,巍然屹立,颇为壮观,桥面上可以并行十骑。据元代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各处桥梁之美鲜有及之。历史博物馆今存元代的《卢沟运筏图》再现了当年卢沟桥的盛景。

海陵迁中都后,卜地于大房山云峰寺兴建陵园,是为金陵(在今房山区)。把包括阿骨打和吴乞买在内的始祖以下十二帝的梓宫迁葬到这里,并设万宁县以奉山陵。其后改称为奉先县,元代又改为房山县。金陵虽然在金元(一说明代)之际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陵上建筑几乎无存。建国后文物部门进行了发掘,发现《金景陵睿宗圣号碑》(见图一),石质凤棺及睿宗景陵的部分雕刻极为精美,神道上有雕龙祥云石栏板、石阶等。

金代的统治者也很重视汉族文化,同样对中原文化的载籍、石刻等视为珍宝。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金军在灭亡北宋后,俘虏了徽、钦二帝、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贵戚三千余人,并席卷汴京宣和殿、太清楼和龙图阁的图籍、珍宝和文物而北。其中包括著名的天文仪象之器、歧阳石鼓、九经石刻、宋仁宗篆书的针灸经石刻、定武兰亭石刻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除少数在途中散失外,后来都置放在燕京。如《石刻春秋残碑》、《石刻礼记残碑》,当时置燕京城南金国



图一 金景陵睿宗圣号碑

子学中,明代记载已磨灭不完,清时记载已不复存矣。《针灸经刻石》后亦失落。建国后,在拆除明代城墙的工程时,在城墙的填充物中又发现了该石刻的部分,共计七石,今已收藏于文物部门。歧阳石鼓,即石鼓文,由于唐时发现于歧山之阳故名。其时代,学者聚讼未决,总之为先秦故物。当时金人得之汴梁,辇至京师,见其以金塗字,知为贵物。由于后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失落于泥土草莱之中。最终在元大德之末(1307)为大兴府学教授虞集发现,向时宰建议动员军队,以大车十乘载列于元大都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这才算将国之重宝真正保护起来。其后,石鼓除在抗战中被运往西南保管外,一直没有离开北京,现存故宫博物院。近几十年,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北京地区先后又发现了不少重要的金代石刻。如房山县石楼村出土的金《杨瀛神道碑》,丰台区出土的《吕徽墓表》,通州区出土的《李抃墓志》,平谷县出土的《巨构墓志》,西城区阜成门外出土的《董庠灭罪真言刻石》,丰台区出土的《乌古论窝论墓志》、《乌古论元忠墓志》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与碑等。

元代与辽金相比,国土面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真正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元代蒙古统治者在原中都废墟的东北处建立了大都城。这些都促进了京城石刻事业的发展。新城选择在高粱河的下流,使宫苑水源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为了运送木石工料,又重凿金口闸,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元大都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城中街道及街坊里巷制度,胡同和四合院,至今还有多处保留原来的格局,还保存着大量的自元代以来留存下来的石雕石刻小品,如石坊额、石门墩、上马石、上轿石、滚墩石、拴马桩、石敢当、钱檐石雕、墙腿石雕刻等。

它的另一个贡献是,皇家园林的兴建。元中统三年(1162)忽必烈下令将金琼华岛加以修整,作为驻蹕之所。宫城筑成后,把这里改为万岁山,组成宫苑的主体。至元二年(1265)琢成的凌山大玉海便放置在这里。《辍耕录》载:“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把金水河水引至山后再汲至山顶,从一个石龙口泻入方池,然后伏流出仁智殿后,从石雕昂首首龙口中喷涌而出,东西分流入池。

再有一个贡献就是元大都的水系与桥闸系统的建设。至元二十六年(1289),会通河修凿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建成,著名的水利科学家都水监郭守敬重新主持设计了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方案。北引昌平白浮村的神山泉,汇合一亩、马眼、玉泉诸水,扩大了运河的水量。并在大都到通州之间增置闸门二十处,以时宣泄。桥闸的修建既解决了漕运用水诸问题,同时它也是石雕石刻与建筑一体的成就,现在仍能见到的白浮九龙池之九龙口石雕,万宁桥(俗称后门桥)就是当初二十四桥闸之一。条石铺路,石雕栏板,犹可见当年的遗风遗韵。传说当年拱券下悬“北平”二字石匾,今天早已不见踪影。但在本世纪初整修该桥时,发现了精美的石兽,其上有后至元四年(1344)铭刻,更加证明该桥的年代与价值。

元代的石雕技术也是远近闻名的,当时

大都稍南曲阳的工匠杨琼,是著名的雕刻家。世代为石工,他的玉石雕刻,得到忽必烈的欣赏,赞为绝技。大都的营建中,有许多石雕工程,就是由他来主持完成的。大都的周桥,便是他的杰作。由城南的丽正门入城,往北便是长可七百步直通皇城棂星门的千步廊。棂星门内数十步有河东流,河上建白石桥三座,称周桥。石栏上雕刻龙凤祥云图案,石质晶莹如玉。桥体下面还有四条白玉石龙承托。据有关学者考证,故宫今仍存的断虹桥,就是当年周桥的三虹之一。

元大都的文化传播非常迅速,中原及南方的理学、道教、域外传来的喇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在今存的石刻中都有所反映。如宣武区牛街清真寺、朝阳区东岳庙、昌平区居庸关、密云县番字牌、门头沟区燕家台、顺义县元圣宫、房山十字寺等都有重要遗存。体现了元代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一种追求,以及对他种文化的宽容。但不知是何种原因,元代的墓志至今出土较少,仅有崇文区出土的《铁可墓志》、朝阳区《张弘纲墓志》、颐和园《耶律铸夫妇墓志》,及房山出土的《焦瑛墓志》等数例。其中《张弘纲墓志》为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有一些重要的石刻,其中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为研究某一领域提供了重要依据。如《王德常去思碑》、《海云和尚葬志》、《崇国寺圣旨白话碑》、《岁数碑铭》、《敕赐十字寺碑》、《元成宗加封孔子圣号圣旨碑》、元进士题名碑、《钞纸局中书户部分官题名记碑》、“致和元年石匠刘三”刻石等。

辽金元时期的石经幢、塔幢,是此期的一大特点。辽金的最多,元代次之,其中以门头沟区辽统和十年(992)幢,为最高大,高4米余,并且完整。到了元代的经幢,已将八楞演变为六楞。明清在园林中仍有少量的复仿制品,寺庙中建经幢之风已过。由于时间久远与战乱动荡,完整的经幢已不多见了。在北京的四郊寺庙遗址附近,常常见有散落田野的莲座、云墩、伞盖、立莲等,幢身是其最重要的部分,上刻经文。也有半经半记、连序带款的。另有塔幢及造像幢等。

## 五、北京地区明清时期的石刻

此一时期北京地区的石刻种类最为齐全,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类别。内容题材大大丰富了,有许多新生事物于中有所体现。雕凿手法更加纯熟,格式固定。等级制度森严,体量也大小不一。此期不仅有大量的地上石刻与地下石刻,还有大量的建筑石刻、石雕及民俗石刻等。按照石刻学的理论,对中国传统石刻进行分类,大致应有11个类别,北京的石刻也包括了这些类别。明清时期石刻除画像石外,其他均有所体现。拟分述于下:

1. 刻石摩崖类。北京地区此类石刻,以明清时期的遗存居多。其中门头沟区色树坟石佛岭上石窟崖摩刻的明《石古崖修桥补路碑记》、崇化庄明《买地刻石》、木城涧路旁清刻《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石景山区八大处明《石佛造像及题记》等为最典型。除此之外,有关民间宗教、帝王巡视、山水题材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郊县名胜或城近帝王园林的山石上,其字体不一,形式各异,内容多样,如大觉寺、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它们是北京明清时期特殊的石刻遗存。

2. 碑碣类。统指刻字碑一类。如按所记内容及功能上去分,有墓碑、祠堂碑、寺庙碑、记事碑、功德碑的不同。如按造型特点分,又有方碑、四面碑、龟碑、卧碑、方尖碑、昆仑碑、嵌墙碑、异形碑等的不同。依此期碑类现状及叙述之方便起见,可分列于下:

北京陵墓碑遗存最多。如明清帝王陵寝所立之碑。悼亡纪念死者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建坟立碑。讲究者,碑上有螭首,下有龟趺、海幔,外罩碑楼。前书死者姓氏、简历、书撰、刻字、经理人姓名,后列出资人官阶、籍贯及捐钱数。阴阳额上亦有“万古流芳”、“捐资题名”等。碑框雕云龙图案,海幔刻鱼鳖虾蟹,碑侧及座侧浮雕升龙、海水江崖及麒麟、瑞兽等。墓碑也有墓主人名牌、功德碑、诰封碑、赐谥碑、敕谕碑、谕祭碑等。比较著名的如今存房山常乐寺的明《姚广孝

神道碑》,通县燃灯塔旁的明《李卓吾先生之墓碑》,今存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明故大隆善护国寺西天佛子大国师张桑朵而只墓塔记》、清《巴尔达齐碑》,密云县存清《范承勋碑》,顺义赵全营清《武功大夫碑》等。另外,北京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墓碑,即传教士碑。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士利玛窦开始,许多传教士陆续在北京境内传布天主教义,沟通中西方文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供职于中国朝廷,死后即埋葬在京师的集体墓地。目前仍保存了上百通墓碑,主要集中在西城区滕公栅栏原传教士墓地和海淀区五塔寺石刻博物馆碑林中。其中知名者除利玛窦外,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等。这些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形,下为方座。额题处镌刻十字或教会标志。碑面阴阳则以汉文及拉丁文合璧书写。明清两代传教士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很广,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人物风俗的重要史料。

坛庙祠堂碑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明清帝王除建宫殿外,也同样重视拜天祭神祀祖,这类建筑多雄伟壮观。如太庙、孔庙、国子监、历代帝王庙、雍和宫,天、地、日、月坛,风、雨、雷、霆、先蚕、先农坛等,素有五坛八庙之称。有些建筑虽已不存,但其碑刻仍有留存。如孔庙中的十几座高约七、八米的告成太学碑等,国子监中清《十三经》刻石、《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成贤街《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碑,雍和宫由乾隆皇帝撰文的《喇嘛说碑》等。祠堂也是封建时代祭祀性建筑,只不过其受用者及等级不同而已,有皇帝敕建,也有达官显贵、地主豪绅或乡民同建的公共性场所。如今东城区文天祥祠、智化寺(原明王振祠),西城区汇通祠、贤良祠,石景山刚炳祠,房山区黑龙关(原为祈雨祠),通州区曹氏宗祠等,其中都有相关的碑刻遗存。

寺观碑是有关记载宗教场所兴建、重修、四至、传承、戒条等的碑刻。北京的寺庙庵观众多,它们大多历史悠久,明清兴旺,今存的碑刻数不胜数,此不赘举。会馆碑是北

京明清时期又一特色。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开科取士,北京也再度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进京赶考,落榜生在京暂住以待来年。因此,他们联络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改为文人试院。因过去城南地荒不发达,会试举子又出入宣武门,故会馆多集中在今宣武区一带。明嘉靖年间增加外城,使得原本是郊外的城南一带成为发展经济市场的良好环境。清初又在崇文门设税关,使得今崇文区一带云集了一大批工商外来户,此地便成为工商会馆的聚集地。据有关资料显示,北京地区举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多达 200 余处,至修两广路前尚存上万间馆舍。其中有记事、行规、创修、馆产等的碑刻,如宣武区法源寺前街的《云南会馆重置碑》、下斜街的《全浙会馆重修碑》,崇文区河泊厂附近的《鲁班行会碑》、小江胡同的《创建晋冀会馆碑》等。总之,会馆碑是象北京这样大都市特有的产物,所以在北京的石刻分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研究明清科举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就是现存北京孔庙中的 198 通进士题名碑,其中明代 77 通,清 118 通,另有元代几通,共记载了 5000 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此外,还有其他内容的题名碑。如明万历十二年(1584)的《户部题名碑》、万历十九年(1591)《太常寺正官题名碑》、崇祯七年(1634)《顺天府儒学题名碑》、清康熙四十二年(1730)《御史题名碑》和道光三年(1823)《满道题名碑》等。这些碑刻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职官制、文化与政治的重要史料。

3. 墓志类。明清的墓志形式差别不大,平面呈正方形,汉白玉或青石质地。一般明代墓志中太监志较多,清代墓志中规格较大的要多。此期的墓志数量较大,北京地区大约有上千合,著名的有明太监《赵政墓志》、《钱义墓志》、《房能墓志》、《刘忠墓志》等。其他如《明广宁伯墓志》、《明武定侯墓志》、《明沅怀王墓志》、《明遂平公主墓志》等,民间百姓、致仕官僚的更多。清代著名的墓志有《洪承畴夫妻合葬志》、《四川总督苗大生夫妻合葬墓志》、纳兰性德家族墓志等。

4. 塔铭及与塔铭相关的石刻。即指在塔身上镶嵌的塔铭及相关石刻。门头沟的潭柘寺、戒台寺都有塔院。明清时期的僧塔不少上刻高僧法讳。如房山谷积山明代罗汉塔地宫壁刻《明敕赐谷积东庵释迦如来真身舍利碑》、海淀区五塔寺明建金刚宝座塔周身所刻藏梵文经咒等。

5. 经幢与坟幢。正如前文所述,元代以后经幢较少见,如石景山区法海寺明《楞严经幢》、《大方广佛华严经幢》,今北海天王殿前东西矗立的清制经幢。坟幢如房山谷积山上的《明太监马公幢》等。

6. 造像题记。此期的佛造像及题记大多为明代遗物。如门头沟石佛村的二十几尊造像及部分题记,石景山八大处翠微山麓的造像三尊并题记。

7. 买地券及镇墓券。买地券又称券茆、墓茆。一般系子女为亡去的父母买地安葬的凭据,用以告谓鬼神。一式二份,两块券石的接缝处骑缝刻咒语。买地券亦分石质与砖质二种。北京地区发现得较少。如西城区出土《明王赞墓券》,海淀区出土《明王佑茆券》,宣武区出土《萧公买地券》,丰台区出土《清匡士亮买地券》等。

8. 刻经。北京的刻经始于隋代,即房山石经,一直到明末。海淀区摩诃庵金刚殿内墙壁上至今仍镶嵌着明代重临集刻的三十二体《金刚经》,共为六十石。另外还有儒经与道经,今存国子监中的清刻《十三经》刻石,清代官订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全部模勒上石,共有 190 座碑形石刻。道教经有宣武区白云观后人模刻的元赵孟頫《道德经》刻石。

9. 石刻法帖。有明一代,帖学大兴,帝王的好尚,文人墨客的追随,使得后代留下大量的法帖刻石。由于刻石是为了捶拓,所以在选石上很有讲究,大多使用青石板材。今明代刻帖鲜见遗存,仅保留下清代的帖石为多。著名的法帖有清康熙《懋勤殿法帖》,乾隆《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清成亲王永理《诒晋斋法帖》。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民间私刻,如清刘塘《清爱堂帖》、邵瑛《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李鹤年《敬和堂法帖》、冯恕《蕴

真堂法帖》及不知名所刻的《滥竿斋帖》、《藏庵帖》等。

10. 建筑附属刻铭及其他。包括石匾、额、门窗石雕石刻等。最早的为金元时遗存,如白云观某斋的“斋”字残石;明洪武六年“平则门”;门头沟沿河城《永胜门》匾,沿河城敌台上的“沿”字号石匾;明定陵明楼石额(见图二),房山谷积山院内的明代梵文壁藏刻石;明真觉寺金刚宝座梵藏大经咒,西城区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前牌楼坊间梵文六字真言石刻等。明清时期北京的石雕石刻事业既积累了以往的经验,又形成了更大的规模。房山的大石窝,是北京地区最大的采石加工基地,明代以来逐渐形成规模,北京以南河北的曲阳,素有石雕之乡的美誉,两地互为表里。此地采石机械、石雕工匠云集,既产石材,又从事雕刻,兼及绘事。所出石材既要满足石雕石刻的需求,又要供应皇宫、陵寝、寺庙建筑、园囿别墅的建材。明代亦曾在大小石窝石材产地设官监办。

明清二代石刻的风格较为接近,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定都于北京,呈现一统江山的王者气派,帝王风范显示得特别充分,



图二 明定陵明楼石额

而且定型化、规格化、等级化。为众人所熟知的名胜古迹中的碑碣、石刻、石雕,均体型庞大,高耸挺拔,厚重敦实,造型规范,图案纹饰、年代区分明显,等级分明,用料讲究,刻工精细。如北京石刻博物馆存明《隆福寺创建碑》,螭首龟趺,通高达6m以上;清《普胜寺创建碑》、《普胜寺重修碑》双卧式碑,均高3m以上,宽近4m;大兴清《德寿寺双碑》,高7m以上。即使是帖石,也是工程浩大,连篇累牍。等级分明,主要表现在雕刻纹饰上,不论是碑首、碑身、碑座、碑侧、海漫,如果有龙的图案,那么此文物或多或少肯定与皇家有一定联系。如果是螭首,则其下必定是龟趺或雕龙方座。如果是素方座,则其碑身及碑首纹饰图案也极简单。帝王之碑,一般体量较大,尺寸规格要求较严,即使是内容不多的谕祭碑、诰封碑,也不会节省半分石材,书丹多为规矩的馆阁体。而民间百姓的碑,体量较小,以实用为主,图案比较活泼,如祥云瑞草、灵芝花卉、梅兰竹菊、子孙万代、瓜瓞绵延等。有的碑刻纹饰简单或素面,文字、刻工也较简易,而接近手写,甚至常常出现错别字。另外,清朝的北京因为是满族的统治,政府的怀柔政策,常有二体(满汉合璧)、四体(满蒙汉藏合璧)书刻的联楹、匾额及碑刻,是清代所特有的现象。时代上的区分,也反映在碑刻的细节之处。明清时间跨度不大,但各朝有各朝的特点,甚至某个皇帝、太后的好尚都直接反映到碑刻的形制上。额题由早期的圭形过渡到长方形,龟趺由写实到抽象化,碑面四框由简单的线条繁琐到雕龙、刻凤、团莲花、百子图等。规制也从大小不定到有一定标准,且不能僭越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抓住这些特征,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六、北京地区民国时期的石刻

民国时当封建社会之后,新旧交替之际,中西文化不断撞击。西方文化思潮逐渐渗透,旧学思想仍在继续。社会上的一部分人

在努力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适应新生事物。一部分人仍在尊孔读经,弘扬国粹。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石刻,脱离了帝制封建的阴影,摆脱了等级规矩的羁束,大胆放开地去创作。但由于当时社会不太稳定,国力尚不富强,且文人们的重点也早不在此。所以无大体量的石刻,极具艺术性的石刻较少,大规模耗资的石雕石刻工程也不多。因此,此期石刻有以下特点:

1. 摆脱封建束缚,更现文人气质。调查时常能看到民间百姓的墓碑上面雕龙刻凤,即使体量不大之碑,螭首浮雕也很讲究。如北大未名湖畔的《王国维墓碑》,《培根女学校匾》也大胆地使用云龙纹作边框。石景山八大处四照谷林长民书摩崖石刻,系作者游山题刻,笔随意转,率性而为。由登山开始,随上随题,最后将落款留在最高处,体现了一种当代文人的气质。受西方的影响,此期还出现了方尖碑,如《孙中山先生奉安纪念碑》、《刘和珍君碑》、《高君宇碑》、《石评梅碑》等。

2. 选材下料非常大胆,再不墨守成规。在海淀区征集的《王妙如女士墓志》,边长近1m,字大径寸,体现墓主人家的一种殷实家境和子女孝顺之心。同样是海淀区出土的由当时的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书写的《康心孚先生之墓碑》、《陕西城固康母杨夫人之墓碑》,系选用今天常用的建材石料墨玉。以墨玉制碑,以前很少见。

3. 立碑书篆,更加注重书法。如上文所述二物,前者为隶书,后者为大书法家所书行楷。八大处新发现的“燕玉”刻石,字体有浓重的魏碑韵味,又有颜字的功底。而同时发现的《庄子·秋水篇·濠梁问答》摩崖,呈现了草隶的风格。《行健会帖》,选刻历代书家墨迹上石,其中包括唐太宗、宋徽宗及乾隆皇帝等人的书法。说明当时文人书家的好尚。

4. 石刻所反映的内容,有许多是当时

的新生事物,或稍纵即逝的史实。如兴学碑、改庙建学碑、改学建祠碑、榜示捕盗刻石等。《金韵梅大夫之碑》碑阴有当时教育部长颁发的奖状。《四行储蓄会匾》、《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碑》、《增设汽灯茶棚碑》、《成立京城内外农圃研究所始末记》,都记载或证实了当时的史实,另外如修缮与修建的刻石、碑刻,如天宁寺、五塔寺、智化寺、白塔寺、第一助产学校等碑刻。

5. 当时的历史和人物,在石刻中都有所反映。中山公园今存的《美国前总统哈定墓碑》,西城区原地质部图书馆址仍存的《赵亚增碑》,海淀区出土的《民国交通总长潘复墓志》,石景山慈善寺冯玉祥书摩崖刻石,门头沟区城子今仍存的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周自齐墓前的华表、牌楼等建筑,坊心额题“周氏墓道”及“控山带河奠灵城,镇燕绍鲁衍华初”联语及《周自齐墓志铭》等石刻。另有《张文襄(之洞)公祠堂碑铭》、李慈铭《极乐寺看海棠记》等。

民国毕竟是革命与变革的时代,时间不长,动乱不断,虽距今不远,但石刻不丰。

总之,北京地区的石刻,既多且繁,疏密有度,遍布北京的城郊各地。北京市属18个区县石刻分布总趋势是:城内比较集中,郊区比较分散,西部多于东部,北部少于南部。北京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战争动乱,自然灾害,政治风云等,石刻文物是屡建屡毁,屡毁屡修。“文革”时期,损毁的石刻不在少数。建国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开发,“酸雨”逐渐成为石刻的天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京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展开,陆续不断有新的石刻文物被发现,使原有石刻的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不乏有价值的石刻文物。迄今为止,现存已知的石刻总数应在近3万件。这些珍贵的石刻遗存,是我们研究、弘扬北京历史文化的极为宝贵的史料。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丰  
台  
出  
土

辽  
韩  
氏  
家  
族  
墓

神  
道  
碑

陈  
康

2003年5月五环路丰台段施工时在卢沟桥与宛平县城间挖土时出土了一方辽韩延徽家族(金)韩××墓神道碑,此碑年代为金海陵王天德年之后,出土时只是残碑,为碑的下半部,有文字1840字。碑原应是在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公墓原址是辽政事令、鲁国公韩延徽家族墓地。这方韩公神道碑何时被充作修固永定河护堤石料运

到丰台,情况不详。

韩延徽是辽代著名的宰相,韩氏家族也是辽南京(幽州)的显族之一。韩延徽,又名颢,《辽史》、《契丹国志》均有传,太宗时封鲁国公,赐鲁国田庄,在八宝山南,后辟为茔地,故此地沿称鲁郭,有鲁国公城郭之意,今地名鲁谷实为鲁郭之讹称。韩延徽卒于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以后韩氏历代均葬



于此,在外作官死在任上的,也归葬先茔,时间跨度在二百余年间。

解放后此地辟为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先后在这里出土过辽始平军节度使韩佚、辽六宅副使韩资道、金宣威将军韩诩等墓志四合。目前已知时间最晚的是金代韩诩墓,韩诩终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应州(今山西省应县)私第,在正隆二年(1157年)葬于乡之先茔,韩氏家族兴旺在圣宗朝后,与朝中高官大族结亲颇多,近年在海淀、石景山、丰台等地先后出土了王师儒、丁文道、丁洪父子、杜念、李继成等人墓志,他们皆与韩氏有着姻亲关系,为研究韩延徽家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丰台出土的残碑缺失上半截,墓主名字已失,单从文字来看,碑主韩公应是韩延徽的八世孙,韩倬的六世孙,高祖韩绍文,曾祖韩造,祖为资字辈,父韩诩。韩造,《辽史·道宗纪三》、《辽史·刘仲传》等有载,从1964年出土的“韩资道墓志”云:(他是)造之长子,韩资道应为韩造次子。韩延徽氏的族系名字取字十分严谨,排列很有规律,单数隔代名字为两字,取德、绍、资、景字,双数隔代名字是单字,单字名字从韩延徽后分别取偏旁部首为“彳”、“辶”、“讠”和“彡”。韩诩之子应为景字辈,韩公是韩景×。从已知韩氏世系看,韩造有子韩资道,韩速子韩资愨、韩资让,另外还有韩资顺、韩资睦等,《韩诩墓志》说资愨有三子,韩诩、韩该、韩谅,诩有四子,为景字辈,孙四人:汶、淑、汴、洙。韩诩父亲韩资×与韩资道同为张氏所生,韩景×子六人,残碑上刻湛、凉、激、温及二女,以上《辽代汉臣世系表》及《辽代汉臣世系表补正》中皆未有。

韩景×曾任金同知延安尹、郾延路兵马都总管府事(注:金代在各路设都总管府,长官是都总管,总判府事,是地方军政长官),为辅国上将军(注:金代置辅国上将军,为武散三十四阶之第五阶,秩从三品中),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实食封一百户,按制卒后有墓隧之碑。韩景×神道碑出土,一为幸甚,一为惋惜,他是已出土的韩

延徽氏中官阶最高、时代最晚的,可补史之不足,可惜的是碑已成残碑,又身在异乡,终不能得其全部,为研究韩延徽家族留下了遗憾。

附录:

## 食邑一千户食实封

### 壹百户韩公神道碑

奉直大夫翰林待□□同知知制誥上骑都尉河南□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生侍中倬公赠侍中侍中生绍文太子太师鲁国公资□公生造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致仕公即诩之次子也公既贵赠诩宣威将军曾祖妣张氏追封岐国太夫人祖妣王氏妣张氏王氏皆赠南阳郡太夫人

纷扰于天庆间祇候闕门特授左承制及宋二主归命 朝廷选闕门祇候能干者十余人护视西北公皆预焉二主尝出珠王纨绮遗□□公不受公益礼之

任使皇统初考叙前绩自六宅超授明威将军累迁振威授利涉军节度副使至明县疑狱滞讼即请于守愿□心剖史

郡用宁公日步簿书□□所堪以均赋役而人不困断治明察吏不得民一钱岁且满累迁宣威将军授兴平军节度使

竟夕一境沾足民德之一□待玉牒近属方□熙宗时宗臣作牧扶贵专忍嗜驰猎不以时方春州县承帖拘马数百

喻道之守惧为之止公尝察州县吏修废时海山令贪纵不法令方以事诣州公曰汝职废久矣悉条其□□□宜以□

州县吏之奸者杖而去之县民金口公神明也复按滦州同知取财方鞠之时僚属交议以为暴刻公日月浸月积而民

守倾毁举不能有所指惟公痛裁节之畏公廉毅而亦莫之毁也平人赖以纾后遂以为例及罢将去郡者幼相扶携嗟

以贵雄里中居母丧饮酒□纵遇二宿奸

逼取银三百两莫有知者公察系逼银者待狱  
之一人欵伏银遽超护公戒

激溢河流下接堤岸不支民居将汤没公  
乘舟相河之势率民当完者完之冲泛风涛出  
九死而不顾忘食息水以平时

□瀉阳起石贡余例为府僚分有之公曰  
为吏以俸康足食于家可纵其贪耶悉入官以  
助经费时廉访使周行天下距

第一民皆曰复得公民其安矣皆奔走歌  
呼惟恐其别有除命也公益扫除变更兴起法  
度使百姓安便之

大将军既代府民遮恋尤甚于去平时也  
未几授同知延安尹兼郾延路兵马都总管府  
事未之任天德三年太师南

首历是选日视出纳百用繁浩至于亿计  
公心术明敏服劳不倦事无巨细皆躬亲而办  
仍僻州佐县令谨廉者十余

召上殿海陵面喻曰朕曩者皇统间常过  
济州一识卿面尔后稔闻卿政誉朕甚嘉之卿  
延总尹纯质留人不炼事以

遇既之任事皆决于公初夏人以数万众  
入寇过塞门寨侵扰边户咸兵屡出不能却目  
颇为患公□移檄忧人一日

□皆敛色屏气公从容喻之曰汝幽遐小  
邦受上国封建岁有贡赐当□固疆场遵守臣  
职今乃恣为不逞以尺□之

一介问罪汝国其将何辞以对渠师耸然  
服罪诉以追访失马上比咸恐惧请命宜却兵  
三十里公悉驻列城堡诸

□比西路兵马都总管府事使喻海陵旨  
曰延安政成皆替□之力今移汝近地以待殊  
擢公附谢曰臣待罪巨藩

□□十日逾旬许人告捕给赏仍削官杖  
之停罢留者处□方赞皇令子婿到县□告留  
过期者公骇然谓其人曰

子婿面质其罪公曰汝祖父生之前然所  
出非嫡命立不明其人常侍汝祖父既而有出  
宁得为婢邦□当优礼嫁

□不预签署公曰少尹无一铢之罚公坐  
何不预焉始有悖语公甜然不为较也府帅为  
改悔会宋国贺 生辰使

□□宴以严饰见□大夫士皆以为宜方  
京师阙馈餉以公驰传发运河北东西路廩粟  
始议取民物力均以陆运

□不阙民用不扰未几海陵议公材干不  
可以秩次外用大臣亦荐公不可弃之于外将  
以户部尚书授公命已

□岁六月甲申葬大兴府宛平县房仙乡  
鲁郭里从先域也迨

□□者辄喻以义使归思之狱以故少闻  
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处事无细大皆尽其  
心故民乐其不扰凡

□之甲族勤孝柔仁动无违德故内外□  
姻莫不嘉其行累封南阳郡夫人有子六人曰  
湛曰淳皆举进士业

□副使曰激祗候内承奉班监苏门河平  
县早生镇酒税卒于官曰温敦武校尉监涿州  
税病卒女二人长适

□伯益祗候承奉班知潞王府印深二子  
也曾孙一人合喜女孙五人长早卒次为尼次  
适辅国上将军镇西

辅国上将军勋□□军爵至开国侯食邑  
至一千户实封至壹佰户宜有墓隧之碑□得  
次而铭之曰

弱冠筮仕 □□廉清 治惟勤  
出惟□ 副节济平 化行□郡  
教导刑威 □邪为正  
授赴关右 □□迴辕 天都肇建  
百甲寔□ 日受万计 日□□□  
□才何优 毫厘同□  
□何不淑 一病莫兴 皇天丧我  
万人之英 □孝于家 □□□□  
□□以廉 化民以德

鲁郭之里 房仙之乡 山长水远  
永固公茂 □□乡贡 □□□□  
□□□□ 杨□刊□

节度判官轻车都尉济阳县开国男食  
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孙□之书丹

举常 仓事护军南阳郡开国侯食邑一  
千户食实封百户□□立石

(作者为北京石景山文管所专业干部)

# 金诗中的中都胜迹

——纪念金中都建都850年

○范军

金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将都城由僻在东北一隅的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迁移到燕京,改称中都,从此开始了北京作为王朝首都的历程。今年是中都建都850周年,当年的一代名都,至今仅残留有几处遗迹。但是在金人的诗歌中,对这座雄伟都城的风貌却多有反映,后人读此,不能不生出很多感慨。故作此文,以为中都建都850周年之纪念。

金末元初人杨宏道有诗《中都》二首,诗云:

龙盘虎踞古幽州,甲子推移仅两周。  
佛寺尚为天下最,皇居尝记梦中游。  
清明谷雨香山道,翠管繁弦平乐楼。  
莫对遗民谈往事,恐渠流泪不能收。

繁华消歇湛恩留,忍见珠宫作土丘。  
海日西沉燕市晚,塞鸿南度蓟门秋。  
恭光父子三纲绝,安史君臣百代仇。  
善恶相形褒贬在,世宗更比孝文优。<sup>①</sup>

这两首诗,都抒发了对一代名都化为废墟的感慨,前者注重的是对景物的感叹,举凡雄胜的地理位置、壮观的寺庙、清新的香山道、繁盛的平乐楼都留在金朝遗民的记忆中,成为对故国痛苦的回忆。而后者更注重抒发对历史的感慨。北京在唐朝是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安史之乱”的根据地。到五代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时,又为了争夺统治权,而父子、兄弟相残。而到了金代,这里却出现了所谓“小尧舜”的世宗所创造的大定盛世,金世宗也远较同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杰出皇帝——北魏孝文帝优秀。这两首诗充分反映了作者对故国、故都的深厚感情,也说明了金中都的灿烂、辉煌。

中都被诗人歌咏最多的是宫阙、园林,尤其是万宁宫、西苑等,成了诗人反复吟咏的对象。

万宁宫位于今北海公园一带,是世宗所建,“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sup>②</sup>万宁宫周围有着丰富的水源,不但是一处风景胜地,而且周围还广布着稻田,又有江南水乡风光。世宗时,大臣张仅言“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sup>③</sup>万宁宫的规模相当大,明昌六年(1195年),章宗一次就裁撤万宁宫的陈设94处。万宁宫与宫城一样设有端门,泰和四年(1204年)四月万宁宫的端门曾发生火灾。<sup>④</sup>金章宗对万宁宫最为偏爱,曾巡幸多达十余次。他不只在太宁宫游玩,还经常在太宁宫长期居住。承安元年(1196年)三月至八月,承安二年(1197年)四月至八月,泰和元年(1201年)三月至八月,泰和六年(1206年)三月至八月,泰和七年(1207年)三月至八月,章宗都在太宁宫长期居住并处理朝政,或以太宁宫为中心,四处活动。可见,太宁宫不但是章宗的一处避暑胜地,而且是中都的第二政治中心。赵秉文有一首《扈蹕万宁宫》诗,描绘了扈从章宗赴万宁宫的情景:

一声清蹕九天开,白日雷霆引杖来。  
花萼夹城通禁籞,曲江两岸尽楼台。  
柳荫罅日迎雕辇,荷气分香入酒杯。  
遥想熏风临水殿,五弦声里阜民财。<sup>⑤</sup>

张翰也有一首《万宁宫朝回》,描绘雨后万宁宫的美丽:

宿雨初收变晓凉,官槐恰得几花黄。  
鹤传喜语留鞞尾,泉打空山辊鞠场。

已觉云林非俗境，更从衣袖得天香。

太平朝野欢娱在，不到莲塘有底忙。<sup>⑥</sup>

万宁宫还曾作为御试的考场，章宗在这里亲自对考取进士的考生进行考试，杨奂的《试万宁宫》一诗就是自己参加这次考试的记录：

月淡长杨晓色清，天题飞下寂无声。

南山雾豹文章在，北海云鹏羽翼成。

玉槛玲珑红露重，金炉缥缈翠烟轻。

谁言夜半曾前席，白日君王问贾生。<sup>⑦</sup>

万宁宫由于坐落在中都城外的北部，因而又被称为北宫，金诗中有几首以北宫为题的诗，写的也是太宁宫，如曹之谦的《北宫》：

光泰门边避暑官，翠华南去几年中。

干戈浩荡人情变，池岛荒芜树影空。

鱼藻有基埋宿草，广寒无殿贮凉风。

登临欲问前朝事，红日西沉碧水东。<sup>⑧</sup>

又如赵摅的《早赴北宫》：

苍龙双阙郁层云，湖水鳞鳞柳色新。

绝似江行看清晓，不知身是趁朝人。<sup>⑨</sup>

张行简的《六月二十九日北宫朝回》：

疏柳衰荷又一时，清波飞叶梦灵芝。

年年踏尽溪边路，不觉吴霜点鬓丝。<sup>⑩</sup>

从这几首诗可看出，太宁宫坐落在中都北边城墙最东边的光泰门外，是一处避暑胜地。其地湖光粼粼、殿宇耸峙、垂柳扶疏、荷花盛开，不愧为皇家的行宫。金代对此地的开发、建设，也为后来元代以此为中心兴建大都城以及明清北海皇家园林奠定了基础。

以万宁宫为中心的苑囿被称为北苑。<sup>⑪</sup>北苑在金人的诗中也有描绘，如师拓的《陪人游北苑(甲子岁)》：

系马溪边酌，啼莺柳外闻。

望长魂欲断，愁豁酒微醺。

草色明残照，江声入暮云。

故园春已到，归思日缤纷。<sup>⑫</sup>

赵秉文的《北苑寓直》：

柳外官墙粉一围，飞尘障面卷斜晖。

潇潇几点莲塘雨，曾上诗人下直衣。<sup>⑬</sup>

可见，北苑中遍植着柳树，有小溪注入池塘，而池塘中种植着大片的荷花，景色十分秀丽。北苑中除了万宁宫，宫墙外的处所

可能允许官员与士大夫游览，因为师拓曾“举进士不中，明昌中，有司荐其才，以嗜酒不果”。<sup>⑭</sup>可见师拓并无任何官职，而他游览北苑的甲子岁更是在明昌之后的泰和四年(1204年)。可见北苑在章宗时经过一定的程序还是允许游览的，但是有些过分之举则会受到惩罚的。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监察御史陶钧以携妓游北苑，歌饮池岛间，迫近殿廷，提控官石玠闻而发之。钧令其友阎恕属玠得缓。既而事觉，法司奏，当徒二年半。诏以钧耳目之官，携妓入禁苑，无上下之分，杖六十，玠、恕皆坐之。”<sup>⑮</sup>陶钧作为负责纠察百官的监察御史，本身的行为就十分荒唐，携带妓女游览当时尚为禁苑的北苑，且歌舞饮酒喧哗，毫无节制，难免要受到惩罚。

金中都最著名的皇家园林是西园，也就是同乐园，位于今宣武区青年湖一带。描绘西园的诗篇众多，有赵秉文的《上巳游西园，分韵得兰字，与杨礼部携同院诸公赋》二首：

相逢草草即杯盘，谁识吾曹个里欢。

燕蹴檐花堕茵席，鱼摇波日动栏杆。

无穷照影溪溪柳，不住吹香畹畹兰。

已属清明连上巳，更容飞盖接鸂鸾。

跨凤骑麟玉笋班，蹇驴不作杜陵酸。

已烦茧纸书陈迹，更许仙舟泛碧澜。

酒令致师严细柳，诗朋鏖战剧皋兰。

遨头却返瀛州去，梦觉扬州鹤背宽。<sup>⑯</sup>

他还以《同乐园》为题作诗二首：

春归空苑不成妍，柳影毵毵水底天。

过却清明游客少，晚风吹动钓鱼船。

石作垣墙竹映门，水回山复几桃源。

毛飘水面知鹅栅，角出墙头认鹿园。<sup>⑰</sup>

此外，还有冯延登的《西园得西字》：

芳迳层峦百鸟啼，芝麈兰畹自成蹊。

仙舟倒影涵鱼藻，画栋销香落燕泥。

淑景晴薰红树暖，蕙风轻泛碧丛低。

冈头醉梦俄惊觉，歌吹谁家竹西。<sup>⑱</sup>

李献能的《西园春日》：

的皪冰梢出短墙，泓澄暖绿静横塘。

娟娟高竹迎人翠，嫋嫋长红隔水香。

病起心情疏酒盏，朝来风色妬年芳。

只应归去芸窗晚，梦到湘妃锦瑟傍。<sup>⑬</sup>  
师拓的《游同乐园》：

晴日明华构，繁阴荡绿波。  
蓬丘沧海远，春色上林多。  
流水时虽逝，迁莺暖自歌。  
可怜欢乐地，钲鼓散云和。<sup>⑭</sup>

综合上述诗歌和其他史料，我们可以知道，西园位于中都皇城的西部，围以石垒砌的虎皮园墙。园内有湖，湖岸垂柳婆娑，湖面荡漾着钓鱼的小船。园内还种植着竹子与兰花，百鸟在假山间鸣叫，还有饲养飞禽的鹅棚与饲养鹿的鹿园。西园是向官员和士大夫们开放的。

除了上述园林外，中都近郊还有一些胜景，象中都东城墙最南边的阳春门外的风景，尤其是初春的风景，也负有盛名，杨云翼的《阳春门堤上》就充分描绘了初春阳光明媚、积雪将融、垂柳将绿的美景：

薄薄晴云漏日高，雪消土脉润如膏。  
东风可是多才思，先送轻黄到柳梢。<sup>⑮</sup>

香山与玉泉山在西山诸山中风景最佳，并且开发最早，在金代已经成为中都近郊的一处胜景，并为世宗和章宗等皇帝所喜爱而屡屡巡幸，乃至建造了行宫。香山在世宗时已是风景胜地，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三月“癸巳，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粟七千株，钱二万贯。”<sup>⑯</sup>可见，香山大永安寺的规模相当大，而且其寺产相当多，与皇家关系密切。据《金史·地理志》中都路宛平县条，玉泉山建有行宫，玉泉山“在县西北三十里。顶有金行宫芙蓉殿故址。相传金章宗尝避暑于此。”<sup>⑰</sup>香山也建有行宫，巨构在“大定中，诏与近臣同经营香山行宫及佛舍。”<sup>⑱</sup>香山留下了与章宗有关的诸多古迹，如祭星台，“在县西南四十里香山寺前。金章宗祭星之所，台废址存。”<sup>⑲</sup>护驾松“在县西四十里香山。金章宗游玩至此失足，得松护之，遂封云，今废”。<sup>⑳</sup>章宗游览香山与玉泉山有史记载的就多达十余次，如明昌元年（1190年）八月“壬辰，幸玉泉山，即日还宫”。<sup>㉑</sup>明昌四年（1193年）三月“甲申，幸香山永安寺及玉泉山”。<sup>㉒</sup>

章宗时的大臣赵秉文有两首关于香山的诗，描绘了香山的秀美景色和著名的红叶。一首为《香山》：

山秀熏人欲破斋，临行别语更徘徊。  
笔头滴下烟岚气，知是香山境里来。<sup>㉓</sup>

另一首是《香山寺飞泉亭》：

霜风吹林林叶干，泉声落日毛骨寒。  
道人清晓倚栏杆，自汲清泉扫红叶，  
一庵冬住白云间。<sup>㉔</sup>

描绘香山的金诗还有周昂的《香山》：

山林朝市两茫然，红叶黄花自一川。  
野水趁人如有约，长松阅世不知年。  
千篇未暇偿诗债，一醉聊从结净缘。  
欲问安心心已了，手书谁识是生前。<sup>㉕</sup>

王寂的《题香山寺》：

平生居士爱香山，百岁神游定此间。  
黄卷既能探妙理，青衫安用拭余潜。  
樱桃笑日艳樊素，杨柳舞风笑小蛮。  
尚想夜深携满来，幅巾中来听水潺潺。<sup>㉖</sup>

赵秉文还有一首《游玉泉山》：

夙戒游名山，出郊气已豪。  
薄云不解事，似嫉秋山高。  
西风为不平，约略出林梢。  
林尽湖更宽，一镜涵秋毫。  
披云冠山顶，屹如戴山鳌。  
连旬一休沐，未觉陟降劳。  
高谈到晋魏，健笔凌风骚。  
玉泉如玉人，用舍随所遭。  
何以侑嘉德，酌我玉色醪。<sup>㉗</sup>

在他们的笔下，香山、玉泉山包括著名的红叶在内的景色是十分迷人的，而更迷人的的是香山超凡脱俗的境界，使人乐而忘返，难免有摆脱官场、终老于此之想。

金中都的佛教十分兴盛，有着大量的寺院，这在金诗中也有反映。悯忠寺（今法源寺）是唐太宗为了超度征高丽阵亡的将士而建，寺中有一座楼阁十分高大，俗语称“悯忠高阁，去天一握”。因而该阁成了人们登临远眺的绝佳去处，也是众多诗人笔下所描绘并寄托胸襟的对象，如赵秉文写有《陪李舜咨登悯忠寺阁》：

日月躔双拱，风烟约寸眸。

云山浮近甸，宇宙有高楼。  
鸟外余残照，天边更去游。  
登临有如此，况接李膺游。<sup>④</sup>

还有史肃的《登悯忠寺阁》：

净宇怀超想，层梯企俊游。  
喧卑三界尽，制作六丁愁。  
聚土闲童子，移山老比丘。  
能除分外见，寸木即岑楼。<sup>⑤</sup>

仰山栖隐寺是金代著名寺院，更为出名的是寺院住持、金元时期的名僧万松行秀。仰山金代又名龙山，“在县（宛平）西七十里。峰峦拱秀，中有平顶，如莲花心，傍有五峰，曰独秀、翠微、紫盖、妙高、紫微。中多禅刹，金章宗游幸有诗刻石。”<sup>⑥</sup>寺院始建于辽代，世宗又重建，“大定二十年正月，敕建仰山栖隐禅寺，命元冥凯公开山，赐田设会，度僧万人。”<sup>⑦</sup>

金章宗曾到此游览，作《游龙山御制》一首：

嵯峨云影几千重，高出尘寰回不同。  
金色界中兜率境，碧莲花里梵王宫。  
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疏林万壑风。  
试拂花笺为觅句，诗成自适任非工。<sup>⑧</sup>

万松行秀也献上一首《龙山迎驾诗》：

莲宫特作内官修，圣境欢迎圣驾游。  
雨过水声琴泛耳，云看山色锦蒙头。  
成汤狩野恢天网，吕尚渔矶浸月钩。  
试问风光甚时节，黄金世界菊花秋。<sup>⑨</sup>

潭柘寺内存有刻于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的碑刻，内容是僧人重玉所作《从显宗皇帝幸龙泉寺应制诗》：

一林黄叶万山秋，夔仗参陪结胜游。  
怪石斓斑蹲玉虎，老松盘屈卧苍虬。  
俯临绝壑安禅室，汛落危崖泻瀑流。  
可笑红尘奔走者，几人于此暂心休。<sup>⑩</sup>

昌平的银山，又称铁壁银山，因为山体都为黑色花岗岩组成，恰似铁壁一样，而在冬日，山上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又使铁壁变成了银色，故而得名。历史上，银山不仅以林深、草密、泉幽、涧美著称，而且又以寺多僧众而享誉海内，与镇江的金山寺齐名，号称“南金北银”。唐代有高僧邓隐峰隐

居于此，他在这里修身养性，广播佛法，因而银山的景致多因他得名，而金人更伪托他的名字留下了《隐峰十咏》来咏诵银山的优美与佛法的奥妙，这十首诗载于大定六年（1166年）所立的《重建大延圣寺记》碑<sup>⑪</sup>中：白银峰

孤峰高出云，上有音色界。  
识得普贤才，虚空犹窄隘。  
悟明理性时，不作尘境界。  
劫大或侗然，此山无变坏。

佛顶峰

巍巍佛顶峰，妙笔莫能画。  
傍列千万层，比之无不下。  
毗卢顶上行，却笑忘崖怕。  
烟縠碧螺纹，幽静难酬价。

古佛岩

云縠幽岩路，寒松映碧虚。  
世人都不到，古佛义安居。  
寂尔心常静，凝然体自如。  
他年奉香火，相近结茅庐。

说法台

松下石台妙，山僧转法轮。  
虽然长苔鲜，终不惹尘埃。  
自有云为盖，宁无草作茵。  
当年谛听者，悟道是何人。

佛觉塔

示生临济村，示灭长庆寺。  
非灭亦非坐，谁明佛觉意。  
分彼黄金骨，葬此白银峰。  
宝塔耸霄汉，僧来访灵踪。

懿行塔

于其亲也教，于其师也恭。  
临机答问难，诸方怖机锋。  
七十一光阴，白驹之过隙。  
秋风振塔铃，说尽真消息。

雪堂

冷烟藏万壑，积雪满千山。  
空谷幽深处，虚空寂寞间。  
庭前明月静，窗外白云闲。  
中有白眉老，孤高不可攀。

云堂

斯堂寂虚整，衲子来如云。

虽然九圣混，不疑宾主分。  
何必习大智，何必修多闻。  
一念万年去，方为报圣君。

#### 茶亭

西峰寒翠中，有亭虚四面。  
山间奇绝处，一一皆可见。  
古松八九株，秋云三五片。  
共分壑源春，胜比瑶池宴。

#### 濛泉

寂寂银峰下，寒泉浸碧空。  
堪将罍池比，不与偃溪同。  
夜印月华白，秋风霜叶红。  
蛟龙此深隐，天旱济群蒙。

长城历来是保卫北京的重要屏障，金代也是如此，金诗中也有很多记述北京长城的诗篇。

刘迎有两首关于八达岭的诗，其一《晚到八达岭下达旦乃止》：

车马两山间，上下数百里。  
紫纡来不断，奕奕似流水。  
鲸形曲腰脊，蛇势长首尾。  
我车从其间，摇兀如病齿。  
推前挽复后，进寸退还咫。  
息心固安分，尚气或被指。  
徐趋自循辙，躁进应履轨。  
行行非我令，柅亦岂吾使。  
倦仆困号呼，疲牛苦鞭箠。  
絜如五更鼓。相庆得戾止。  
归来幸无恙，喘汗正如洗。  
何以慰此劳，村醪正浮蚁。<sup>④2</sup>

这首诗主要描绘了八达岭的险要与行路的艰难。另一首是《出八达岭》：

山险略已出，弥望尽荒坡。  
风土日已殊，气象微沙陀。  
我老倦行役，驱车此经过。  
时节春已夏，土寒地无禾。  
行路不肯留，奈此居人何。  
作诗无佳语，以代劳者歌。<sup>④3</sup>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八达岭内外的差异，一出八达岭，就是满目荒凉的塞外，与繁华的中都不可同日而语。

八达岭内就是中都西北面重要的门户

居庸关，宇文虚中作为出使金朝的宋使而被扣留，在他《过居庸关》诗中就抒发了不能报效故国的无奈：

奔峭从天拆，悬流赴壑清。  
路回穿石细，崖裂与藤争。  
花已从南发，人今又北行。  
节旄都落尽，奔走愧平生。<sup>④4</sup>

蔡珪的《出居庸》一诗也描绘了居庸关的险要难行：

乱石妨车毂，深沙困马蹄。  
天分斗南北，人问日东西。  
侧脚柴荆短，平头土舍低。  
山花两三树，笑杀武陵溪。<sup>④5</sup>

进入居庸关就是南口，南口是中都的内侧屏障，刘迎有《南口》一诗：

危峰张屏帟，峻壁开户牖。  
崩腾来阵马，翔舞下灵鹫。  
秀色分后前，晴岚迷左右。  
重阴忽障翳，虚籁竞呼吼。  
深迂爱风日，高亢扞星斗。  
帝居望北阙，村落当南口。  
军都汉时县，遗迹奄存否。  
中都读书处，遗构成摧朽。  
谁云用武地，经训乃渊藪。  
我家胶东湄，朴学叹白首。  
居邻通德里，况此见师友。  
惭无书带草，采采为盈手。  
何以醉先生，清溪绿如酒。

古北口是中都的东北门户，赵秉文的《古北口》一诗就描绘了几经战争的古北口的荒凉景象：

几家虚落兵戈外，数亩荒田谷洞中。  
日暮围场来野鹿，令人长忆笔头公。<sup>④7</sup>

卢沟桥是金朝留下的一份宝贵遗产。金代前期，已经在卢沟河（今永定河）上建造了大型浮桥。在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宋使许亢宗到达燕京附近，“离良乡三十里，过卢沟河，水极湍激，燕人每候水浅深，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河两岸造浮梁，建龙祠宫舍，仿佛如黎阳三山制度，以快耳目，今睹费钱无虑数百万缗”。<sup>④8</sup>可见，这时由都水监营建的卢沟浮

桥及附属设施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浮桥的规模不会小。大定十年(1170年),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作为祈请使出使金朝,他写有一首《卢沟桥》诗,对卢沟浮桥进行了描写:

草草舆梁枕水低,匆匆小驻濯涟漪。

河边服匿多生口,长记轻车放雁时。<sup>①</sup>

浮桥毕竟抗拒不了大的水灾,在汛期也不便两岸通行。因此随着金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到章宗时已经有实力与技术建造大型的石桥了,而且中都与各地繁忙的交通也要求有通行能力大的大型桥梁。于是卢沟石桥的建造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世宗大定“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要津,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有司谓车驾之所经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请官建东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间自应为耳。’左丞守贞曰:‘但恐为豪右所占,况罔利之人多止东岸,若官筑则东西两岸俱称,亦便于观望也。’遂从之”。<sup>②</sup>而《金史·章宗纪》中对卢沟桥的建造也有记载,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丁酉“作卢沟石桥”,到明昌三年(1192年)三月“癸未,卢沟石桥成”。卢沟桥的建造共用去了两年多的时间,其具体的负责人与工匠今天已经都不可得知。但是,卢沟桥作为金代科学技术的一座宏伟丰碑至今仍屹立在永定河上。由于卢沟桥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自其建成之日始,它就成了送别的最佳处所,如赵秉文的《卢沟》一诗,就说明当时的人辞别中都,友人常要在卢沟桥畔依依相送:

河分桥柱如瓜蔓,路入都门似犬牙。

落日卢沟沟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sup>③</sup>

①⑦《全金诗》卷101,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金史》卷24《地理志上》。

③《金史》卷133《张仅言传》。

④《金史》卷12《章宗纪四》。

⑤⑬《闲闲老人溢水文集》卷7。

⑥《中州集》卷8。

⑧《全金诗》卷130。

⑨⑩《中州集》卷9。

⑪于杰、于光度先生的《金中都》一书认为“北苑位于宫城之北偏西……当在宫城之外、皇城之内”。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该地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面积供建园囿之用。并且该书认为景明宫应在北苑之内,其实景明宫位于远在塞外的凉陞,见《金史》卷24《地理志上》。

⑫⑬⑭⑮⑯《中州集》卷4。

⑰⑱⑲⑳㉑《闲闲老人溢水文集》卷8。

⑳《金史》卷45《刑志》。

㉒⑳㉓㉔㉕《中州集》卷3。

㉖⑳《中州集》卷5。

㉗⑳《中州集》卷6。

㉘《金史》卷8《世宗纪下》。

㉙⑳明·沈榜:《宛署杂记》卷4《山》,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㉚《金史》卷97《巨构传》。

㉛⑳明·沈榜:《宛署杂记》卷4《古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㉜《金史》卷9《章宗纪一》。

㉝《金史》卷10《章宗纪二》。

㉞《全金诗》卷32,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㉟⑳《闲闲老人溢水文集》卷3。

㊱⑳《闲闲老人溢水文集》卷6。

㊲⑳《日下旧闻考》卷104《郊垌》引《续文献通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㊳⑳《全辽金诗》第1749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㊴⑳《全辽金诗》第168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㊵⑳《日下旧闻考》卷105《郊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㊶该碑拓片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6册第8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㊷⑳《中州集》卷1。

㊸⑳《三朝北盟会编》卷20引《奉使行程录》。

㊹范成大《石湖集》,转引自《人海诗区》第14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㊺《金史》卷27《河渠志》。

(作者为市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

# “黄帝南伐赤帝”

## 刍议

韩嘉谷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有“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阪）山之原”<sup>①</sup>一语，提供了炎、黄两大氏族集团的相对位置和地望，对研究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北方氏族部落的分布格局，以及中华民族祖先之一黄帝族的活动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兹试述之。

黄帝伐赤帝之战是原始社会晚期发生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一次大战，古籍多有记载。《国语·晋语》云：“昔少典取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挤）也，异德之故也。”炎帝即赤帝，姜水是《水经注》的渭水支流岐水，那里有许多和炎帝及姜姓有关的传说故事，徐旭生先

生据以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姬水地望缺乏线索，徐先生根据古代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以及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等故事，以为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北部<sup>②</sup>。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既然黄帝和炎帝二个氏族都在陕西境内，而他们之间的战争却何以发生在河北省西北部的涿鹿？因为“反山之原”应是《史记·五帝本纪》等其它古籍中频频出现的“阪泉之野”，所以黄帝族的地望需重新审视。

《史记·五帝本纪》对这次战争是这样记载的：“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勿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

五气,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驱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正义”引《括地志》曰:“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理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郦道元《水经·滹水注》也说这里有黄帝祠,但只谈及黄帝和蚩尤的战争,没有提到炎帝,其云:“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其水又东北与阪泉合,水导源县之东泉。《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晋太康地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不过黄帝和炎帝的战争也在涿鹿进行似乎可信,因为银雀山竹简和《战国策》、《淮南子》等古籍的记载都是如此。

在涿鹿发生的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战争,是原始社会晚期发生在我国北方的另一场大战,《史记·五帝本纪》是这么说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逸周书·尝麦篇》也记载了这场战争,文字略有不同,其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赤帝分命二卿,命蚩尤于宇(宅)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惧,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名之曰绝讐之野。”按照《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所逐的帝乃是神农氏,由于蚩尤把天下搞得“九隅无遗”,赤帝害怕了,说于黄帝,将蚩尤杀之于中冀这个地方。“中冀”,《山海经·大荒北经》作“冀州之野”,地望较广,班固《汉书·地理志》注引师古曰:“两河间曰冀州。”“两河”是指黄河中、下游河曲以内的地方,范围从黄河自河套南流段的东岸起,迤东到太行山东麓黄河下游的西

岸止。古黄河出三门峡后,沿太行山东麓北流入海,因此古冀州应包括今山西以及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部分地区,黄帝执杀蚩尤在冀州的范围内,具体地点不能确指。

二次战争都从涿鹿开始,涿鹿应是这三个原始部落集团分布区的接壤地。银雀山竹简说黄帝攻蚩尤是“南伐”,则黄帝族的居地应在涿鹿北<sup>③</sup>,涿鹿以南是炎帝族的居住区。蚩尤族的居地,徐旭生先生根据其和少皞等的关系,认为属于东夷集团,“这一集团所居的地域,北自山东南部,最盛的时候也或者能达到山东的北部。西至河南的东部,西南至河南的极南部。南至安徽的中部,东至海。”蚩尤和黄帝之间的战争也从涿鹿开始,则其居住区的边缘也当去涿鹿不远。

这些原始氏族集团在涿鹿一带展开的角逐,曾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水经注》、《晋太康三年地记》、《括地志》等古籍都记载了在那里流传的许多传说和相关古迹,不可能不在物质文化遗存方面留下痕迹,因此这一带的考古学文化分布以及它们的更迭情况值得注意。从近年的考古发现看,涿鹿所在的张家口地区确是多种原始文化接壤处,涿鹿西南面的山西地区是仰韶文化分布区,东南面太行山东麓是后岗一期文化分布区,涿鹿以北的燕山地区是红山文化分布区。不仅如此,在距离涿鹿不远的蔚县四十里铺和三关等地还发现了这些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顺序,依次是:后岗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红山文化<sup>④</sup>。继红山文化后还有一种遗存,即是张忠培先生说是“至今在考古文献中还找不到与之相类似的遗存”<sup>⑤</sup>,实是和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文化特征类似雪山一期文化的一种遗存<sup>⑥</sup>。面对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格局及其更迭顺序,令人惊讶,因为这些考古资料显示这个地区在当时发生的社会变动,简直就是上述诸原始氏族集团之间角逐传说的图解。

更迭顺序中年代最早的后岗一期文化,其分布重心在太行山东麓。该文化的形成过程南部和北部略有不同,南部的豫北、冀

南地区,后岗一期文化是由磁山文化经过中间环节界段营类型<sup>⑦</sup>发展而来,其演变过程是,到界段营类型时,陶器群仍以磁山文化固有的平底器为主,然而开始出现了圜底器,包括釜和红顶钵等,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后岗一期文化的常见器物,如细颈瓶、弦纹罐、小口双耳罐、饰喙状乳突的尖底器,因此可以认为界段营类型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前身。后岗一期文化的早期阶段,陶器群仍以平底器为主,到晚期才基本上多是圜底器,完成从磁山文化到后岗一期文化演变的全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圜底器因素,从周围相邻的原始文化看,应来自太行山东麓北部的镇江营类型<sup>⑧</sup>,后岗一期文化是磁山文化和镇江营类型两支考古学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sup>⑨</sup>。

不过不应忽略的是,在界段营类型时有一个重要现象,即这个文化类型表现出和环泰山地区北辛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以致有学者认为它们之间的“共性已超过了个性……,它们之间的联系已远非年代相似的缘故,而是文化用性的相同性所决定的。”<sup>⑩</sup>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太行山东麓和环泰山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包括磁山文化、镇江营类型和后李文化,从一开始便强烈表现出彼此间相同或相似的特点,都使用釜(磁山文化为平底釜)和支脚为组合的复合炊器,和黄河中、上游的“前仰韶文化”以及燕山地区的“前红山文化”尽皆不同,在黄河下游地区形成一个独具特征的文化区系,所以它们即使不是同源,至少也源头相近。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保持到约距今 7000 年前,由于全新世大暖期使气候不断升温,冰川消融,发生洪水,自三门峡以下的黄河下游平原成为洪水区,泰山和太行山之间的交往隔绝,于是两地古文化面貌反差日益增大,变成似乎似乎是不同谱系统古文化,其实它们较早阶段相似的特征表明,即使不是同源,至少也相接近<sup>⑪</sup>。它们在被洪水分隔后各自向相邻地区扩展,互不干扰。环泰山地区的古文化,由 8000 年前后的后李文化,经 7000 年前后的北辛文化,到 6000 年前演变

为大汶口文化,沿海岸向北发展至辽南,向南至东南沿海,向西则是沿黄河南岸至豫西,不见于洪水区以西的太行山东麓河北地区。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文化和镇江营类型,分别经过界段营类型和北福地甲类,到 6000 年前形成后岗一期文化,尽管南北之间文化面貌仍存在差异,但基本上已属同一考古学文化,其传播状况是,东、南两面皆不过黄河洪水区,主要向西、北方面发展,北面深入燕山山地,平谷上宅、密云燕落寨皆发现其遗存,在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中也颇能见到其影响,如由平行线条组成的彩陶图案等;西面则穿越太行山进入晋中地区,一直达于内蒙古中南部,包头的阿善、西园、凉城的红台坡、准格尔旗窑子梁等地皆发现其遗存<sup>⑫</sup>。这个分布情况恰和东夷集团的分布形势,尤其和蚩尤西逐神农氏的传说有着不谋而合之势,不能认为偶然的巧合。

蚩尤西逐神农氏,实际上即是进入仰韶文化分布区。神农氏的居地也在渭水流域,和炎帝族相近。该地区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神农氏和炎帝族应同属这一考古学文化,所以有的古籍将两者混而为一。《世本》说:“炎帝姜姓。”《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和炎帝之间的战争,《帝王世纪》便以神农氏替代炎帝,该书是这样记载的:“及神农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黄帝于是修德抚民,诸侯叛神农氏而归之。黄帝于是……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神农氏和炎帝在古籍中被如此混同,极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是同一氏族集团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名称或实体,神农在先,炎帝在后,所以当后岗一期文化向西扩展时,会产生出蚩尤西逐神农,炎帝害怕,说黄帝出战蚩尤的传说。蚩尤逐神农氏,以及炎帝说黄帝击杀蚩尤的战争,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应是仰韶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之间的反复较量。

苏秉琦先生把仰韶文化分为三支,即以

宝鸡—华县—陕县为中心的中支,以大河村—王湾为代表的东支,和以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西支,三支文化又以中心区系为纽带连接起来成为一体。对仰韶文化进入涿鹿所在的张家口地区并与后岗一期文化相接触的路线,苏先生是这样描述的:“距今7000—5000年间,源于渭水流域或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经历了组合和重组的过程……,在这一重组之后的仰韶文化,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套一带,同源于燕山以北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相会。”<sup>⑬</sup>这一带在相当距今6000年前后的遗迹中,至少可以判断出“含有红山文化、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和以安阳后岗下层为代表的仰韶文化(笔者注:即后岗一期文化)等几种特征因素交汇在一起。”<sup>⑭</sup>早在前仰韶文化时期,山西南部地区已有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存分布<sup>⑮</sup>,后岗一期文化进入晋中,无疑是对仰韶文化所属氏族集团的侵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取代后岗一期文化,是这两支文化所属氏族集团展开的新一轮次角逐,并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取胜告终。但仰韶文化欲东出太行却所行不远,仅在太行山谷道口的曲阳钓鱼台等一些地点见到其遗存,显然是受到后岗一期文化的抵制。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取代了后岗一期文化,然而不久又为红山文化所取代。红山文化以辽西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为分布重心,涿鹿以北属于它的分布范围,因此应和居地在涿鹿北的黄帝族有关。红山文化被认为源于兴隆洼文化<sup>⑯</sup>,和同属辽西原始文化之一的赵宝沟文化“大致分布在同一地域,又有一段并存、平行发展的时期。”<sup>⑰</sup>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都被称作“前红山文化”,在京、津和唐山、廊坊地区有较多发现,具有赵宝沟文化特征的遗存经常叠压在兴隆洼文化之上,北京平谷上宅<sup>⑱</sup>、天津蓟县青池<sup>⑲</sup>、河北三河孟各庄<sup>⑳</sup>、迁安东寨<sup>㉑</sup>等遗址都是如此。前红山文化向南深入到天津平原,天津北辰区刘家码头、武清区小韩庄、梅厂、宝

坨牛道口、北里自沽等地皆发现其石耜、石磨棒等遗物,和蓟县下埝头、弥勒院等属镇江营—北福地类型体系的遗存错杂相处<sup>㉒</sup>。不过在“前红山文化”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后岗一期文化势力强劲,平谷上宅遗址发现后岗一期文化直接叠压在具有赵宝沟文化特征的上宅二期堆积之上的地层。大致在距今6000年前后,辽西一带古文化也发生组合和重组,红山文化形成并崛起,到距今5000年前后发展成为领先中原一步的原始文化并逐步南进,蔚县三关出土它的典型遗物<sup>㉓</sup>。只是典型红山文化遗址在燕山南麓发现不多,红山文化大规模南下的物质遗存到“后红山文化”时期时才得到充分展现。

所谓“后红山文化”是指在辽西等地继红山文化后出现的小河沿文化,由内蒙古敖汉旗小河沿遗址得名<sup>㉔</sup>。陶器群中的筒腹罐体现出辽西地区古文化的传统,钵类器几乎与红山文化难以区分,彩绘中的半重环纹透露出与红山文化鳞形纹的渊源关系,尊形器和几何形纹饰等又显示出和赵宝沟文化的联系。“后红山文化”南下的证据是它许多因素较多地见于京津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sup>㉕</sup>、冀中地区的容城午方类型<sup>㉖</sup>、以及冀南、豫北地区的大司空村类型<sup>㉗</sup>,几乎覆盖了原先整个后岗一期文化的分布区。

雪山一期文化由昌平雪山遗址得名,拥有一组独具特征的陶器群,包括用于炊器的夹砂敞口罐,以及小口高领罐、钵、壶、盆、豆等,其中夹砂筒形罐、双耳小口高领罐等,都具有小河沿文化同类器物的典型特征。蓟县张家园<sup>㉘</sup>、蔚县三关等遗址皆发现与此相类似的遗存。

午方类型得名于容城午方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群,泥质陶中的小口高领罐、扳耳罐、折腹盆,夹砂陶中的筒腹罐、双耳中口罐,以及彩绘花纹中的斜线三角纹、对顶重环纹等,均与小河沿文化相同或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有饼足斜腹碗、弧线三角彩绘母题等未见于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尊形器、雷纹图案等也未见于午方遗址。若将这

两支文化的陶器群作比较,完全可以看到两者的共性大于个性,甚至把午方类型看作为小河沿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也不为过。这类遗存在冀中地区有较广泛分布<sup>②</sup>,房山镇江营遗址新石器文化第三期也属此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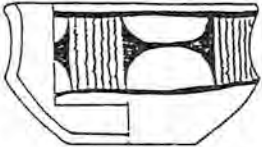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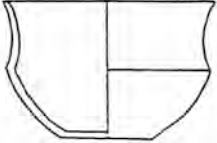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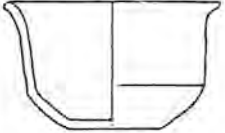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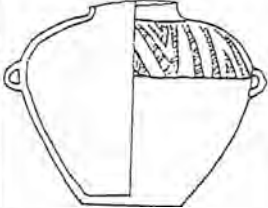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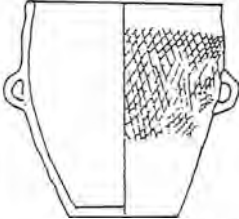
大司空村文化由安阳大司空村遗址得名,广泛分布于冀南、豫北地区,与午方类型有许多与之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不见鼎,有数量较多的敛口或折腹彩陶盆、钵、中口罐,以及饼足斜腹碗;彩绘一般都施于盆、钵的口沿下和罐的肩部,布图风格彼此接近。只是大司空村文化的彩绘多用弧线三角和平行曲线构图,流行花瓣状纹、蝶须纹、S形纹;午方类型则多用平行直线构图,流行对顶半重环纹和对顶三角形纹,母题彼此有别。就文化面貌的整体来说,两者也是共性大于个性,因此午方类型经常被归入大司空村文化。

小河沿文化接近午方类型,午方类型又接近大司空村文化(见图一),这样从辽西越燕山到太行山东麓南部,便明显地呈现出了一个文化传播带。在这个传播带上,敛口或折肩的盆、钵和中口罐等器类皆居突出地位,彩绘的布局和风格相近,而且都不使用鼎作炊器,表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只在于哪一端是此文化传播带的源头?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原先在太行山东麓,北部从镇江营—北福地类型开始,南部从后岗一期文化起,都使用鼎作炊器。可是现在属于这个范围内的大司空村文化和午方类型都不用鼎,而是用罐作炊器。午方遗址出土有典型的筒腹罐,大司空村遗址公布的发掘资料中,能用作炊器的也应是二件夹砂罐。环顾四周,相当距今近5000年前的大司空村文化之时,东面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南面是属大河村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西面为仰韶文化晚期的西王村类型,都使用鼎作炊器,只有北面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不用鼎而用罐。用罐作炊器是燕山地区炊事方式的传统特征,从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即如此,现在太行山东麓一改传统炊事方式,也采用夹砂罐作炊器,必是受到来自北面小

河沿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无疑是深刻的,其中当包括居民成份在内的变化,才有可能使炊事方式也发生变化。

不仅如此,在太行山东麓乃至中原地区,来自北方红山文化(包括前红山文化)的文化因素,还大量见于后世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如赵宝沟文化中有翅膀的野猪、有冠子的鸟、有翅膀的鹿,就是后世流传了数千年的龙、凤、麒麟灵瑞;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就是后世历代帝王奉行的坛、庙、冢祭祀制度;商周文物中的玉龙造型,以及广泛使用于青铜器纹饰的龙、凤、云、雷等母题图案,也莫不与红山诸文化有关;甚至崛起于漳河流域的商族,在追溯其祖源时,竟也和北方燕辽地区产生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殷墟商墓中人骨体质特征还表现出和北方居民有更大的关联<sup>③</sup>。在这些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中,影响最重大的当数礼祀制度,祀与戎是古代国家立国的两大要务,红山文化的礼祀制度为中原接受并被发扬光大,其意义决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化交流,而是包括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在内的重大社会变革。变革的渊藪来自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于是发明此礼祀制度的黄帝也成为膜拜对象,甚至被奉为祖先。《国语·鲁语》曰:“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而有虞氏和夏后氏都属于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到周代,周天子直接把自己视为是黄帝子孙,《国语·晋语》记:“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周人的姬姓居十二姓之首,于是黄帝成了我国传说历史中最显赫的人物,此后受历代帝王祭拜。

不过《史记》说黄帝“东至于海,登凡山;西至于海,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统天下的皇帝式人物,应当是在后来大一统观念下产生的传说。在考古资料中,黄帝族南下的物质遗存证据,主要见于太行山东麓的大司空村类型、午方类型、雪山一期文化等遗存中,同时

器类	彩陶钵	折腹盆	彩陶罐	夹砂罐
大司空村类型				
午方类型				
小河沿文化				

图一 小河沿、午方、大司空村文化陶器比较

期相邻地区的晚期大汶口文化、大河村三期(或秦王寨类型)和西王村类型,都仍然使用鼎作炊器,各自和上阶段的文化一脉相承,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对它们的影响均不明显,黄帝族南下造成的势力范围是有限的。《史记·周本纪》记周武王封先圣王之后为诸侯时,炎帝被列于黄帝之前,这除周人发轫于炎帝族故地外,也略可见炎帝的影响。黄帝所以能在中华历史上取得突出地位,主要应归于他创造了在当时领先中原一步的原始文明,成为古代帝王维持统治的精神武器。

①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

②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③陈平:《略论阪泉、涿鹿大战前后黄帝族的来龙去脉》,《北京文博》1996年第3期。

④关于这些考古学文化的绝对年代,《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提供后岗一期文化的碳-14年代有二个数据,分别为公元前4185±140年和公元前4390±200年;庙底沟类型为公元前3900—3000年。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提供红山文化的碳-14年代数据:早期的兴隆洼遗址F133为距今5865±65年,晚期的东山咀和牛河梁分别为距今4975±85年和4895±70年。

⑤张忠培:《张家口地区考古的重要收获》,《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⑦⑩张忠培:《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

⑧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⑨韩嘉谷:《环渤海古文化谱系和区系类型说》,《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⑪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5期。

⑫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

⑬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

⑭苏秉琦:《蔚县三关考古工地座谈会讲话要点》,《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⑯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⑰刘晋祥:《赵宝沟文化初论》,《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8期。

⑲纪烈敏等:《蔚县青池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年。

⑳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考古》1983期5期。

㉑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迁西县东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㉒《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㉓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插图第51“红山文化彩陶罐”,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

㉔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放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12期。郭大顺:《大南沟的一种后红山文化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2,1989年。

㉕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㉖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容城县午方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学集刊》5,1987年。文启明:《午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认识》,同上。

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4期。

㉙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㉚潘其凤:《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作者为天津市博物馆研究员)

# 北京东岳庙 善会述略

尚 鸿

北京东岳庙位于朝阳门外神路街北口,始建于元代延祐六年(1319年),主祀泰山神东岳大帝。唐、宋以来,在封建帝王的推崇下,东岳大帝已经成为“永皇图”、“厚民生”、执掌阴阳生死两途、权衡善恶果报的万能之神<sup>①</sup>。明、清两代,北京东岳庙被列入国家祀典<sup>②</sup>,皇室还屡发内帑修葺、扩建,使其地位更加显赫,是社会各阶层进香祭祀,修善延禧的重要庙宇。自明中期始,又出现绵延数百年的善会活动,使得东岳庙的香火更加旺盛。这些善会往往在庙中勒石立碑,纪述善举和会众姓名,天长日久,便形成蔚为大观的碑林<sup>③</sup>,这不仅是东岳庙的一大特色景观,而且为研究东岳庙善会提供了史料。

所谓善会,就是祭神修善的民间社团组织。主要活动内容是举行祭祀庆典,为庙宇和香客做善事。组建善会,一般先由具备一定财产和声望的人捐资号召,个人自愿参加;往往是以居住区域为纽带,集合邻里而成<sup>④</sup>。也有一些善会由不同的社会群体结成。同时,成立善会还必须经过“贺会”手续,即由新立之会的主持人商请相熟的善会首领代发请柬,宴请各会负责人,当场提出新会名称、宗旨及活动内容,经过各会承认,就成为“贺”出来的会,可以名正言顺地活动了。每个善会少则数十、百人,多

者近千人。男性称“信士”,女性称“信女”;如果是官员,则称“信官”,统称为“会众”。多数善会的会众以男性为主,少量善会以女性会众居多。他们按照本会规定,捐纳钱财,在既定时间、地点集合,前往东岳庙焚香拜神,贡献祭神供养等物品,义务从事本会负责的善事活动。

每个善会都有自己的“万儿”(名称),而且有“老会”和“圣会”之别:会史在百年以上的可以称“老会”,否则只能叫“圣会”。“会万儿”往往根据其活动内容而定。有的直称“东岳庙某某会”,如“东岳庙长香会”。有的则加上一些吉祥前缀:“万善吉庆悬灯老会”、“长寿白纸神账圣会”等。还有些善会依会众的居住地区,或者以“贺会”时的所在地点而冠以地域名称,前者如“东华门外散司圣会”<sup>⑤</sup>,后者如“西直门里小街口金牛圣会”<sup>⑥</sup>。如果某善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断档,后来又重新活动,或组织内部发生较大变动,就要加上“万善重整”或“全心公议重整”等字样,以示前承后继。

东岳庙善会会众的社会成份十分广泛,既有皇亲国戚、勋臣显贵,也有一般官宦和汉、满民众。《东岳天齐仁元圣帝善会碑记》的碑阴题名,赫然首镌成国公朱纯臣、驸马都尉齐赞元、冉兴让、万炜及抚宁侯朱国弼等勋贵显戚<sup>⑦</sup>。崇祯年间的“四处

进贡老会”由皇妃、太监和官宦眷属等组成<sup>⑧</sup>。《神明圣会碑记》题名中所列王安、孙德秀等,都是位居要津的中贵人物<sup>⑨</sup>。由此可见,朱明统治集团对东岳大帝的崇奉。他们的行为对一般民众的祭祀活动产生了“榜样”和“带头”作用。入清以后,以民众为主体的善会成为多数。也出现了汉、满族人共处一会的现象。“精忠圣会”即由居住在朝阳门内外的满、汉民众组成,专祀岳飞。“老掸尘会”会首为满清宗室,成员为京城内满、汉民众。后来又有满族人建立的“净炉老会”等,表明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满、汉人民信仰观念的趋同。有些善会由工商业者组成,如“献花圣会”为花市制花业者所建<sup>⑩</sup>。会众群体的多样性,说明东岳大帝信仰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

善会的总负责人称作“会首”或“香首”,下有副会首若干,多由首倡者担任。一些规模较大的善会组织比较周密,管理人员齐备。不仅有“都管”或“管事”操持会务,还设有不同名目的“把”,分司具体事务:负责祭祀仪礼,承办祭神用品的称“神堂把”;敲锣打钹的称“神耳把”、“吵子把”;挑担祭神物品的称“钱粮把”;打扫殿庑法物的称“掸扫把”;承办会众饮食的称“仲伙把”等等。此外,还专门设置“前引”一职,由谙熟会规,擅于言辞者担任,负责引导本会队伍,与其他善会周旋交涉,送往迎来。民国时期的“献茶圣会”则将负责人称为“经理”,明显地带有时代痕迹。

东岳庙善会的活动经费一般由会众捐纳,如“路灯老会”负责庙内悬挂路灯,“每朔、望夜需烛伍拾余斛,杂用共等费资拾数余金,成出会众”<sup>⑪</sup>。有些善会也能得到会外助善人的财力帮助。如“老掸尘会”每年都得到阜成门、皂君庙、宫门口等地人士赞助的“棚资”<sup>⑫</sup>。宫中太监曾经捐给“香灯供膳会”10000两纹银。该会用此款在通县张家湾、马驹桥购地30多顷出租,每年收取租银380余两,用来支付东岳庙、慈尊寺供膳、海灯用油及妙峰山妙尔洼茶棚所需用

度<sup>⑬</sup>。

旧时每月初一、十五,“京师四民……大而牲帛,小而香烛,奉祝者毂击肩摩,接踵而至”<sup>⑭</sup>东岳庙。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大帝诞辰,自三月十五日起,迤迤半月,东岳庙内外香客云集,“比肩接踵,趋踰匍匐者可万数,而随喜游观者不与焉”<sup>⑮</sup>,祭神活动至此达到高潮。虽然东岳庙进香由民众自发兴起,但也是众多善会共同参与的活动,后者甚至成为迎神赛会的骨干。尤其东岳庙属于“子孙庙”,道士最多时不过十几个人,势难应付规模盛大的开庙活动,全仗各个善会出钱出力,操办一应事务。根据他们的修善活动,可以将东岳庙的善会分为庆祀、供养、清洁维护和施茶4种类型。

### (一) 庆祀类善会

庆祀类善会主要是举行神诞庆典活动。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朝廷遣官祭祀东岳大帝以后,是民间善会举办的规模盛大的神诞庆典<sup>⑯</sup>。他们“张羽旂,设供具,以享神”<sup>⑰</sup>,并将东岳大帝像抬出庙外游行,名曰“出巡”。人们盛“陈鼓乐、旌帜、楼阁、亭彩,导仁圣帝游”<sup>⑱</sup>。“中幡”、“开路”、“太狮”等武会也前来走会<sup>⑲</sup>。一路上,旌旗蔽日,锣鼓喧天,“出巡”场面十分壮观。“帝之游所经,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骈观之”<sup>⑳</sup>。及至清代,庆典活动更加丰富,“出巡”队伍中“亦有装小儿为故事,名台阁者,以彰祭祀之仪”<sup>㉑</sup>。寿桃老会还仿效西王母为汉武帝祝寿的传说,“盛其供张,陈设百戏,以侑神乐”<sup>㉒</sup>。此外,还有“放生”盛典:由一男童扮作白猿,手捧装有小鸟的蟠桃形盒子,跪在岱宗宝殿前的石供桌上。当鞭炮声(信号)起后,启开盒盖,同时,其他会众也将手中鸟笼的笼门打开。一时间,群鸟腾飞,吸引了无数的围观者<sup>㉓</sup>。这些活动使得东岳庙的迎神赛会更具娱神娱人色彩。

俗信认为,虽然东岳大帝掌握世间生死两途之柄,但是其属下的七十六司,却是

权衡每个人生死祸福等具体事务的职能机关。“皈诚岳神者，先祷于诸司，冀诸神之达之”。因此，虽“邀福于岳神，皆诸神默相之”<sup>②</sup>。各司神主多为人鬼崇拜，民间有他们的生辰传说。于是便有专事七十六司诸神生诞庆祝的庆司老会，例于各司神主诞辰之日，诣庙焚香致祭。也有的善会专祭某一司神主。相传，岳飞执掌速报司事，精忠圣会即于二月十五日举行庆祝岳飞诞辰的活动<sup>③</sup>。

## (二) 供养类善会

供养即供献神用、祭祀物品。这类善会的数量最多。他们大都按年例于三月十五至二十八日内，将供养物品贡献神前。

按照“以神道设教，必以人道事神”<sup>④</sup>的规律，人们认为神所享用之物，如同人间，所献物品多为冠、袍、笏、履<sup>⑤</sup>等。又依照世间官府的用支模式，以为东岳大帝下属司曹所需簿籍账册甚多，一些善会即专门供应神用纸册笔墨。每年三月，白纸会就会来到庙中，将装订好的账本簿籍等供献于神前，并将去年的账簿投入燎炉内焚化，“以散诸曹”<sup>⑥</sup>。

道教祭祀，多以香、灯、花、水、果为祭祀用品。认为香能够传心达信，上感真灵；灯可以破暗烛幽，下开泉夜；花有舞动阳气，熏沐金容之功；水能够洒涤冤魂，恢复真形<sup>⑦</sup>。因为它们具有浓厚的象征性，所以成为众多善会常年贡献的物品。“盘香老会”专供大盘香，保证殿内夜间燃香不断<sup>⑧</sup>；“香灯供膳会”除承办祭神膳品外，还负责供应岱宗宝殿内的香灯用油<sup>⑨</sup>；“献灯老会”于“每月朔、望前一日，在上圣一十四殿献灯，恭进香烛钱粮，□府七十二司各进香烛”<sup>⑩</sup>；“路灯老会”则“内起神前，外至歧路”，架起路灯<sup>⑪</sup>；“献花圣会”按时更换各殿、司的供花<sup>⑫</sup>；“三伏清晨供献净水老会”负责在“三伏”期内，每日更换各殿、庖水盂内的清水<sup>⑬</sup>。他们希望以此达到通神明，修功德的目的。

## (三) 清洁维护类善会

道法清虚，最忌肮脏。道经要求每月按时清洁神像<sup>⑭</sup>。东岳庙神像众多<sup>⑮</sup>，必须勤加掸扫，以免沙雕虫篆之虞。况且，每当开庙之日，“进香顶礼者，自晨至暮，填集不绝。过此以往，扫除拂拭虽设有庙户以供其后，而广殿、修廊、集场、甬道区分林立，曲折逶迤，半月之中，讫无暇日”。再加上“楮炉香鼎，积烬充盈”<sup>⑯</sup>，都使得清洁工作十分繁重，也产生了专门清洁法物和环境的善会。他们的宗旨十分明确：“去旧染之污，使重华而复见；效日新之德，除积垢而克明。故净外即以净内，扫室所以扫心”<sup>⑰</sup>。以为“亲执其劳，安知不为迁善改过之一助”<sup>⑱</sup>。表达了清洁活动的宗教修行意义。这些善会分别在初一、十五日后来庙，清洁法物，洒扫庭除<sup>⑲</sup>，将庙“内外一律扫除洁净”<sup>⑳</sup>，“务使炉无积滞，灰不飞扬”<sup>㉑</sup>。此外，还有负责维护门窗的“糊饰窗户会”，每年秋季将各殿门窗糊饰一新，“以肃观瞻”<sup>㉒</sup>。

## (四) 施茶类善会

道教认为，茶有清心、开窍、通灵、除秽的功能，是献祭时不可缺少之物。因此，献茶成为道教的重要仪礼。献茶善会除供献清茶于神前作为飨祭外，就是为香客无偿提供茶水。这同样被人们视为积善因，修功德的行为。早在明代隆庆年间，就有施舍茶水的善会<sup>㉓</sup>。清代又有“献茶圣会”、“集义献茶老会”、“如意供茶老会”等。他们献茶祭神以后，便在庙中张棚施茶。“集义献茶老会”还施舍“结缘豆”<sup>㉔</sup>等物，任香客拈掬取食。使人们在礼神逛庙的时候，与善会会众共同获得“结善缘”的心理满足。因为献茶类善会具有为香客直接提供服务的功能，所以东岳庙的住持也间或参与其中<sup>㉕</sup>，共襄善举。

正是这些善会，使得东岳庙环境整洁，

供养丰足。灵香氤氲,灯烛洞幽。在幢幡摇曳,铎磬声声中,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气氛。出巡、百戏、放生等媚众活动,则增加了宗教节日庆典的热闹程度和吸引力。阳春三月正值踏青郊游时节,人们来东岳庙礼神祈福之后,还可以兼赏郊外的旖旎风光,在长松欹柳下酣饮畅谈。从而促使更多的善男信女趋之若鹜,凡夫俗子随喜添趣,也使得商业、娱乐业在东岳庙周围蓬勃地发展起来,形成集宗教、娱乐、商贸为一体的庙会。东岳庙逐渐成为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场所。逛东岳庙,早已是北京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

根据存世碑文,东岳庙的善会肇始于明代嘉靖年间<sup>④</sup>,终明、清之世,相继有近百个善会在东岳庙活动。除上述善会外,还有一些祭祀民间俗神的鲁班圣会、马王圣会等,会众多为工商业者。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国家的祭祀礼仪业已废除,科学观念渐入人心,民间崇祀香火亦趋阑珊,再加上时局跌宕,民生凋弊,东岳庙善会也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sup>⑤</sup>,至1946年,仅有8个善会继续活动<sup>⑥</sup>,其中不乏收支短绌,难以缴纳“钱粮”<sup>⑦</sup>,捉襟见肘,勉强维持者。建国前,也都逐渐地销声匿迹了。

①元·赵世延《昭德殿碑》：“皇元有天下，世祖皇帝岁遣使赉香帛诣祠致祭。至元辛卯，加封大生。于以祈纯取以永皇图，邕百嘉以厚民生也”。天启四年《四季进贡白纸圣会碑记》：“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统摄万灵，掌人间善恶之权，司阴府是非之目，案判七十二曹，刑分三十六狱，口奸罚恶，录生注死，化形万类”。

②明代北京东岳庙为“京师九祀”之一，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由太常寺官员前往祭祀。见《明史·礼制》；清代，北京东岳庙被列入“京师群祀”，于万寿节遣官致祭。见《清史稿》。

③据北京市文研所赵迅先生统计，东岳庙碑林共有一百余块石碑，善会碑占绝大多数。

④明·沈榜《宛署杂记》：“城东有古庙，祀东岳神……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善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

⑤康熙二十九年《东华门外散司会碑记》：“遂

集同里忠厚信心者，共成一会”。

⑥康熙二十三年《金牛圣会进香碑记》：“由是众等鸠集诸善在于西直门里小街口，诚起金牛圣会”。

⑦该碑为崇祯二年所立。朱纯臣是功臣后裔，“崇祯时见倚任”。朱国弼也是朝廷重臣，“崇祯时总督京营”。齐赞元、冉兴让是神宗女儿遂平公主、寿宁公主之夫。万炜是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之夫，“尝以亲臣侍经筵，每文华进讲，佩刀入值”。见《明史》功臣世表、列传。

⑧崇祯七年《东岳庙圣前进贡碑》。碑阴有“大明端妃刘氏”、“大明田妃李氏”、“大明良妃王氏”等皇妃题名。旁有成国公夫人常氏题名。下有各处首领太监题名。再下有“李门贾氏”等题名。

⑨王安曾任司礼监伴读，以平定宫帑有功而为司礼监秉笔，后为魏忠贤所谗害。孙德秀为司礼监秉笔，后因不见容于冯保、张居正，被劾。

⑩还一些情况是：某善会中，含有一定数量的工商业者。如“献花圣会”后来与太监组成的白纸会合并，称“白纸献花会”；玉器行业人组成的“长春会”后来并入“众善掸坐圣会”中。“东岳庙中军一堂”虽系“鼓铺”业人组成，但该会很少单独活动，往往附庸于其他善会。此外，还有如“马王圣会”、“鲁祖老会”等，因其所祀不是东岳大帝系统诸神，所以本文不予述及。

⑪康熙十七年《路灯老会碑记》。

⑫《朝阳门外东岳庙掸坐会碑记》。

⑬见光绪二十二年《香灯供膳碑记》、二十三年《香灯供膳碑》。

⑭康熙二十九年《东华门外散司会碑记》。

⑮顺治九年《东岳庙祈嗣善会题名碑》。

⑯万历十九年《岳庙会众碑记》：“中贵周公宽、李公坤、郭公进雅重岳山之神，鸠众二百余，于十六年创起会祀之礼，岁于三月二十八日行庆岳神生诞。盖礼以时举，次于朝廷秩宗之后”。

⑰万历二十年《敕建东岳庙会中碑记》。

⑱⑳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

㉑见郭子升《民间庙会》。

㉒见《康熙宛平县志》。

㉓康熙三十年《光禄寺寿桃老会》碑。

㉔见《一四七画报》，4卷1期，1946年5月11期。

㉕康熙四十八年《庆司会碑记》。

㉖康熙五十一年《东岳庙岳武穆王碑记》。碑

身左侧有楷书“诚起每年二月十五日恭庆精忠圣诞碑”。

②康熙九年《敬司会碑记》。

③这类记载颇多,可参见万历十九年《东岳庙建立冥用什物圣会碑文》,碑阴记有供献物品清单:前殿(即岱宗宝殿——笔者注)有二琉球二顶冠一顶、白口袜四厢、红朝履一双、云马一个、烛香八十枝、金银大千斤锭八个、金香炉一座、浓笔十枝、金银砚台一副(罩金)、金烛台一对、金银笔架二件。后殿(育德殿——笔者注)有珠翠凤冠一顶、金银茶碗二副等等。七十六司有云马、银笔架、冥资等。甚至备下了捆绑鬼魂的麻绳。又,康熙四年《东岳庙圣会碑记》:“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圣诞,进贡冠袍展翅。”康熙九年《敬司会碑记》:“供献凡仪仗、云马,各司所需,处庀毕备”;康熙二十九年《东华门外散司会碑记》:“攒口积金,虔办冠袍、带履、供器等仪,卜吉季春熏沐捧献于神前”。

④乾隆二年《东岳庙白纸老会碑记》:“东岳注人间生死,凡功过阴匿,一一录记,以彰果报。有曹司簿书,掌之如人世官府案牍,爰书所为者。于是创为白纸老会,每于岁三月预敛钱物,敬谨装订纸簿若干本及笔墨诸物,模而焚之庙,以散诸曹”。民国十二年重刻《万善重整白纸老会》碑:“每岁三月间,敬谨装订纸簿若干本及笔墨诸物承献,而将去岁之陈簿焚之于庙,以散诸曹”。

⑤参见《太清道德显化仪》、《太上黄箓斋仪》。

⑥见乾隆五年《盘香老会》碑。

⑦香灯,专指庙宇主殿神座前的灯,通常体量较大。岱宗宝殿内的香灯为铜制,直径约1米,能够盛香油360斤,俗称“海灯”。又因其昼夜长明,故有人称其为“长明灯”。

⑧乾隆五十七年《东岳庙献灯碑记》。

⑨康熙十七年《路灯老会碑记》。

⑩乾隆元年《献花圣会》碑:“年例在东岳天齐仁元上帝圣前,各殿诸司献花”。各司神案上的铁花瓶也由该会捐献。

⑪该会于“三伏”期内,每日清晨赴建国门外祁家园村并汲取净水回庙。途中以仪仗、鼓乐作前导,后面是会众抬着4大桶供水,队伍整齐,十分热闹。民国时期,会众渐少,便由附近居住的孩童帮助更换净水。他们攀过七十六司的栅栏,将昨日水盂内的水泼洒在地上,换上新鲜净水。笔者曾经专访居住在三里屯的一位老人,其为孩童时即帮助净水会换水,如今已耄耋没齿矣。

⑫《科戒营始》:“凡天尊形象,金铜宝玉者,每至月十五日设斋,香汤洗饰,若夹苎雕木,即揩拭使光净,最得功德。”

⑬据北平市社会局1927年统计,东岳庙神像为1316尊。据说其全盛时有3000多尊神像。

⑭乾隆二十八年《净炉会记》碑。

⑮康熙二十九年《东岳庙拂尘会碑记》。

⑯乾隆二十七年《齐化门东岳庙掸尘会碑记》。

⑰康熙三十年《东岳庙拂尘会碑志》:“予与诸同志约,每月初八日必踵庙瞻拜,且各醮资,量其力以口扫尘净炉之会”。雍正十一年《掸尘会碑记》:“崇文门内外各处众人等,年例每月十四日在东岳天齐仁元帝圣前,阖庙掸尘、扫土、进香、献茶”。同治七年《东岳庙拂尘会碑记》:“万善掸尘每月贰拾伍日诸司洒扫进香。”乾隆二十八年《净炉会记》:“朔、望前一日,相率到庙”,捣炉揩拭。

⑱光绪十八年《重建老掸尘会碑》。

⑲乾隆二十八年《净炉会记》。

⑳同治五年《糊饰窗户会碑》:“去岁随扈东岳庙,行见殿宇尚称辉煌,而窗棂间有损坏,因忆从前有糊饰窗户之会,废弛多年,无人继理,遂不觉发愿重整”。

㉑万历十八年《释明正施茶碑记》:“每逢朔、望,口庙施茶,起自隆庆庚午,至今万历庚寅,廿余年”。

㉒“舍豆结缘”之俗源起于明,盛行于清代。舍豆人将青黄豆一粒粒地由箩中拣出,每取一粒,呼神宝号一声。取毕煮熟,拌上盐豉,供香客随意取食。见乾隆八年《东岳庙集义献茶豆老会碑》:“每月初一、十五日在岱宗宝殿西边处设绿豆。又于初二日、十六日以置帐子、桌、凳、壶盏等物,在于广嗣子孙殿北边处设清茶、红枣、酱姜,以结善缘”。

㉓东岳庙第十九代住持华明馨,第二十一代住持张吉荫先后参与“清茶圣会”办会。见光绪十九年《公议同善重整诚献清茶圣会碑》、民国丙子年《公议同善重整诚献清茶老会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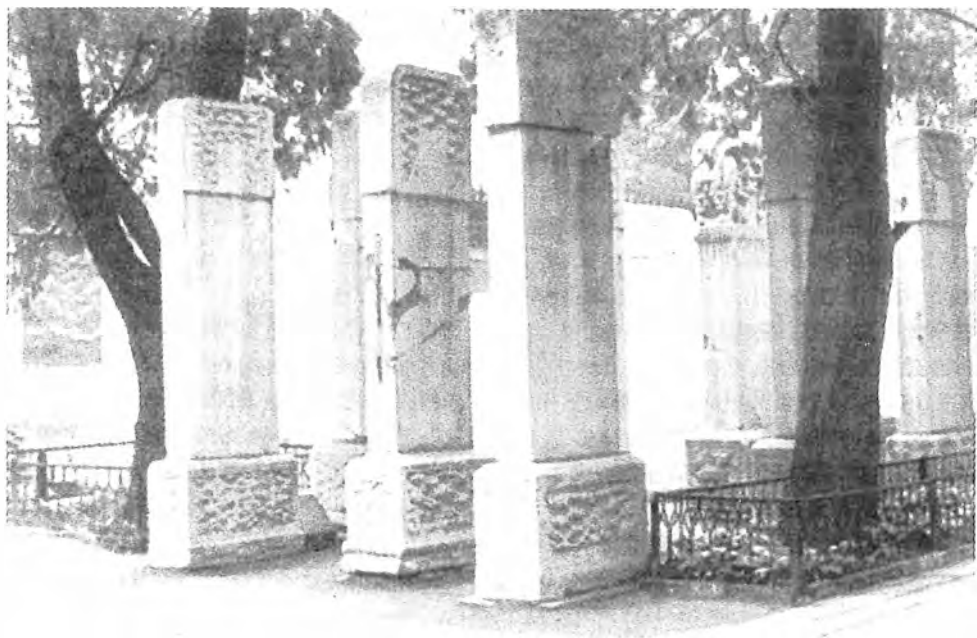
㉔嘉靖三十九年《岱岳行祠善会之记》碑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善会碑。

㉕民国时期所立善会碑仅有3统。

㉖见《一四七画报》,1946年5月11日。

㉗即该会所献给庙宇的祭神供养物品。

(作者为北京民俗博物馆干部)



图一

# 北京孔庙石质文物的 现状及保护探研

刘树林

## 一、北京孔庙中石质文物的现状

北京孔庙中的石质文物由于处在露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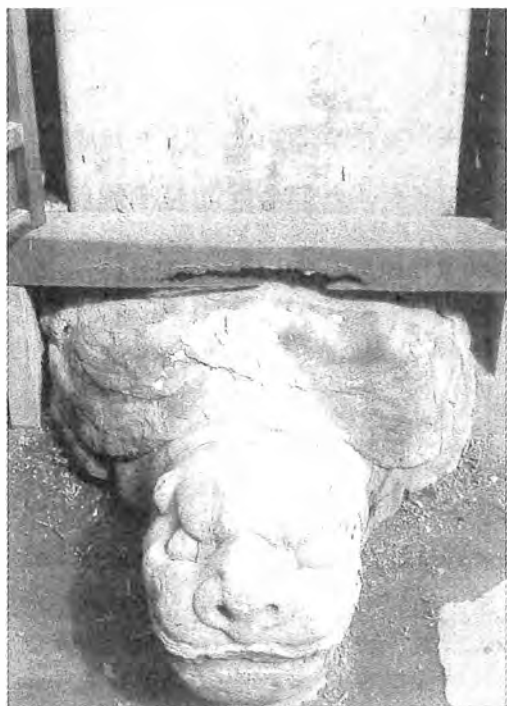
常年被大气和酸雨侵蚀,石碑、石亭、石鼓、石刻、石柱、石栏、月台、大青石浮雕等石质文物的表面已受到严重的侵蚀和损伤,出现了疏松、裂纹、脱落、沙化等严重风化现象,碑文字迹模糊淡化,若隐若现,时断时续,有

的字迹已基本消失,少数石碑甚至出现裂缝或断裂,碑身污物也相当严重。同样,先师门、大成门,特别是大成殿的汉白玉石柱、栏杆风化损伤情况也十分严重,有的已面目全非。

面对北京孔庙大量石质文物严重污染风化的现状,如何清除石质文物表面的污染物质而不损伤石材本身,如何修复已疏松、有裂缝的石质文物,如何防止石质文物再度被污染风化,这是我们文物保护科技人员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 二、孔庙内石材的结构分析

为了找出孔庙内石质文物的保护办法,2002年7~9月,我们请到了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资源评价与检测研究所的专家来馆对孔庙内的石质文物进行取样分析,取样范围包括进士题名碑、十三经碑林和孔庙内的若干汉白玉护栏,按各种碑的宏观特征和风化



图二



图三

情况共取样12种。鉴定手段主要采用岩石薄片及光片的显微镜观察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现将有关测试结果分别叙述如下。

### (一)关于取样地点及碑的宏观特征

进士题名碑立于孔庙大门内两侧,因材质不同、年代有异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风化。有的石碑因裂缝而进行过修补或加固,有的石碑因开裂而不得不用水泥、树脂及钢条加固,经风化和雨水淋洗后,钢条的锈蚀产物又将石碑浸染,严重影响其外观(图一);有的是由于碑罩上的锈蚀物浸染碑座(图二);有的虽未遭受明显损坏,但因受到不同程度的风化,部分石碑也出现了局部性的裂纹,使部分铭文字迹出现短缺;有的因严重风化而使表面物质大量损失,导致石碑上的大部分铭文字迹变得难以分辨;有的由于污浊空气及大量浮尘导致碑身上积存较多污物(图三)。由于历史的原因,个别碑身上涂上了墨迹(图四),有的汉白玉护栏表面因风化而整体上变得粗糙和灰暗;有的地方还出现了黄褐色和黑色,与原来洁白的衬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述现象在置放于露天的石碑和汉白玉护栏中较为常见。相比较,孔庙内的十三经碑林由于在相对密封的

条件下保存,除个别破损比较严重外,多数石碑风化程度较低,说明避免酸雨侵袭和自然气候骤变对保护石碑是有利的。而露天存放的进土题名碑,除个别因材质具有较强

的抗风化能力而风化程度较弱外,大部分风化现象较为严重。现将 12 个样本的取样地点及有关石质文物的宏观特征列表描述如下:

取 样 地 点	宏 观 特 征 描 述	编 号
进土碑东北侧后排第 8 号碑	为云纹状大理岩,灰白色,风化较强烈,易碎。	3
进土碑东北侧后排第 9 号碑	风化强烈,剥落严重,铭文多已消失。	5
进土碑东北侧后排第 10 号碑	抗风化能力较好,铭文字迹总体上清楚,但背面个别地方有缺损。	7
进土碑东北侧后排第 15 号碑	由细粒碳酸盐组成,含较多的泥质,抗风化能力一般,铭文受一定程度的侵蚀。	2
进土碑西北侧倒数第二排第 2 号碑	为表面有许多叠层石化石痕迹的石灰岩,抗风化能力较好,铭文字迹尚清楚。	4
进土碑西北侧 1 排自西向东数第 4 号碑	现青灰色,抗风化能力较好。	8
进土碑西南侧第 2 排西数第 1 号碑	灰绿色,有规则的层状构造,质地硬,抗风化能力强,铭文字迹受损很少。	6
十三经碑林第 33 号碑	暗灰色,在十三经碑林中为数较少的受风化较严重者。	12
十三经碑林第 107 号碑	剥落较严重者。	1
大成门西北侧汉白玉护栏底部与基座交界处	为汉白玉护栏表面的行将剥落的黄色斑块。	10
同前,拐角处	表面有黑色附着物的汉白玉护栏	9、11



图四

## (二)关于石材的化学组成及矿物组成

对各样品均进行了扫描电镜能谱分析,首先了解其基本化学组成,见图 1~12。碑的编号即为上表中的检测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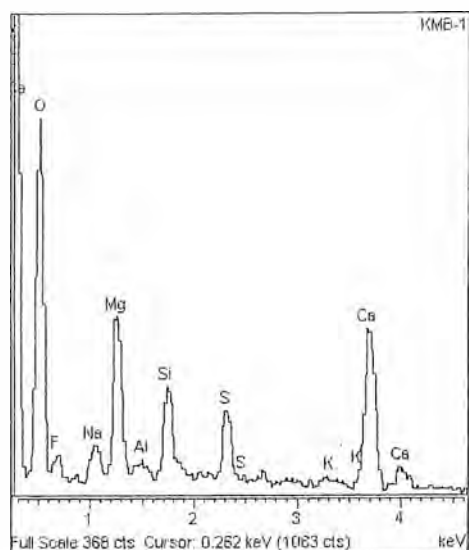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编号为1的碑(十三经107)的X射线能谱:除白云石的主要组成Ca、Mg、CO<sub>2</sub>外尚含显著数量的Na、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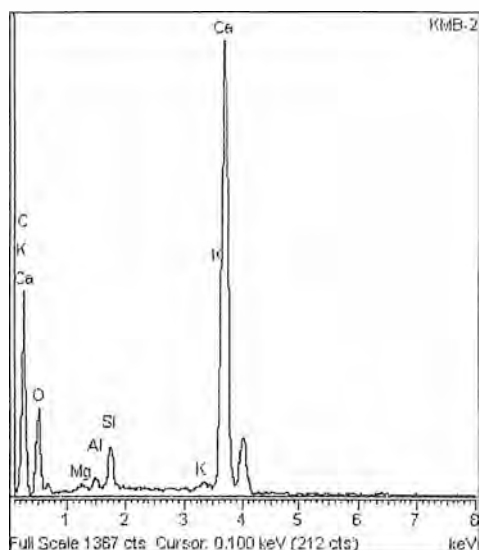


图2 分析编号为2的碑(东北角进士碑)的X射线能谱:除碳酸钙的主要组成Ca、CO<sub>2</sub>外尚含一定数量的Mg、Al、Si及少量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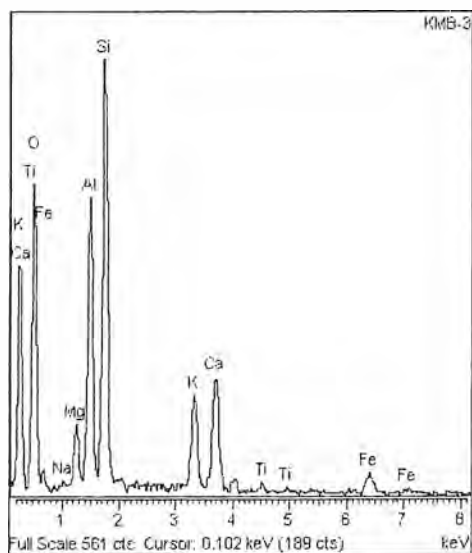


图3 分析编号为3的碑(东北角进士碑后排第8)的X射线能谱:除白云石的主要组成Ca、Mg外尚含显著数量的Al、Si、K、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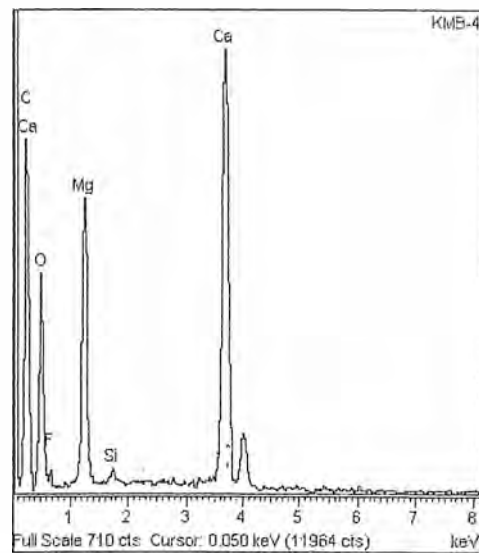


图4 分析编号为4的碑(西北角进士碑)的X射线能谱:除白云石的主要组成Ca、Mg、CO<sub>2</sub>外尚含很少量的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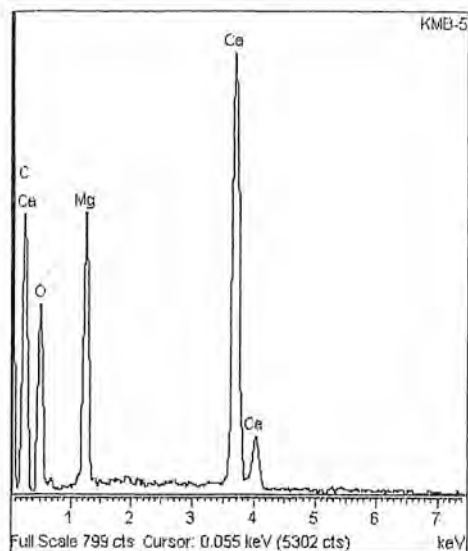


图5 东北角风化严重、铭文字迹不清的进士碑 X 射线能谱:基本为白云石的主要组成  $\text{Ca}$ 、 $\text{Mg}$ 、 $\text{CO}_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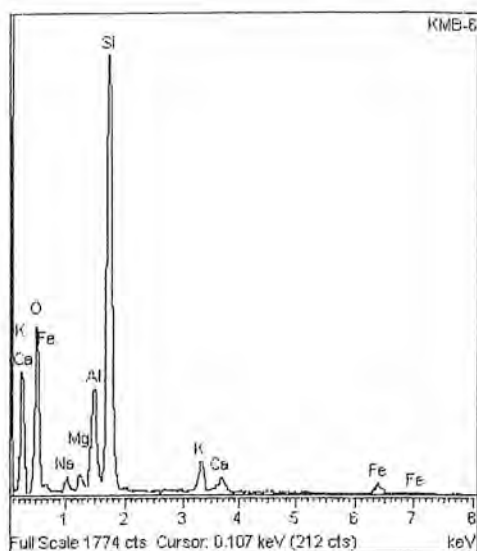


图6 西南角 2 排抗风化能力强的进士碑 X 射线能谱:主要由  $\text{Na}$ 、 $\text{K}$  的铝硅酸盐组成,而  $\text{Ca}$ 、 $\text{Mg}$  很少,即其材质较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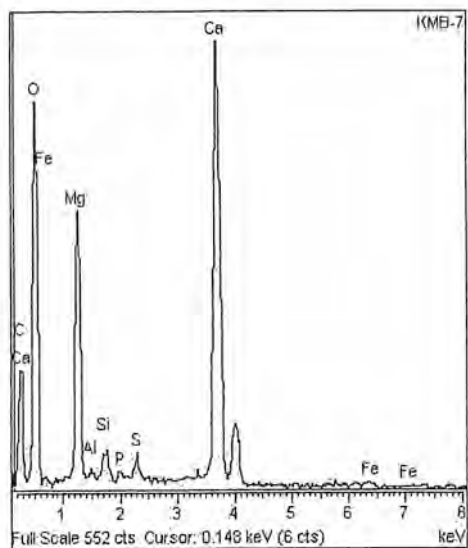


图7 风化较轻的东北侧某进士碑的 X 射线能谱:主要为白云石的化学组成,另含少量  $\text{Si}$ 、 $\text{Al}$ 、 $\text{S}$ 、 $\text{P}$  杂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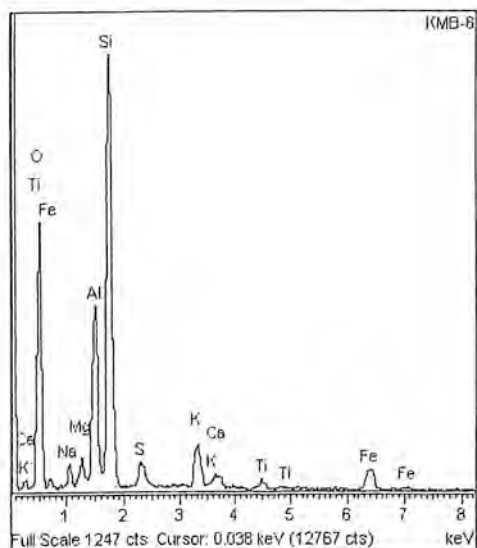


图8 西北侧的抗风化能力较好的青灰色进士碑基本成分:主要由铝硅酸盐组成而碳酸盐成分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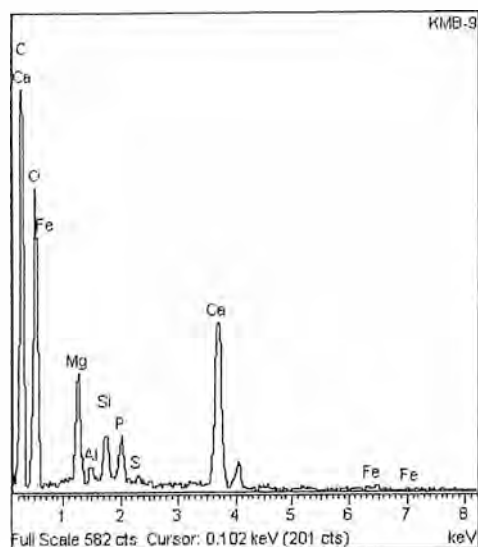


图9 大成门西北侧汉白玉表面的黑色污垢的X射线能谱:除白云石的基本化学组成外,另含显著数量的Si、Al、S、P杂质及少量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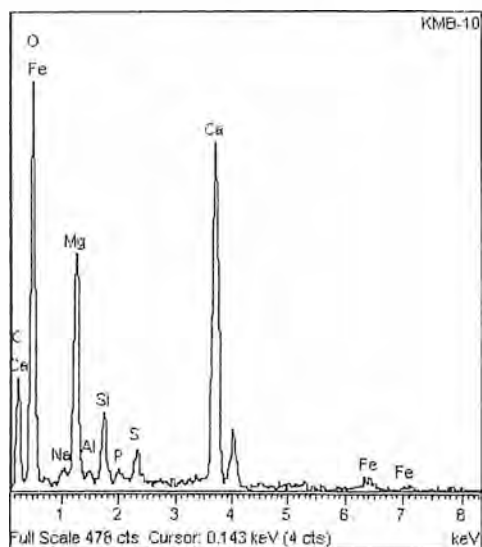


图10 大成门西北侧汉白玉台阶表面的黄色斑块的X射线能谱:除白云石的基本化学组成外,另含显著数量的Si、Al、S、P杂质及致色离子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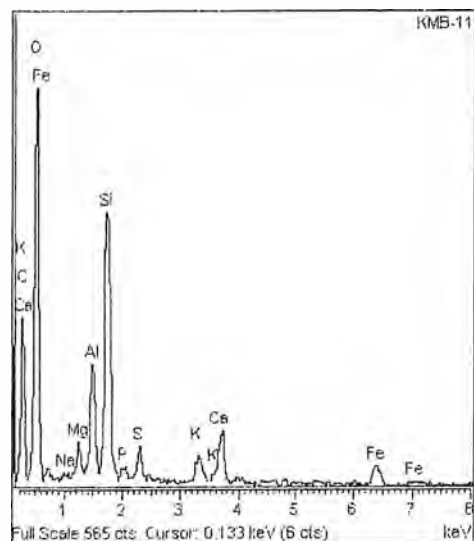


图11 同9,底座的黑色污垢能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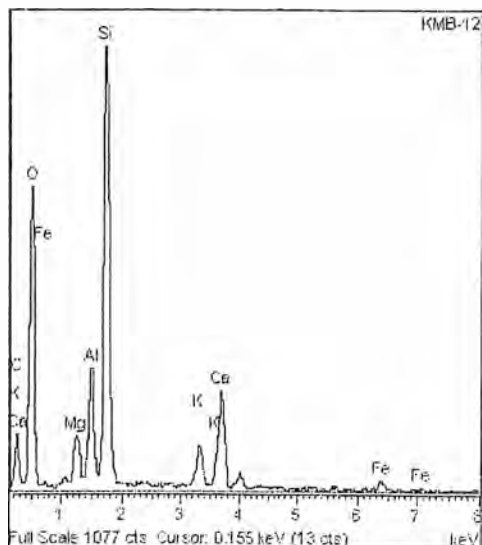


图12 十三经碑林中片理化明显的第33号碑碎块能谱。

通过对孔庙内的石质文物样品在显微镜下的观察,并结合对碑林石材成分的分析 and 了解,从有关石材的矿物组成与化学组成间的联系方面可以看出:

1. 大多数石碑由结晶程度不同的白云石( $\text{Ca, Mg} \text{CO}_3$ )组成,少部分石碑则以方解石  $\text{CaCO}_3$  为主要组成。这两种矿物是化学成分中  $\text{Ca, Mg}$  及  $\text{CO}_2$  的主要来源;大理岩中出现的  $\text{Si, Al, K, Mg}$  等物质,主要是由绢云母和黑云母一类矿物带入的;部分石碑的材质属于由石英、绢云母、长石等矿物组成的粉砂岩,这些矿物分别主要由  $\text{Si, Al, K, Na}$  单独或共同组成,硅质高。

2. 风化严重的石碑成分中出现的 S 主要是由石膏  $\text{Ca SO}_4$  引起的;汉白玉的护栏中的黄色斑块主要由 Fe 离子(氢氧化物形式)引起,而黑色污垢中除作为基底的成分  $\text{Ca, Mg}$  外,  $\text{S, P, C, S, Al}$  均明显增加,估计这是经年的雨水润湿后附着于其上的苔藓类植物和微生物活动,以及上部淋滤下来的硅铝胶体物质沉淀物或尘土黏附的几种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

3. 从各典型碑的矿物组成及显微构造的照片资料显示:

(1)抗风化能力一般,铭文受一定程度浸蚀的进士碑呈现的显微结构为:主要由细粒碳酸钙组成的细粒结构(实际上为石灰岩而非经重结晶形成的大理岩)。

(2)风化严重、铭文字迹不清的进士碑呈现的显微结构:主要是白云石经变质作用后重结晶形成中粒结构,矿物本身解理发育,颗粒间接触边界简单。

(3)抗风化能力强的进士碑呈现的显微结构:主要由为绢云母(Mus)胶结的石英(Q)及长石(Pg)组成。

(4)抗风化能力较好的青灰色进士碑呈现的显微结构:主要由绢云母(Mus)组成。

4. 通过以下几张风化表面的扫描图形可以看到,有污垢的汉白玉表面实际上已因风化而变得相当粗糙,不仅有丝状的有机物残骸,还有球粒状胶体沉淀物等。如:

大成门西北侧汉白玉护栏下部黑色污垢的扫描图像,可以看到其表面已相当粗糙,颗粒间因受侵蚀而出现了松解,甚至出现较深的溶蚀孔洞;有丝状有机物的残骸;汉白玉护栏因风化而使表面变得疏松、粗糙,在原基底上有片状物质及圆粒状胶体物质生成。

### (三)关于石材的基本类型

通过初步观察与取样鉴定证明,孔庙内的各种碑及汉白玉护栏的材质基本上可归纳为如下三类:

1. 大理岩颜色主要取决于原沉积的碳酸岩中杂质的多少以及变质过程中对杂质的排除程度,结晶粒度则与变质深度有关。在本次取样中,除汉白玉护栏为质地较纯的大理岩,因本色显白色外,其它大理岩均含有较多的杂质矿物,因而颜色显深浅程度不同的灰色、灰黑色或灰褐色。如含有较多的泥质夹层的碳酸岩经变质后形成灰褐色的云纹状大理岩;含大量叠层石的灰色大理石。

2. 泥质石灰岩在碑石中较常见,指那些变质程度较低而主要由细粒碳酸盐和泥质矿物如绢云母等组成的石灰岩。

3. 粉砂岩在碑林中较少见,进士碑西北侧及西南侧间或可以看到几块显青灰色或灰绿色的抗风化能力较好的石碑,即属此类材料(取样编号为6、8)。

总而言之,孔庙院内的进士题名碑最基本的矿物组成有白云石、方解石、石英、长石、绢云母和少量的绿泥石、黑云母,以及其它一些风化过程中形成的矿物,如石膏、硅铝胶体等。这些矿物本身的抗风化能力不同,而且它们在各种碑中的相对含量及结晶粒度大小也有差异,导致组成的岩石整体致密程度也有差别,正是这些差别造成了它们在风化程度上的不同。如那些以机械碎屑矿物的石英、长石及绢云母为主构成的粉砂岩,其抗风化能力就好;那些由化学沉积矿物如白云石及方解石为主要成份形成的岩石——大理岩、石灰岩,其

抗风化能力就差;在矿物组成相同或类似条件下,组成矿物的结晶粒度越细小,则抗风化能力相对就好。汉白玉的质地较纯,组成的矿物为化学沉积形成的白云石,而且经过变质作用后形成了粗粒结构,由于矿物间的接触边界简单,矿物颗粒间的结合不紧密,加上露天存放,所以是很容易风化的。

综上所述,造成现今孔庙内石质文物风化程度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其风化机理及相应产物,可以找到比较科学的保护及修复措施。

### 三、保护北京孔庙石质文物的方略

在石质文物的保护中,首先是对石质文物表面污物进行清洗,其目的是为了清除污物对石材的侵蚀和损害,打开石材被污物封闭的气孔,恢复石材微孔和水蒸气通道。去除有害于石材的污物,主要是各种盐类物质、有机物、锈斑、尘土、鸟粪、苔藓等。目前有些文物古迹部门试图同一些清洗保洁公司开展合作,对文物古迹进行水洗和化学清洗。在清洗过程中难免使用一些带有酸、碱的有机溶剂和表面活性剂等化学类物质。腐蚀性物质,对文物古迹势必会产生侵蚀和损害。因为石质文物中的大理石是以碳酸钙( $\text{CaCO}_3$ )为主要成份的岩石,惧怕酸的腐蚀。石质文物中的花岗石是以石英( $\text{SiO}_2$ )为主要成份的岩石,对碱性物质十分敏感。即使在清洗过程中用大量清水冲洗,也会对石质文物和周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损伤和污染。

北京孔庙石碑不仅与古树相互交错,而且密度大。因此,在实施保护中必须要注意文物保护的科学性、严密性、先进性、完整性和可靠性。要选用可靠的科学手段和无损害的科学保护方案,真正使文物古迹在安全状态下,无损伤、无污染地恢复其本来的面貌,达到“整旧复原”的效果。

基于上述的思路,对北京孔庙石质文物的保护拟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

段:采用无损伤、无污染的方法,对石质文物的表面污物进行干洗;第二个阶段:对石质文物进行修补和强化,以防止石材疏松风化;第三个阶段:对石质文物进行养护,以防止石质文物再度受环境污染和酸雨的侵害,延长石质文物的寿命。

#### 1. 石质文物表面污物的清洗

北京孔庙中的部分石碑为花岗石。多数石碑及大成殿、大成门、先师门的汉白玉栏杆、石柱等均为大理石材。鉴于石材的化学特性,如果采用酸、碱类的清洗剂对石质文物古迹表面沉积的污垢进行清洗,固然能使污物得以清除,但与此同时也给石材本身和周边的环境造成损伤和污染。特别是那些渗透到石材内部和周边环境地表下面的酸碱液体,将给石质文物古迹带来潜在的危害。为此,对北京孔庙石质文物古迹表面污物的清洗,我们拟将探讨更为科学的、无损伤、无腐蚀、无污染的新方案。这就是我们在北京孔庙石质文物保护中解决的第一个课题。

美国一项最新专利技术成果表明,采用 ACCUSTRIIP SYSTEM 可溶介质清理设备对石质文物表面进行干洗,其效果是酸碱化学清洗所不能比拟的。ACCUSTRIIP SYSTEM 可溶介质喷射清理设备可干喷亦可湿喷,但以干喷为主要方式,也就是将无酸碱性,无毒,无污染的 ARMEX 可溶介质用压缩空气压力喷射去除污垢,对石质文物不产生腐蚀和损伤,使石质文物古迹在安全状态下恢复原始状态,而不污染环境,这是当今世上最为科学、先进的文物古迹表面污物清洗技术。

其主要特点:

(1)特别设计的流量控制系统和指示仪表,可以精确地调节 ARMEX 介质的流量,以获得不同的处理效果;

(2)配备有效的除湿装置,可避免介质流动中出现的问题;

(3)专利的 PERFORMANCENOZZIE 喷嘴,增加了清洗效率,减少介质的消耗;

(4)配有压缩空气和水的混合装置,可自由选择湿喷方式,以达到避免产生灰尘,提高清洗质量和效果的目的。

此方法经过在石材建筑上的清洗运用,已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但作为开展石质文物古迹的清洗尚无先例。我们可先做实验,在小面积实验的基础上,开创石质文物古迹表面清洗的先例。一旦在北京孔庙石质文物保护工程中取得成功,这将为北京乃至全国众多文物古迹的保护起到示范作用。

## 2. 石质文物的修复和强化

如何修复、强化石质文物,增强其抗风化性能,使疏松的石材变得更加坚固,这是我们在北京孔庙石质文物保护中要解决的第二项课题。

目前国内外市场中的修复、强化材料品种繁多。涂蜡是一种运用最早的石材修补方法。它可以掩盖石质文物表面上一些细小的裂纹,增加表面的光泽。但是这种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的持久性和耐候性较差。而且涂过蜡的石质文物往往导致石材发生更多的病变。

涂胶和粘网也是用来修复石材和防止石材破损的常用方法。它通常用在一些疏松或裂缝较多的大理石材上,但是这种胶体只是涂附在石材表面上,没有渗透效果,因此对石材的本身不会起到强化作用。

云石胶也被人们作为一种石材修复材料来广泛使用。这种半固体状的胶体也是采用一些树脂作为基体,使用的同时拌以固化剂来快速固化,由于固化时间快,减低了树脂的粘结强度。这种胶只能用在一些对粘结强度要求不高的地方,也不适用于石质文物的修复或强化。

采用高分子材料渗透性树脂作为石质文物古迹的修复、强化,特别是一些具有渗透性和活性的树脂,这是当今市场上最科学、效果最好的石材修复、强化材料。它渗透性好,粘结强度高,一方面保持了树脂优秀的物理性能,另一方面使其能够渗透到

石材缺损部位中再产生硬化修复作用。它既可以用于石材的裂缝修复,也可以强化疏松的石材,增加石材的强度。选择的主要标准是修复效果和可操作性。一种好的石材修复材料应该是修复效果、硬化时间、渗透性、流动性和可操作性的完美结合。石材强化粘结剂应该是一种无色透明、清澈如水的液体,以适合各种颜色石材的处理。它无毒,不易燃,稳定性好,耐候性好,而且具有很好的可逆性。通过修复、强化的石材应达到具有较高的抗风化、抗侵蚀、抗破坏强度的效果。经过多年的市场调研和实际应用,初步认定德国、意大利、美国几家公司的石材强化剂产品具有较好的强化性能。经测试,通过这些石材强化剂处理后的石材抗弯曲强度和抗压强度得到很大改观。大理石的强度增加达60%~65%,对于风化后的石材,其处理后的强度可得到数倍的提高,而且石材本身没有损害,毛细孔仍被保留,石材能保持其原有的呼吸性,石材原有的颜色没有改变。石质文物古迹经强化处理后,更加坚固。

## 3. 石质文物古迹的养护

如何巩固上述两个阶段成果,保持石质文物不再受到大气和工业酸雨的侵蚀,这是我们在北京孔庙文物保护中要解决的第三项课题。

经过清洗和强化的石质文物,面貌基本上恢复如初,但由于这些石质文物仍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不可避免地继续遭受环境污染和大气侵蚀。尤其是工业污染对以碳酸盐为主要成份的大理石的腐蚀依然存在,因此,在表面进行保护处理是防止侵蚀的最有效的方法。

工业污染对碳酸盐石材的大理石、汉白玉的腐蚀,主要是工业生产过程中释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酸性气体溶于雾气、雨露和潮湿表面中,加上气候等因素的作用形成了较稀的酸。随着水分的气化,酸会逐渐增浓。当这种酸和碳酸盐石材表面接触时就会发生化学侵蚀使文

物受到损害。所以在石材表面涂刷防护材料,可将石材与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以及水隔离开来,阻止石材继续被酸性气体和水雨侵蚀,从而达到保护石质文物不再风化的目的,真正实现对石质文物古迹最完整、最科学的保护。

石材养护剂经历过有机硅油、有机硅树脂等第二代、第三代的发展历程。但都由于种种缺陷,不能满足石材养护的要求而受到冷落。目前大多采用第四代产品——硅酮树脂和氟化物树脂。一般来说,防护剂应具有较好的耐候性和重涂性,防护剂的耐候性越好,重涂的次数越少,重涂性越好,说明防护剂失效后对石材的负面效应越小。在石材被腐蚀过程中,水是最重要的参与因素。但石材的损坏并不是因为水分本身的存在所引起的,而是水参与的物理作用或化学作用所引起的。因此,防护剂的防水效果通常被视为最主要的指标。石材是充满微孔的渗水材料,会自动吸收来自空气中和地下的水分和潮气,并由此使可溶性盐在石材内部和表面扩散。有机高分子防护膜的渗入和覆盖,从表面上防止来自空间的酸雨和有害物质的侵蚀,但无法防止来自地下、内部和相依物体的可溶性盐随水分和潮气的迁移。当保护层不能透过水气时,带有可溶性盐的水分会在保护层下随着环境的干湿和冷热的变化产生水力压力,直到使保护层破裂。鉴于此,在石质文物保护中,就需要选用一种渗透性能好的石材防护剂,而不是只在石

材表面成膜的防护产品。石材防护剂产品除了耐候性、重涂性、渗透性好之外,还要求具有抗静电、抗紫外线等性能。抗静电性好的防护剂不易吸附尘土,能保持石材洁净的表面,减少污物对石材的侵蚀。抗紫外线性能好的防护剂,使处在露天的石质文物不因阳光的曝晒而褪色、氧化,减缓老化的进程,有利于石质文物的保护。

此外,石材防护剂还须具有不改变石质文物的透气性,不改变石材颜色的性能,不能使石材微孔和水蒸气通道受到阻塞,而应该让石材照常自由呼吸。一旦微孔和水蒸气通道被封闭,来自地下和内部的水分不能排出,将会使石材出现涨裂、水斑等多种病变。使用石材防护剂产品的PH值应以中性为好,既不改变石材的颜色,也不造成环境的任何污染,又对石材无任何损伤,实现对石材的永久(10~30年)性保护。美国“亮石牌”石材养护剂可被石材的自然毛孔吸收,石质文物具有较强的防水效果,并同时具有耐候性、重涂性、抗静电和抗紫外线,不改变石材的透气性和外观颜色,PH值为中性,使石质文物产生高效耐久功能,大大增强了文物古迹抗风化、抗污染的性能。

通过对北京孔庙石质文物古迹的清洗、强化、养护等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北京孔庙将充分展示自己丰富的文化内涵,为2008年实现“人文奥运”增添新的风采。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

## 北京市文物局 2003年二季度文博事业

# 大事记

4月5日-25日 北京市文研所对兴海家园住宅小区进行了施工前的考古钻探、发掘工作。共发现各类遗迹现象30处,其中,墓葬2座,古井17口(分别为汉、唐、辽金及明代的),灰坑3处,近现代坑8处,同时出土器物有白瓷罐盖、骨簪、古碑等。根据对该小区墓葬及踪迹的发掘,可以充分说明:此区墓葬分布极少,但在汉代到唐、辽、明代均有人在此居住生活。这次发掘为研究大兴区西红门镇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4月8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孔庙进士题名碑保护工程开工,整个工程预算809260.97元。

4月12日 在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举行了中挪友谊钟的捐赠仪式。这次活动由从事中挪文化交流的人士发起,得到了中挪双方使馆的鼎力支持。这口象征中挪友好情谊的“金镛”(钟在中国古代称为“金镛”)是由挪威著名铸钟商纳恩先生(Ole Chrislan Olsen Nauen)铸造的,钟上铸有“和平鸽”浮雕,钟高47厘米,重60公斤,象征中挪两国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金镛”将陈列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永久地见证中挪友好的历史。

4月14日 经北京市文物局核准,中国马文化博物馆和北京皇城艺术馆获得博

物馆注册资格。至此,北京市经正式注册登记的博物馆达121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十三陵——康陵修缮工程开工,该项目是《“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工程之一,并列于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施工单位为北京明十三陵建筑工程中心,工程预算5924305.23元,预计今年年底主体工程完工。

4月15日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隆安寺修缮工程开工,该工程是《“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项目之一,并列于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由北京市城乡中昊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施工,工程预算163万元。

北京市成立修订《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领导小组由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市人大教科文卫体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江镜波、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副局长舒小峰组成。起草小组由市政府法制办、市人大教科文卫体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市文物局等部门组成。

4月17日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建汀州会馆北馆修缮工程开工,该工程是《“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项目之一,并列于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北京市城建亚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施工,工程预算153.8235万元。

崇文区火德真君庙修缮工程开工,该工程是《“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项目之一,并列于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由北京市房管一建设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施工,工程预算134万元。

4月23日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元大都城垣遗址修缮工程开工,该工程是《“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项目之一,并列于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由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负责施工,工程概算55.8万元。

4月份 市文物局对辽宁省盘锦市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未经批准擅自在世界公园内以博物馆名义开展活动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处理。

5月19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在

淀西苑南路工地施工中发现的清代石桥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认为此桥是清代畅春园附属园林西花园遗址范围内的石桥。

5月22日 市政府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并于2003年8月1日起实施。

5月份 为将北京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的实物资料收藏起来，真实地记录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人类对自然灾害的应变能力及措施的过程。首都博物馆及时开展了抗击“非典”现代文物征集活动。此次征集活动通过热线电话、电子邮件、现场捐赠等多种方式进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6月9日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白塔寺一进院地面修缮工程开工，该项目是《“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工程之一，与白塔寺西路修复开放一并列入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施工单位为北京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工程概算871048.98元。

6月11日 市领导刘淇、王岐山、龙新民、蔡赴朝等同志听取了市文物局和首都博物馆关于首都博物馆新馆展陈大纲的情况

汇报。

6月26日 刘敬民副市长视察首博新馆工地，了解新馆建设的工程进展情况。

6月27日 天安门城台文物保护工程总结大会在天安门管委会召开，天安门城台文物保护工程是《“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工程项目，也是市政府60件实事重点工程项目之一。工程从2月8日开工，4月23日竣工，历时75天，市政府投资200余万元。此次修缮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城台渗漏、管线老化等问题，地面按历史原状进行了修复，整体环境得到改善，确保了结构和使用的安全。

上半年 调查处理了5起违章案件：雍和宫管理处违章修缮；雍和宫旅游开发公司翻建房屋；北京城市开发总公司擅自迁建法兴寺；市公安局迁建东方汇理银行石拱门；师大附小拆除围墙等。

对我市批准的10余处文物监管物品购销场所进行了抽查。

我局完成了对正阳门管理处防雷工程方案、文博交流馆新建文物库房、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技防方案的审定核准工作。

北京市文物局局属博物馆 2003 年第二季度参观人数统计表

名称	成人含外宾	学生	总数	其中外宾约	其中购票入馆者
首都博物馆	16121	3410	19531	563	15259
大觉寺	60248	6032	66280	258	55079
正阳门	4158	640	4798	701	3700
徐悲鸿纪念馆	400	200	600	8	100
智化寺	240	23	263	79	263
辽金馆	350	10	360	0	269
西周馆	7336	1334	8670	3	1620
艺术博物馆	闭馆修建				
团城	闭馆修建				
大葆台	1402	213	1615	1	1615
大钟寺	4905	752	5657	1041	4682
古建馆	1851	147	1998	110	1406
白塔寺	5423	539	5962	20	5423
老舍纪念馆	1638	872	2510		
德胜门	1346	20	1366		710
石刻馆	1689	140	1829	126	13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2003. 3/ 张展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9

ISBN 7-5402-1560-7

I. 北… II. 张… III. 文物工作-北京市-丛刊

IV. G269.27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8659 号

北京文博(2003 \* 3)

---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北京科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定价: 10.00 元

# 北京市文物局和市公安局

## 联手破获一起倒卖文物案

6月10日下午，北京市文物局将一面写有“打击文物犯罪，英勇机智神速”的锦旗送到北京市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察大队，以感谢他们不畏危险，帮助文物部门破获一起倒卖文物案的行为。

3月19日下午3点，一文物收藏爱好者向北京市文物局文物执法队举报：有一文物贩子向他倒卖青铜器，他认为重要文物，表示愿意配合工作。执法人员带着文物鉴定专家和举报人直接与文物贩子进行了接触。专家认为，其中一件应为真品。经过两次商谈，价格为30万，文物贩子希望尽快交易。20日下午，市文物局执法队与市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察大队研究认为此案紧急，应立即实施抓捕行动。他们制定方案后把交易地点选定在一银行门口。下午5时许，迫不及待要拿到现金的4名犯罪嫌疑人，在交易现场被当场抓获。公安机关起获涉嫌文物7件。经专家初步鉴定，其中一件为西周时期青铜器，暂定为珍贵文物三级。这一犯罪团伙的抓获，对北京市打击文物犯罪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青铜提梁卣



(文：刘小凤，图：薛源)



ISBN 7-5402-1560-7



9 787540 215606 >

定价: 10.00 元